

浦江縱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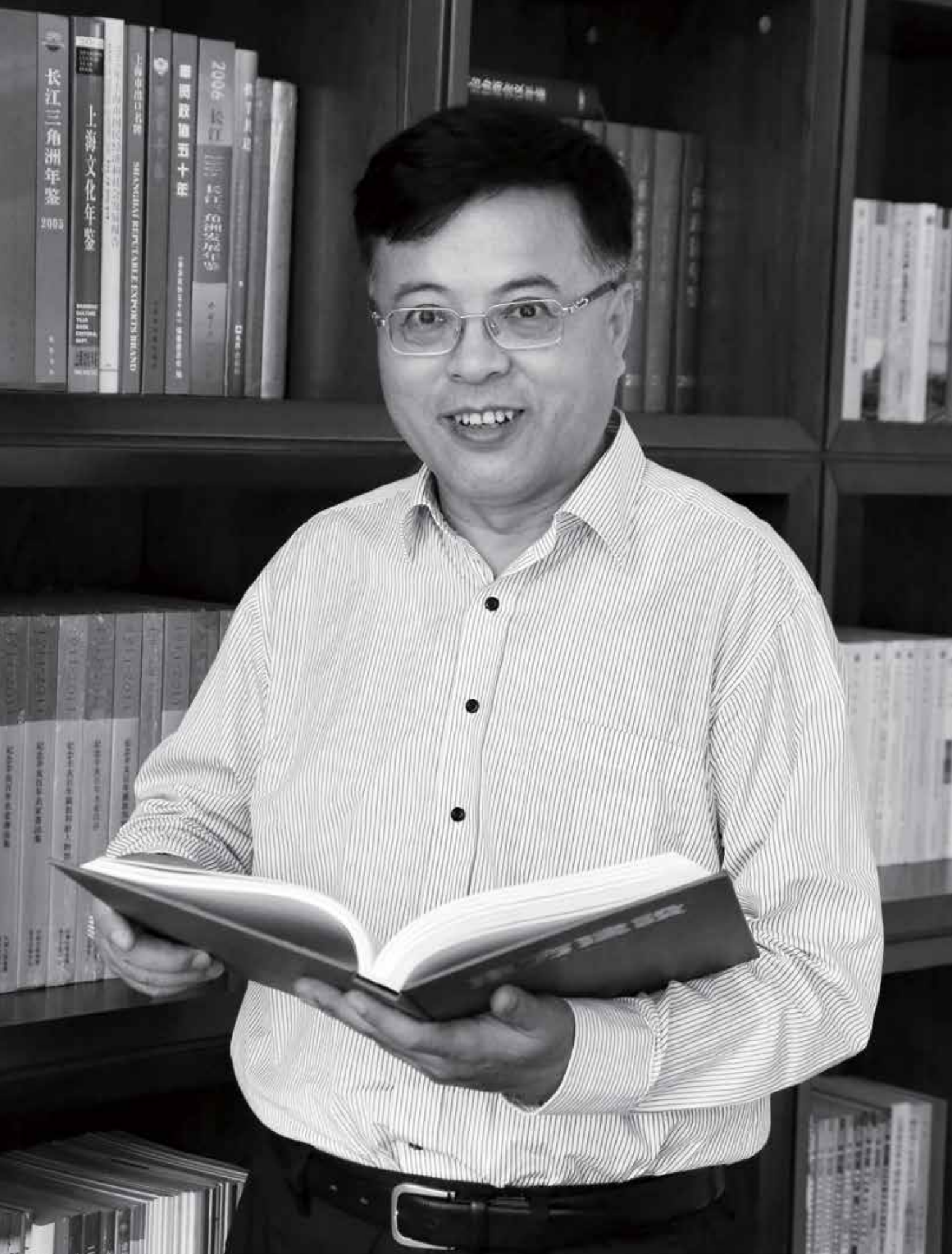
PUJIANGZONGHENG MONTHLY 2013年12月刊



专题策划

上海，在开放中前行





统一协调和集中指挥

文 / 杨 格

站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 746 号房间的门口，我注视着门牌上的名字——臧志军。作为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他办公室堆满的书吻合他的身份，饱学学养。

在这间办公室里，我开始听市政协委员、民革成员臧志军阐述：“政府和政府职能部门并非同一个概念。政府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及各委办局负责人构成，职能部门则具体执行政府的指示。但有的地方政府常务会议一个月才开一次，会期半天，主题是事先确定的。这意味着许多超越单个部门的权限、跨部门的、需要由政府加以协调和决策的问题很难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

臧志军的观点让不少政府领导觉得很委屈——我们很忙啊。

臧志军以一个实例加以佐证：一对老夫妻居住的房屋漏水，六年半间，报修了 121 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原因在于这对老夫妻的房屋漏水问题是个“疑难杂症”，横跨多个职能部门的权限，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单独解决此事，只有政府出面进行协调、决策才有可能解决。然而，虽说部门之间的协调会开过多次，但是没有一个部门将此事上报给真正拥有协调、指挥和决策权的政府。直到被媒体曝光，在上级的督促下，有关方面召集包括多个相关政府部门以及物业、居委会等在内的 14 家单位开会，才解决了问题。

“推进政府行政改革，也需要加强统一协调和集中指挥”。臧志军在其起草的《建立政府行政改革的集中领导和推进体制》研究报告中写道：“我国的政府行政改革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以下问题：改革呈现某种程度的无计划性以及部门化、碎片化……在开展政府行政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打着‘行政改革’的旗号谋取不当利益的做法时有发生……行政改革举措本身也需要进行监督。若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推进机构，这类‘自利’、‘自肥’式的所谓‘改革’难以得到及时纠正。”

臧志军之所以特别关注政府改革问题，并不只是因为他在大学里从事的是政治学专业，更源自于他年轻时的一段经历。

臧志军中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市郊一国营农场工作，1976 年，该农场希望引种当时还鲜为人知的杂交水稻。当他和一位前辈费尽周折在湖南长沙找到了杂交水稻种子后，却发现无法调拨：作为种子，它属于农用生产资料，归农业局管；作为水稻，它是粮食，对外调拨需要有粮食部门的指令。因此，躺在农业局种子站仓库里的杂交水稻种子，没有粮食局的调拨单根本出不了门。要取得粮食局的调拨单谈何容易，当时连县级粮食局的粮食计划调拨单右上角都标有“秘密”两字，更何况是跨省调拨！湖南当地的县粮食局需要有来自地区粮食局的指令，而地区粮食局又需要有省粮食厅的指令……同样，这边也是障碍重重。最后是在哪个层级协调成功的？臧志军不得而知。不过，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政府行政系统中存在的重大缺陷。

30 多年过去了，臧志军离开农场重返校园，最后到复旦任教。他对政府行政改革的思考没有停止，他在研究报告中建议：“在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人民代表大会内设立行政改革专门委员会……新设的行政改革委员会将主要从事有关行政改革议案（包括相关立法文件）的筹划、研究和起草工作；就有关行政改革事宜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报本级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决定。这一方案的优点主要有，所设机构在行政系统之外，有助于更加全面和客观地研究政府行政改革问题；所设机构为人大下属机构，所提建议报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处理后向政府提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再者，有利于对于‘改革’内容和进程的监督。”

（摄影 / 申卫星）

上海市政协主管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浦江纵横

2013年12月刊 总第143期

刊名题字 汪道涵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姜樑
副主任 贝晓曦 许政涛 冯小敏
委员 毛时安 朱少伟 朱敏彦 刘建
孙颀 吴建中 余岚 林尚立
祝君波 徐炯 葛剑雄 熊月之
朱志诚 陆加平 王建华

主编 朱志诚
副主编 叶明献(常务) 王耕菽
编辑 杨格 李章生 顾晓红 戴中洁
美术编辑 陈蓓娜
特约摄影 申卫星 梁严
法律顾问 游闽键

编辑出版 《浦江纵横》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北京西路860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电话 021-23188600转
传真 021-62159912
发行联络 021-23188508、23188532
电子邮箱 pjzh@smmail.cn
印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国际标准刊号 ISSN2095-2317
国内统一刊号 CN31-2063/D
出版日期 每月10日
定价 10.00元



时评

5 由基层之感说开去/凌慧

专题策划

上海，在开放中前行

6 开放中前行/历博
10 近代上海迅速成长的因素/顾行超
14 包容、争优、法治与爱国/熊月之

学习园地

18 领导改革的辩证思维与政治智慧/奚洁人
20 比较东西大学文化 呼唤当代大学精神
/顾国柱 李文涛

经济观察

23 以改革开放提高上海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黄铮
28 市场化改革与顶层设计/应健中
30 上海艺术品市场的结构和时代变迁/祝君波



调查研究

- 32 农民工流动家庭化的趋势及其政策应对/马流辉
35 苏州河文化旅游：诊断与思路/王慧敏 司马志 刘平
37 以新能源经济助推崇明生态岛低碳绿色发展
/民进上海市崇明县委

社会广角

- 40 防控艾滋病：现状与路径/武俊青
44 以爱抗“艾”/杨 璞
46 走自己的“慢城”之路/曹祎遐
48 为环保主体良性有效互动提供法制保障/王 曦
50 台湾商家欢迎人民币/顾定海

人物

- 51 周瑜：我在白鹤/顾晓红
54 胡林森：质如木 意如刚/葛文君

文化视野

- 56 音乐会，在青浦监狱的草地上举行/施远立
58 藏在岁月里的温暖/杨 格
60 阿豹画戏/王小音
62 读《兰亭序》/萧 铮
64 小镇记忆/金国强

往事

- 65 丁玲早年与上海之缘/朱少伟

海上万象

- 68 伟人足迹/朱敏彦

肖像（1） 声音（4） 沪上非遗（封三）

* 本刊未有特殊注明的文章在征得本刊许可的条件下欢迎各媒体转载，但必须注明出处，并向本刊邮寄样报（刊），同时按国家版权局有关规定支付稿酬，如有违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 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即表明作者将该作品的专有出版和网络传播权授我刊行使。以上授权报酬我刊将在作品发表时一次性支付。如有不同意见，请在投稿时向本刊声明。

* 本刊所选用的部分资料图片，请作者与本刊联系，即奉稿酬。

声 音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备受关注的“单独二胎”政策终于明朗。目前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凸显，劳动总量不断减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在此背景下，调整生育政策已经成了必然的选择。但是，短期内出生人口大幅度波动，会给粮食安全、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如产妇入医院生产困难、婴幼儿看病困难，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困难等。

建议政府研究出台相关措施，做好粮食安全、公共服务配置规划，应对短时期可能遇到的生育集中现象。调整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做好人口出生预测预报，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生殖健康水平和家庭发展能力，引导夫妻合理安排生育时间。

——任乐艺

目前，我国政府使用视频会议的用户比例达到了30%左右，金融、能源、通信、交通、医疗、教育等重点行业机构的使用比例也在不断提高。视频会议的优越性不少：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协作能力，降低公务成本；遇到紧急情况，视频会议具有时效性；可以减少会议次数，提高效率，比一级级传达的执行性要好等等。

建议：在政府部门中积极推广使用视频会议。政府部门统一采购视频设备，逐步推广视频会议，减少传统会议次数，可以体现注重会议实效、切实改进会风，厉行勤俭节约的精神、支持发展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等，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条件，推进视频会议在其中的使用。

——九三学社上海市青浦区委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成为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手段和有力保障。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社会公益组织正在不断成长。在规范、监督社会公益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的社会服务时，不应“一刀切”，应当适度引入第三方评估。对于金额低、周期短的项目，

可直接根据被服务群体满意度进行测评；对于金额大、周期长的项目，可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第三方评估必须具有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建议以项目委托的方式，邀请专业机构、高校专家、一线资深社工等联合组建第三方评估团队（不同的政府购买项目要有不同的评估小组），深度参与政府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服务的绩效评估和管理工作。

——潘慧蓉

市面上的儿童读物包装越来越精美豪华，且价格都不菲，以前一本少儿图书不过几元钱，现在至少二三十元，套装书更是少见有百元以下的。儿童读物应少穿“精装”。第一，一本好的儿童读物绝对不是单纯指印刷好、装帧精美而言，重要的是看其内容和语言文字是否符合儿童的心理；第二，过于精美的外包装往往造成浪费，而且书本越“精装”成本就越高，定价就越贵，家长们的负担也就越重。

儿童读物还是坚持“简装”为好。有关部门应采取措施，加强价格监管，规范图书市场，引导出版社推出更多平价少儿精品读物，让那些爱读书、爱求知的孩子们都能“读”得起书。

——宗美霞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对传统商业形成极大冲击，加上市中心商圈商业结构的调整，不少老字号门店迫于租金压力而搬迁、关门。面对电商的挑战，在传统营销渠道之外，开拓电子商务平台应为老字号企业的必然选择。北京市商委早在2009年就牵头开设了“老字号网店”，为上千种北京老字号产品提供了交易平台。建议由政府牵头设立老字号网店，不仅可以为众多老字号产品开拓电子商务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一条品质有保证的一站式选购老字号产品的渠道，同时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品牌营销，为老字号培育新的客户群。对于不习惯使用电脑的中老年顾客，在网店之外，还可以设立类似呼叫中心的服务热线，以配送服务方便消费者。

——虞馥璟

由基层之惑说开去

◎ 凌 慧

一位在基层社区工作的同志告诉笔者，“忙于文明城区创建工作有大半年了，正在接受评估”，按照她的说法，前面的大半年工作都是在“昏天黑地地补各种材料，不少材料是空穴来风，有造假之嫌”——真是基层之惑！

在笔者看来，社区工作是让群众直接面对面、心贴心的重要工作，尤其是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形势下，群众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社区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领域。

但必须反思：我们需要怎样的社区工作？

这里的“我们”还要细分，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上级政府部门、社区居民群众、基层社区干部。这三类人对社区基层工作的期待肯定不完全一致，关键是三种期待之间的交集有多少？如果上级政府部门和社区居民群众的期待没有重合，势必对从事基层社区工作的人员造成极大的困扰——只考虑满足上级政府部门的意愿，执行上级政府部门的工作要求，服务群众的宗旨反而被抛之脑后。若为创建、评选之类还要造假的话，与真正的社区服务工作更是南辕北辙，甚至是从根本上扭曲了社区工作的价值取向，抹杀了社区工作“为群众服务”的崇高感，这样的后果实在是很糟糕

的！

在笔者看来，社区作为一个居民居住生活的共同体，实际上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方面。从党和政府来说，近年来，对社区建设的重视程度完全可以称得上“高度重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几乎所有政府事务的管理重心都下移到社区，而且很多工作都是带着资源下去的。随着居委会的换届，社区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水准得到很大提高，社区工作原来存在的“缺资源、缺人手”的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事情多”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这些“事情”往往是来自上级各种部门的合理或不合理要求。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笔者就听到有基层代表提出工作中各种台账的负担太重，甚至某一个条线在基层的台账就有27项之多。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论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时明确：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

治良性互动。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由此可见，必须改进作风，深入基层，为基层减压、减负，才能将群众的实际需求与工作目标结合起来，真正地做到服务基层。居民希望在遇到问题时，社区有反映问题的通畅渠道和解决问题的资源、能力。基层社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发挥扎根基层、扎根群众的工作优势，做好“接线员”，做到“两头清”，既要摸清不同社区群众的不同需求，又要清楚所需资源的所在位置，牵好线、搭好桥、接好头，要在收集民声、传递民声的过程中培育民主，在关注民生、解决民生的过程中聚拢民心。

期待社区工作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实实在在回归到服务群众的主线，进而真正实现和谐社区、幸福家园的目标。 ■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南岸，东濒大海，在江流海潮的相互顶托共同作用下，长江、吴淞江、钱塘江等河流所携挟的大量泥沙不断淤积，逐渐形成三角洲冲积平原，自西向东，渐次扩展。图为沧海桑田话成陆（海岸线图）

开放中前行

——上海开埠 170 周年历程

◎ 历博

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海纳百川，上海文化的本质特征；开放，上海城市精神的生动写照。

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早在开埠之前，上海已经建立了颇为发达的经济网络，是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港口城市。开埠之后，上海在经济、社会、文化与地理等得天独厚条件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元素，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座城市，引领一段风云，映照一个时代的起承转合。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舞台上，上海就是从昔日的被动开放饱受屈辱，到如今的主动开放充满自信的见证。近代以来上海的嬗变和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性，在开放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揭示了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促进加快发展的道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回顾历史是为了汲取前人的经验，更是为了走出符合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开放之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上浓墨重彩的亮色。

开埠之前

上海，地处长江下游，东海之滨，为万里长江汇入太平洋之处，人文历史可上溯至距今约6000年前。公元751年，设华亭县；1292年，正式设立上海县。

唐、宋以降，尤其是元、明、清三朝，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渐成规模，遂成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带。商品化的手工业生产与通达的海外贸易，构成了上海社会繁荣的基础。西学东渐，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气息。满载漕粮、松江土布等的沙船驶向外埠，成为开埠之前的一道著名风景。

18世纪末叶，是中华与西方之间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时期。由于清朝坚持闭关锁国，极大地阻碍了上海的发展，压制了她的活力。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不容许清政府继续维持锁国政策了。

从被动开放走向主动开放

一、1840年至1948年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攫取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及附属条约，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11月29日，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签订《上海土地章程》，上海租界制度由此发源。

租界给上海带来了殖民的屈辱。为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处于开放前沿、中外联系最频繁的海，成为有志之士接受民主思潮、探索中国出路，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舞台。

开埠后的上海，凭借着辐射整个东南沿海和广袤长江流域的地缘优势，贸易、金融、工商业均得到长足的发展，到1930年代初，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然而，这种繁荣却建立在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形态之上。

二、1949年至1978年

1949年5月，上海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结束了半殖民地的时代。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许多传统的对外交往渠道被阻断，上海的对外交流受到了严重影响。上海对外联系转向苏联、东欧等国家，并与香港地区、日本、东南亚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继续保持往来。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积极引进、学习苏联、东欧、日本、西德、法国、意大利、瑞士、荷兰等国的先进技术，建成了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至1965年，上海成为我国先进的工业基地和科研科学技术基地，为新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百废待兴，但仍然尽己所能积极援助朝鲜、越南等亚非拉国家。上海在援外交流中，扮演着物质、人力技术等输出的重要窗口角色。

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中国外交从单纯的面向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扩大到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交流。

上海作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重要纽带，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外交舞台，影响全国。

三、1978年以后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1984年，上海成为全国沿海十四个对外开放城市之一。为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现代化城市，上海积极探索，扩大开放，为新一轮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4月，浦东开发开放，举世瞩目。按照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上海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敢为人先，自主改革，率先改革，形成多领域、多形式、多层次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战略决策，为上海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按照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开放新格局，上海围绕“四个中心”目标，努力实现“四个率先”，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1936年，在沪银行、钱庄、信托公司的营业资本占全国近一半，上海确立了其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



上海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征程中，续写着对外开放的崭新篇章。

开放与上海城市发展

一、开放与城市建设

1843年上海开埠，现代意义上的市政建设开始起步。1912年，上海县城墙拆除，1931年，上海城市建设格局基本形成。

1958年，江苏10个县划归上海，上海市辖区面积扩大10倍。从此，城市建设与发展有了广阔的空间。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的推进，上海的城市建设加大开放力度，大胆引进外资，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路，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二、开放与城市交通

开埠后，上海的道路经历了土路、碎砖路、碎石路到柏油马路的变迁，上海的交通工具则经历了从轿子到马车、人力车、汽车、电车的并行与代谢。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此后，上海又逐步增加了连接外地的多条铁路。

解放后，上海修建了环绕市区的中山环路与通往郊区的多条马路、

- 1、1990年10月4日，香港汇丰银行成为落户浦东新区的第一家外资银行
- 2、1980年，上海杂技团作为中国第一个访美演出的大型艺术团体，在美国演出54场。图为卡特总统携全家观看中国杂技表演
- 3、1979年，第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中远货轮“柳林海”轮从上海港出发至美国西雅图港，恢复了中断30年的两国海上运输航线
- 4、上海是最早开展援外医疗且派出医疗队员最多的省市。图为上海首批援外医疗队在国外工作
- 5、由英国商人于1881年在公共租界杨树浦地区建造的上海自来水厂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水厂。图为杨树浦水厂最早的建筑

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上海，已成为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窗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赋予上海崇高使命，同时也给予上海

新的历史机遇。开放是上海发展的强大动力，开放及其改革创新是上海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选择。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科学发展先行者，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先行先试，



公路。

改革开放为上海的城市交通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上海在新的历史时期，瞄准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加快交通建设步伐，形成了海上、陆地、天空的立体化交通格局。今天的上海正在为建成交通更加完备的国际大都市而努力奋斗。

三、开放与制造业

上海开埠之后的制造业始于修船行业，最早的企业是江南机器制造局。之后，上海机器织布局及若干纺织厂设立。至1894年，上海的民族企业有12家，外商开的食品、造纸、印刷等企业23家。民国时期，由于多年战乱，上海的制造业难言景气。

解放后，上海通过工业结构调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工业基地。

改革开放后，与世界先进水平对接，是上海发展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上海确立了包括制造业相关产业在内的六大支柱产业。21世纪以来，制造业在上海产业中依然有着重要地位。近年来，上海制造业注重向高端发展，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四、开放与金融

上海开埠后，列强资本长驱直入，外资银行纷纷设立。在列强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于1897年在上海开办。而后，上海的金融业逐步拓展，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开放，加快了上海金融业发展的步伐，改善了上海金融业发展的环境。1987年，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浦东开发开放，陆家嘴金融区的功能定位，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奠定了基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必将加快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

五、开放与经济贸易

上海开埠之后10年，外贸总量已居全国之首。而后，上海有了许多外国设立的贸易分公司，这些公司将国外的石油制品、机器、钢材等进口到国内，将生丝、茶叶等出口到国外，由此，中国对外的经济联系一步步地加强。

改革开放前，上海的经济贸易经历了曲折前行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上海通过“精简放权、搞活经营”，推动了外贸进出口的增长。进入21世纪后，上海

制定了“大外贸、大口岸、打通关”新政策，使上海的经济贸易迈上新的台阶。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上海迎来了经济贸易全方位开放的新局面。

六、开放与社会文化

上海开埠后，西方的文化及其相关设施与手段传播到上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上海有了自己的报刊发行、图书出版、学校教育、文化娱乐行业。

解放后，上海在文学、电影、戏曲等领域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与此同时，文化的开放性传统继续延伸，前苏联等国的文学艺术在上海有着广泛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上海大剧院等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文化设施相继建成，各国优秀艺术家纷纷来上海演出。

改革开放后，在教育领域，一些办学新颖、具有开放性特色的教育形式得到长足发展。出国留学的上海学子与来上海学习的国外学生日趋增多。在体育领域，建成了八万人体育场等具有国际水平的体育设施，在上海频频举办国际赛事，上海体育健儿在国内外各种大赛中屡创佳绩。此外，上海还是国内外游客的向往之地。

上善若水 海纳百川

上海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开放的每一次历史进程，都给城市带来了新的变化。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如果说浦东开发开放奠定了上海此前20多年的开放格局，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必将带来城市新一轮的高起点开放，为未来发展书写更为靓丽的一笔。

近代上海迅速成长的因素

◎ 顾行超

1845年，当租界在黄浦江西岸落脚后，上海从渔歌唱晚、芦荡苍茫的海滨江滩悄然演变为霓虹璀璨、楼宇巍峨的世界级大都市。近代上海为什么能够迅速成长，促成其迅速成长的因素有哪些？它对朝着“四个中心”目标奋进的上海有哪些现实启示？当我们从成长因素的新视角考察上海近代史时，其就以新的面貌逐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地理人口因素

吴淞口外曾有个三色水（崇明人称“三夹水”）汇聚的水域，长江水、浦江水、东海水在这里相会，三水色泽不一，形成磅礴瑰丽的汇集交流景象。近代上海就在这“三色水”的激荡、滋润中成长，其中，地理人口是不可或缺的一色。

开埠前的上海，以盛产稻、麦、豆类和棉花而闻名，所产的棉布在江南区域经济中占有一定位置。至清乾隆、嘉庆年间，上海因航运发达而享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之声誉。这些被富庶的江南所遮蔽，在运河明珠苏、杭都会面前，上海只是一个“壮县”。

诚然，上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

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这是江南乃至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与之匹敌的。洋人选择上海，首先是基于它在地理上所具有的优越条件。

唐宋以前的江南偏处一隅，这时的江南是指以明清时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松江、苏州、常州、镇江、江宁“十府”为核心的区域。因为远离中国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地区，因而也远离政治、军事集团冲突的核心，避免了战争的杀戮与破坏而享有一个相对安宁、稳定的环境。安宁和稳定保障了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富足与安乐，使江南苏、杭一带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名。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

“天下富庶莫过江浙”，明清时期江南的精华集中于运河沿岸。富庶的江南，为近代上海的迅速成长，提供了最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促进近代上海迅速成长的又一重大事件是租界。租界的开辟促成江南区域中心从苏、杭加速转移到上海。太平天国运动自咸丰元年（1851年）金田起事后，从西南向东北，一路狂飙，势如破竹。于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改名



1971年，上海市舞蹈学校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组应邀在日本演出



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晚清时期由中国政府创办，是当时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在西学东渐方面作出很大贡献

天京。此后，太平军横扫江南，清军在江南与太平军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拉锯战。直至同治三年（1864年），江南地区才被清军重新控制。长达十年的战争，江南地区唯有上海因租界未遭巨变。战争引发的难民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向上海，它极大地加速了上海人口的机械增长，1860年仅在英美法三租界内的华人就增至30万，到1862年更猛增至50万。到1866年，上海地区的总人口增长至70万。

上海地区人口的第二次突然大增加，是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全面侵略战争以后至1942年2月，上海租界的人口激增了78多万。上海人口的第三次突然大增加，是1946到1949年间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1945年的330余万猛增到1949年初的540余万。

上海的人口，从开埠时的20万，经百年成长而猛增至500多万。这不仅在国内各大城市中发生过，而且在世界城市（纽约、伦敦、巴黎等）人口史上亦是罕见的。此消彼长，人口地理环境优势，促使周边、

全国乃至世界大量人口、资金以超常速度涌向上海，促使近代上海快速成长。

洋商因素

洋商，是鸦片战争后专指在旧中国各通商口岸经商的外国商人，早时国人将其贱称为“夷商”。毛泽东认为，洋商“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循着毛泽东的判断，我们追溯洋商在近代上海的发展轨迹，探寻近代上海迅速成长中的洋商因素。

早在上海开埠前，到过上海的英人林德赛、英传教士麦都思等就非常青睐上海。1843年11月，上海被迫辟为商埠。

上海由于是条约商埠，洋商享有租房买屋、租地建屋、设立栈房，参与协商关税、受领事裁判权庇护等许多特权。外籍税务司又控制了江海关的实际管理权，千方百计为洋商降低税赋，上海外贸因此急剧

上升。据统计，上海开埠10年后，清咸丰三年（1853年），对英国进出口货值达1720万美元，远远超过广州的1050万美元。1864至1873年的10年间，上海累计进出口总值占到全国的59.8%。1894年甲午战争前的近半个世纪，商品贸易是上海对外经济关系的主流，这一时期，上海已经确立了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

中国在甲午战争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该条约使列强取得在华设厂权。由此，外国对华侵略进入了以资本输出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1936年，洋商在上海的资本增至4亿元（法币），是甲午战争结束时975.2万银元的40倍。

洋商在上海的投资主要分布在轻纺和日用品工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航运业、公用事业以及文化产业等。1936年，洋商企业仅棉纺品、卷烟、机器与船舶修造、电力4行业，产值即达3.47亿（法币），占当年上海工业总产值的29%，上海已成为近代中国轻纺工业的主要基地。

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共有11家洋商银行，分属8个国家，世界著名的大银行均在上海设立分行，外滩成为著名的金融街。1931年前后，上海金融市场兴旺，黄金成交量仅次于伦敦、纽约，超过巴黎、东京和孟买，外汇市场活跃度远远超过日本。

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有洋商房地产公司75家，地产总值约16亿（法币）元。

上海的航运业20世纪前为英商所垄断，进入20世纪后，逐步形成英日分霸格局。与航运业相伴而生的是上海码头仓储业，位置最佳、容量最大、设施最好的码头几乎全是洋商码头。至抗日战争前夕，洋商码头的仓库面积占上海港仓库总面积的79.2%。

从1864年英商创设上海煤气公司开始至抗日战争爆发，洋商在上海共成立了9家公用事业公司，资产占上海全部洋商资产总额的45%。洋商发电量占全市总量的91%，自来水供给占全市的71%，煤气供给占全市的76%，洋商还创办了出租汽车行、公共汽车公司，电话、电信公司等。

在文化产业方面，洋商快速地将世界上出现的新技术、新文化向上海传输。1908年，洋商在虹口建造中国第一座影剧院，至1939年，上海有影剧院50多家，多数为洋商创办。巴黎大戏院作为当时好莱坞电影在上海的一个主要放映点，好莱坞新片出品两周后就来这里上映，日本、东南亚的富人为赶时髦，常乘坐飞机飞来上海观看新影片。这是何等时尚的独领亚洲文化风骚之景象！洋商还经营上海电影制片市场、影片发行市场，从而使上海成

为旧中国优秀电影艺术人才、电影制作技术最为集中的城市。

洋商在近代上海的百年，是洋商在上海恣意恃权掠夺的百年。同时，当他们把西方文明强加到上海的时候，对上海的崛起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效应。记得毛泽东这样说过，“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缓慢”意味着我们要在黑暗中慢慢摸索。洋商为近代上海迅速成长提供了可以沿袭、模仿以及借鉴的西方文明，上海在被动接受中，对这种示范引领逐渐从理解走向趋同，从而使上海出现了惊人而超常的膨胀和发展，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航运中心、外贸中心，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

华商因素

华商，是指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商人，他们在自然经济逐渐解体的过程中诞生，在外国资本挤压的困境中崛起。近代上海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华商因素。

晚清时期，上海因开埠、租界等因素而使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在变化中逐渐形成若干发展上海民族经济的有利条件，从而使上海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全国首屈一指。譬如，华商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味精厂、第一家牙膏厂、第一家毛巾厂、第一家制药厂、第一家时钟制造厂、第一家搪瓷制品厂、第一家灯泡厂、第一家电池厂、第一家美术颜料厂等。清同治4年（1865年），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等已能生产出一批国家急需的工业产品。生产门类已发展到金属、

木材、玻璃、卷烟等众多行业。但军工、造船等部分企业生产的产品，由于需求量稀少的特殊性以及市场被洋商占据等原因，在市场上销售的并不多。真正大量生产并在市场上流通的产品，只是集中在纺织、食品、医药以及化妆品等行业，且发展也比较缓慢。

差不多在1900年前后的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近代上海的发展获得了一次新的机遇，华商的发展因此出现短暂的辉煌。追溯其发端，就是《马关条约》使列强取得在华设厂权。发端之前的上海，还是一个依靠贸易突然发达起来的城市，虽然不断有人口涌入，但贸易能吸纳的人口有限，城市发展的稳定性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一旦战乱结束，因一时避乱而到上海的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回到故里，重理旧业，重享先前安定的田园生活。列强取得的在华设厂权，使洋商对上海的投资进入到以资本输出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洋商对上海大量输出资本，推进了上海工业的发展，使城市的发展获得了稳定性。市场经济的共融共富特征也使华商在上海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纺织业、面粉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华商投入得更多，从而使近代上海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黄金时代。

这里的重要机遇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商品市场的争夺，英国举国上下忙于战争，纺织工人奔赴前线，纱布生产大量减少。中国棉布进口历来以英国为大宗，此时棉纺织品因战争而缺货，价格因缺货而上涨，这为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中国的面粉工业亦在这时发展起来，与棉纺织业不同的状

海派文化因素

况是，战争使欧洲市场的面粉紧缺，日本商人将面粉运至欧洲市场，获利甚丰。日商大肆收购面粉，中国从面粉输入国转变为输出国，生产面粉的华商获利丰厚，加大在上海的面粉生产量。1914年，全国出口不足7万担，1918年仅上海出口就达151万担，1920年达331万担，占全国总出口量的83%。

辛亥革命之前的华商大多是出身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多经过科举仕途，激于列强欺凌，放弃仕途而创办实业（如张謇等），1915年以后的华商，有的系统受过西方教育，有的则出身寒微、通过艰苦奋斗、摸爬滚打而发展成为企业家。比起前辈，他们更具企业家的素质，其中有创办中国最大民族资本企业集团的荣氏兄弟，有集“煤炭大王”、“火柴大王”等多种头衔于一身的刘鸿生；有棉纺织企业家穆藕初等。与民族资本企业的崛起相一致，上海创造了许多民族工业品牌。据1934年国民政府实业部商标局的统计，全国有注册商标9224件，上海有7932件，占86%。上海在纺织品，食品，日用化学品，药品，五金、电器产品、文体产品等方面创造了130多种名牌产品。在旧中国金笔市场上，人们公认的四大名牌产品，即“金星”金笔、“新民”金笔、“关勒铭”金笔、“博士”金笔，全部由上海生产。“一战”前后，上海华商创办的棉纺厂、面粉厂、卷烟厂、火柴厂、铁工厂等，在抓住良好的国际机遇中蓬勃发展。至1936年，上海工业总资本约5.62亿元，外国资本占71%，民族资本占29%，此时，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而华商在其中的作用和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海派”一词，与清朝末期的“海上画派”有关，海上画派的前源是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依次推演，海派文化是指绘画、戏剧、文学等具体艺术品种中的上海流派。之后，海派文化由其内涵的拓展延伸而发展成为包括衣食住行、文学艺术、戏曲绘画、语言民俗、教育传媒、审美情趣乃至思想意识等诸多方面的上海风格、上海气派。年轻的海派文化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具活力的文化之一，在对近代文化风气产生较大的影响的同时，又与齐鲁、燕赵、巴蜀、湖湘、荆楚、岭南、吴越等色泽斑斓的众多区域文化一起，融汇成中华文化的壮丽画卷。

上海地区虽然早已有悠久的人文传统，有誉满天下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有行销中外的土产品、工艺品，然这些都笼罩在吴越文化之中。海派文化开始像原子核那样从吴越文化中裂变出来是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设立租界并由此而产生上海社会经济结构的翻天覆地变化，海派文化伴随着这些变化异军突起、扶摇直上。显然，促成近代上海迅速成长的因素中不能没有海派文化。

1900年以前，中国有9个比较重要的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上海占了7个，所出各种西书567种，其中有434种由上海出版，占77%。从译书质量和影响力看，无论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凡影响大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中译西书，多由上海出版。从出版机构的数量、规模，出版书籍的

数量、质量，出版的内容、影响以及从业人数看，上海都独占鳌头而成为近代中国出版中心。

19世纪以前，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报纸。1850年，标志着上海报纸开端的《北华捷报》发刊。1857年，标志着上海中文期刊发端的《六合丛谈》创刊。《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民族危机刺激了救亡运动的高涨，维新人士开始在上海自办报刊，上海发行报纸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报纸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开放了人们的思想。

随着西学东渐，不同于旧式教育的新式学堂、新式教育在近代上海发轫。最早开始这种教育的是洋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如徐汇公学、中西书院、圣约翰大学等。受教会学校的启发，国人自办新学校，如广方言馆、澄衷学堂、文明小学、浦东中学、梅溪书院、南洋公学、复旦公学等。

上海开辟租界，为海派文化营造了兼容并包的社会地理环境。租界拒封建专制统治于界外，革命派、改良派就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先进的知识分子利用租界从事新思想的宣传，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也在这里出版《共产党宣言》、创建中国共产党。

不论对区域文化还是异域文化，高雅文化还是鄙俗文化，海派文化都展现出其宽广的胸襟，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四因素，在推进近代上海成长的过程中，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汇聚成“力的平行四边形”，共同作用于近代上海，推动着上海迅速成长。

（作者为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包容、争优、法治与爱国

——开埠通商与上海人特性的形成

◎ 熊月之



2001年10月15日至21日，第九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首次承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国际活动。图为APEC会议领导人签名长卷



2010年，上海举办了一届精彩、成功、难忘的世博会，有189个国家和地区、57个国际组织参展，创造了历届世博会参展方数量之最。图为上海世博会旗林

开埠通商，对于上海人特性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笔者以为最突出的是以下四点，即包容、争优、法治与爱国。

包容

包容，一是包，海纳百川，这是从城市总体上说；二是容，宽待异己，这是从各个地域文化上说。

近代上海人口八成来自全国各地。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使得上海成为全国各地人口大拼盘，使得上海人口主客矛盾基本不存在。本地人口很少，外来人口很多，使得本地文化对于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同化力不够，这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各地方人来到上海，并不像一把盐撒到水里，全无形影，而是分中有合，

结为一个一个小的团体，即同乡组织，包括前期的会馆公所与后期的同乡会。从晚清到民国，上海同乡组织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二三百个，他们是各地来沪移民的准政府，其作用既为移民所认同，也为上海地方政府、租界管理机构所认可。各地移民遇到麻烦事、开心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同乡与同乡组织。上海地方政府或租界管理机构遇到事情，照例也会去找各同乡组织头面人物。小刀会起义、两次四明公所事件，都与同乡组织的作用有关。

说到包容，或许有人会说，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上海人排外，哪有包容的雅量！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上海人历史的不了解，是对上海人特性的不了解。近代上海一直没有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各地方人来的来，走的走，来了，住下，有稳定的工作，就是上海人；走了，就不是上海人。有的人来而复去，去而复来。因此，那时所谓的上海人，本身就是流动的一群。

最典型的例子有二：

一是辛亥革命时期，各地谋独立之人尽为本地人，唯独谋上海独立之人，无论是同盟会的陈其美，还是光复会的李燮和，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上海光复后，陈其美担任沪军都督府都督，从来没有人因为他是浙江湖州人而提出过异议。

二是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毛泽东等代表长沙，王尽美等代表济南，董必武等代表武汉，他们都是各个省会城市所在的本省人，唯独代表上海、北京两个城市的代表不是本地人。上海代表一是李汉俊，湖北人；一是李达，湖南人。北京代表是张国焘与刘仁静，都不

是北京人。李汉俊与李达在上海生活没几年，都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会议，从来没有有人因为他们的籍贯提出异议。

这两个例子雄辩地说明，清末民初，无论是上海本地人，还是其他地方人，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即上海是全国人的上海，不只是上海本地人的上海，就像北京是全国人的首都，不只是北京人的首都一样。既然如此，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

那么，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上海人排外”的说法从何而来的呢？

这一说法其来有自，酝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于8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高度开放的上海，变成了相对封闭的上海；以商贸为主的上海，变成以工业为主的上海；充分市场化的上海，变成了高度计划化的上海。特别是1958年户籍制度的实行，迁出容易迁入极难，上海人口趋于固定化。国家实行“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政策，看上去是对等的，互相支持，但是，全国支援上海的是煤、电、原材料、农副产品，低附加值，上海支援全国的是轻纺产品、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一辆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一套培罗蒙西装，可以换回一大车农副产品。上海以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1/10的工业产值，1/6的财政收入，而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0。上海用于自身城市改造、发展的余地很小，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极为突出。这种情况到上世纪80年代达到极点。

上海户口被附加了很高的价值，上海产品与优质、精致、洋气联系在一起，上海人的身份与聪明、能干、奉献联系在一起。这既催发了上海人服务全国的大局意识，强化了上海人高人一等的优越意识，同时，也使得上海人捉襟见肘，过日子不得不精打细算，半两粮票、假领头，都是这么出来的。内地人出差来沪，通常要带一长串购物单，或为己用，或送人，从服装、皮鞋、手表到糖果、饼干，无所不有。上海人与内地、乡村联系本来密切，来客相对频繁，与此不相适应的是，上海人待客条件极差，客多容易生怨，频繁容易冷淡。于是，在一部分内地人眼里，上海人既精明，又小气，还傲气。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走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列。上海对全国的人才需求空前加大，到现在，上海常住人口已接近2500万，其中一千万是新时期从各地引进的，占40%。人们发现，青少年会说上海话的越来越少，以至于有些学者要呼吁保护上海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上海移民传统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由此可见，从历史长时段看，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排外”的说法，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如果从开埠算起，170年当中，最多占四分之一的时

争优

争优，追求卓越。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崇洋，崇尚、学习西洋先进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二是勇于创新。

生活在上海的，相当一部分西



1992年10月11日，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1993年1月，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成立

方人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家园，住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有些人甚至出生在这里。他们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世界中一块西方文化飞地。这对上海人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上海人也曾抵制过自来水，误解过煤气灯，但日久天长，一旦明白自来水较之井水、河水更有利于卫生，煤气灯、电灯较之油灯更亮更好，电话是那么方便，电梯是那么实用，就逐渐由误解而理解而羡慕而师法。

晚清中国许多地方发生过针对外国传教士的教案，上海尽管是传教士活动中心，有众多的教堂存在，

有众多的传教士活动，但基本没有教案发生。唯一的是1848年青浦教案，那是发生在传教士与外地漕运水手之间，并不是发生在上海人中间。上海人与欧美侨民，与传教士，朝夕相见，甚至共处一厂一弄一楼一室，知道他们怎么生活，怎么传教，不会相信挖眼剖心之类传言。所以，义和团运动时期，北方在杀洋鬼子、二毛子，拔电线杆，上海等地则与外国人实行东南互保，互不侵犯。义和团运动以后，上海士绅提出了“文明排外”的口号，主张要排外，但要文明，不能野蛮。

异质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越是凭本事、凭实力竞争的社会，是英

雄不论出身的社会。近代上海异质化程度很高，各行各业竞争都很激烈。荣家企业靠的是竞争，四大公司靠的是竞争，黄金荣、杜月笙能立足上海，也是靠竞争。

法治

法治方面，租界是比较严格实行法治的，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这些年，老上海的城市形象被《上海滩》等电视剧严重歪曲，使得人们以为老上海就是那么没有秩序，流氓黑帮横行，互相杀来杀去，混乱不堪。其实，近代上海法治是相当严格的。上海租界设立了一系列市政管理机构，工务处、警务处、公共卫生处、火政处等，并制订了一批法规。这些法规，对居民的居住、作息、建筑、行路、卫生等作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条分缕析，名目繁多。上海人对“红头阿三”

（印度巡捕）多没有好感，很重要一点是因为印度巡捕在马路上执法，时常与上海华人发生矛盾。工部局用印度锡克人当巡捕，其实也有法律制度设计方面的考虑。锡克人被认为比较忠诚，身材外貌与中国人明显不同，亦不善中文，故不容易与其管理对象小偷、流氓之类沆瀣一气，警匪一家。顺便指出，上海公共租界也比较喜欢雇用山东人当巡捕，其缘由与雇用锡克人相同，因为山东人被认为是中国人当中比较忠诚的一群，身材也比较高大。

长期的法治传统，培育了上海人的法制意识，养成了上海人守法的习惯。民国初年，上海报人姚公鹤就指出：上海人历经英人熏蒸陶育，服从法律习惯已较胜于内地。租界内西方司法制度的引进，也使上海人早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仪



上海自贸区挂牌，标志着以制度创新为着力点的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于内地人有了寻求法律保护的意识。1930年江苏全省6300件民事诉讼案中，上海市占了七成以上。1935年上海仅律师公会等律师组织的成员，就占了全国律师的40%。

爱国

前文说到上海人崇洋，必须要补充一句，即上海人只是崇尚西洋现代化的东西，并不唯洋是崇。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歧视、压迫中国人的行径，则坚决抵制与反抗。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从晚清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拒俄运动、大闹会审公堂事件、抵制美货运动，到民国时期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爱国运动，还有跨越晚清民国的要求公园开放运动、华人参政运动，每有爱国运动，上海人必走在前列。

上海人爱国特性的形成，与上海人口来源，上海人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联系大有关系。

上海移民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

持久而密切的联系，许多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就发生在上海与各地之间。

上海很多企业存在优先录用本乡人的潜规则，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均为广东人所开，其管理层面的职员，几乎全是广东人。荣家企业20世纪20年代所雇用的九百多名职员中，三分之二为无锡人。英美烟公司买办郑伯昭的永泰和烟行，在上海本行和长江下游的一些分行雇了200多名职员，都是他从广东招募来的同乡。上海很多资本家在其家乡铺路、造桥、办学、设厂，资助家乡贫穷学生进城读书、出国留学。

上海移民与各地的联系，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特别关心，催化了上海人的爱国精神与天下情怀，恋乡、爱乡发展为爱国。上海人早已习惯于将全国之事视为自己之事，在赈灾活动、爱国运动中一马当先。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上海是中心，领袖人物中颇多广东、福建人，因为遭受美国歧视的美洲华侨多为广东、福建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因事涉山东，上海山东人走在运动前面，积极发起各项爱国活动。

上述近代上海人四大特性——包容、争优、法治与爱国，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包容是基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的实质是多样性的统一，是承认、尊重个体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有了包容，就会取长补短，见贤思齐，就会有竞争、创新，优胜劣汰，就会有自治、法治。有了包容，上海人对于西人带来的众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制度与文化，就有可能全面、细致、深入、从容地了解、研究与学习，进而进行创新。有了包容，上海人就有可能做到两头明白，一头是明白西方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一头是明白中国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进而明白中国何以自处，这也就是今人所说的文化自觉。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领导改革的辩证思维与政治智慧

◎ 奚洁人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处理一系列事关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努力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和思想方法，为创新发展党的思想方法论和辩证智慧做出了重要贡献。

《决定》从指导思想到总体框架，从整体设计到战略重点，从具体部署到重大举措，无不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辩证思维方式和领导改革的高度政治智慧。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它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朴素辩证法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和领导智慧。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

处理一系列事关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努力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和思想方法，为创新发展党的思想方法论和辩证智慧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相统一。邓小平南方谈话冲破了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手段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创造性地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可以采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思想障碍。后来，在实践中又发生了在处理效率和公平正义问题时的隔裂。因为要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和突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过度强调政府干预，弱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应有作用，把那只本应属于市场的手装到了政府的身上，以致今天要用“壮士断腕”

的决心，砍掉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臂。《决定》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把坚持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辩证地统一起来，统一于为人民谋福祉这个价值核心和根本立场。所以，《决定》把调整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大胆地肯定“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并强调“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既可防止政府的越位或缺位，

又能抑制和弥补市场失灵，保证公平正义价值导向的真正落实。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与凝聚共识相一致。改革需要凝聚共识，《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有新的谋划、新的举措。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但发现问题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因为“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决定》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而且“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统一思想。思想统一了，才能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所以，解放思想与凝聚共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改革的共识，决不是在不触动原有观念障碍、利益藩篱情况下的最大公约数，而是通过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相统一的过程，通过实践试点逐步形成的共识，那样的最大公约数，才是凝聚改革合力的真实基础，才能真正推进“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达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改革目的。

第三，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更需要有胸怀全局、把握全局、总揽全局以及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的

改革大局观，需要有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的战略前瞻性，需要加强改革举措的整体谋划，保持改革方案及各项重大举措之间的协同性，因此，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系统协调。但“摸着石子过河”决不是改革开放初期因不清晰改革路径而摸索前进的代名词，邓小平当年使用“摸着石子过河”一词，本身就是总设计师在提出改革开放总体构想和“三步走”重大战略设计框架基础上所提倡的一种改革创新的实践探索精神，是我国试点式、渐进式发展方式及其思想方法的通俗表达，是对没有先例可循的全新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前进状态的形象比喻，早已超越了生活原义的内涵。《决定》在新的历史和理论高度明确地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辩证地统一起来，体现了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方法论新的理论自觉。其用意旨在更加强调改革需要上下呼应，需要中央强有力的领导和激发地方政府、基层群众及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凝聚合力。更加强调，一方面顶层设计需要实践基础，需要吸纳群众智慧，需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改革措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检验和完善；另一方面，改革实践需要战略谋划，需要整体部署和统筹规划，需要各种要素和改革举措匹配协同的系统整合。

第四，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本次改革决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全面的、系统的、“六位一体”的整体性改革。因此，《决定》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而且在总目标中明确，到2020年，在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但整体推进要有牵引力、突破口和发力点，若面面俱到，没有重点，找不到突破口，必然难以整体推进。《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着力发挥其对全面改革的“牵引”作用，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政府职能转变定位为改革的关键，使简政放权成为改革的“马前卒”，并通过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改革提供保障，使若干集中体现社会诉求的单项改革，如收入分配改革、教育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成为总体布局中的发力点等等，“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为了突出重点，文件起草时，习近平就强调“不‘十全大补’、不面面俱到”和“三不写”原则，充分体现了“全面而不面面俱到的”辩证思维，也是正确把握全局与重点关系的战略思维。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也是重要的领导方法和领导智慧。

第五，坚持变与不变，大胆与谨慎、勇气与智慧相平衡。首先是“变与不变”。马克思曾强调，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因此变是绝对的。改革就是求变，“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但又有许多不能变的原则，如，改革只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

重大战略判断”，坚持改革的根本目的、正确方向和科学方法，“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取得成功。其次是“大胆与谨慎”。习近平强调，“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改革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这正如邓小平当年强调的，“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所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最后是“勇气与智慧”。《决定》强调，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关键头，全党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没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壮士断腕的决心，何去冲破思想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怎么能“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改革当然要有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要有“创造性的改革举措”，要有统筹全局和突破难点的大智慧，不是光凭勇气就能奏效的。《决定》的产生，就是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和党中央敢于政治决断的政治勇气的高度统一。总之，《决定》对于变与不变、大胆与谨慎、勇气与智慧关系的正确处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辩证思维方法和领导智慧，也是变持相宜、智勇相合、刚柔相济的中国文化理念和传统智慧的时代体现。■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教授，博导）

比较东西大学文化 呼唤当代大学精神

◎ 顾国柱 李文涛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大学精神”是大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标志和具体体现，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强调建设“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大学精神肇端疏证

尽管我国早在公元前15世纪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大学的雏形右学，其后又有冠名为“学宫”、“太学”、“国子监”、“书院”等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大学，尽管儒家经典《大学》也提出了“大学之道”这样的大学理念，但严格说来，近代大学发端并发展于西方，大学理

念的形成、展现与完善也根源于西方，而中国近代大学的办学体制亦是从西方引进而来，要说明大学精神的真正内涵，就必须从弄清楚西方意义上大学“university”的起源说开去。

在英文中，中世纪欧洲的大学一词为“university”，是由“universe”（宇宙）这个词的前身派生而来的。“universe”来源于拉丁文中为“universus”，由表示“一”的“unus”和表示“沿着某一特定的方向”的“versus”构成。“universus”的意思就是“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它的派生词“universitas”也指一群个人的联合体或社团。中世纪起这个拉丁单词在政府、宗教和教育等领域得到广泛使用，“universitas”这个词被用来指由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新联合体，即今天的大学的雏形。

追溯我国大学教育的渊源，便可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达与久远。中国传统的学校以培养公共政治服务的官员仕人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侧重儒学人文教育。中

国大学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它深厚的根基。纵览古今，中国之所以能够长达数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仅存的国家，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化具有极强凝合力的文化道统，在于这个文化道统派生出来的大一统的国家观。在当代社会，我们又选择了公平与正义、科学与真理、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这些普世价值，它们既是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纽带，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指导。大学精神也应当成为中国时代精神的注脚。

20世纪中国大学草创之初，并不完全纯粹是西方大学精神，它的真正源头在中国丰厚的文化积淀中，源于当时一批中西兼通、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大学人融合中西文化、结合当时大学实践所进行的创新。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士志于道”、“明道济世”为根本，吸纳包括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大学理念在内的人类多种文化的共同体。或者说中国大学精神就是“士”的精神，“道”是核心，从而确保在朝代兴替繁复的久远历史中，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价值观却保持了相当稳定的一脉相传。正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大学的意义》所论述：“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

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他还认为：“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

可以说此时东西方在人才培养方面都不约而同地把强调人格培养和教化新民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这些国家出现的团体难道不能称之为大学？当人类脱离野蛮进入文明时代，各种复杂的教育观点所体现的核心，就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千百年间，维系这种教育思想的根本原因就是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认同。由此可见，大学创建之初，就是培养人才、传播文明的地方。大学的精神就是人类文明的薪火相传、绵延不绝，以至推陈出新、不断发展的过程。

大学的学术发展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和先进设备的支撑，更体现在优良学术精神的一脉相承。北大、清华文化精神形成发展表明，中国大学精神的源头是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根本，吸纳包括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大学理念在内的人类多种文化的共同体。没有这种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知，就谈不上树立中国大学的精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种种规章制度当然会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明的诸多影响，但“明德”、“亲民”、“至善”的大学精神却始终蕴含在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之中，历经战乱祸患、朝代更迭而从未断绝。追求真理而

厚德爱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千年绵延不断的家国情怀和精神传统与现代大学的精神诉求不谋而合。

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关键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大学的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化，是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现代大学首先应当珍惜、借鉴和继承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令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维系不坠。

呼唤当代大学精神

当今中国处于五千年不遇的大变革、大调整时代，无数的机遇与挑战充斥着我们的时代。21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步入一个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学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校园仿佛一夜之间旧貌换新颜，高楼林立，生源急增。

关于大学精神的探讨越发引人瞩目。梅贻琦“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言犹在耳，但新形势下如何真正追寻大学精神、铸造大学文化，却处处充满了困惑与忧虑。现今中国大学发展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要么颀颀裹足、不思进取；要么阵痛觉醒、激浊扬清。选择前者，就意味着随波逐流、继续沉沦，不思任何革新与改进；选择后者，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自主意识，就必须开拓创新，这种创新

无疑要以尊重历史与传统为前提和基础，这种历史和传统当然是全人类的，其中又必然少不了中国大学自己历史传承下来优秀的东西，尤其是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中国大学精神的传统。

大学文化是尊崇道德的文化，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道贵德的文化传统。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各行各业都十分注重职业道德的培养，因此师有师德，商有商德，官有官德。而现在人们常说的道德已演变为狭义的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道德的根源，以致现在不少人认为道德是虚幻的思想精神标准，可有可无，标准可以随意变化。这显然是错误的。

大学的精神的第一要旨是教书育人。教育的目标就是让自然人变为社会人，学会认知、做事、合作和生存。高等教育就是社会化成人与自然本能相互妥协与对抗的过程。应通过严格培训，将更为优秀的制度、品德和性格传递给学生，铸就他们完善的社会性格和整个民族的特性。育人的重点，就是培养学生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培养有抱负、有政治远见、有广博知识、有责任心的人。提高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要承担文化传承创新使命、加强文化育人，必然对教师的文化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这样阐释教育的意义：“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尽一分子的责任。”人类文化传承只有两种方式：基因和教育。未来企业

的竞争，国家的竞争，不再是一个（伟）人和另一个（伟）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竞争。因此教育的最终功能，不只是以文化培育人、教育人，更重要的是要人们共同参与对“国民性”的建设中来。

大学应该有追求真理和自由的精神。教师不应仅仅传授知识、学问，更重要的是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一个字：Truth（真理）。就是教导师生追求真理，而不迷信权威。胡锦涛2006年4月21日在耶鲁大学演讲时说：“耶鲁大学校训强调追求光明和真理，这符合人类进步的法则，也符合每个有志青年的心愿。”华盛顿大学的校训是：通过真理取得力量。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成为中国大学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也应该成为现代化以后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往往是能够掌握自身命运的人，是在思想上、精神上完全独立的人。

大学应该有引导时代潮流的精神贵族气质，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之间心有灵犀地沟通来实践。大学精神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知识权威的角色定位，价值中立、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一系列政治斗争以及大学行政化管理体制的建立，在大学固有的精神贵族气质荡然无存，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由此产生——“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

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大学教育切莫陷入媚俗趋利的错误倾向。教育的正确目的，归根结底是接近于某种意义上的信仰性质的东西。当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义，学问成了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失掉了本来应有的主动性，因而也失去了尊严性。

大学教育必须远离体制官僚化倾向。权力效应在大学里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大学产业化而法律尚不健全的今天，权力就意味着对师生利益的侵占。庞大的行政机构、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已经无端侵蚀了教师的利益，并且这种侵害总是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使之合法化。

大学精神维系着我国大学未来发展的命运，教育的成败关系着国运的兴衰和民族的荣辱。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文化与精神正是大学之根本所在，如何能够不高度重视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的大学只有高扬尊道贵德、师道尊严、育人新民、自由独立、唯才是用、兼容并包、崇尚民主、融通中西的大学精神，同时远离媚俗趋利的不良倾向，才有可能建立不愧对时代的辉煌成就。今天的大学，要获得长足的发展，肩负起社会的重托，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就必须牢固地树立起自己的精神支柱。 ■

（顾国柱为上海市政协第九、十届委员，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文涛为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珍藏阅览室馆员）

以改革开放 提高上海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 黄铮

如同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一样，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同样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上海市政协十二届五次常委会议协商议政的主题正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

抓住机遇搞改革

“要改革”是委员们共同的呼声。杨祥海常委代表市政协经济界别作的主题发言是“抓住建设自贸试验区历史机遇，深入推进上海改革开放”。

“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意义大于政策诉求意义，区内外联动意义大于区内建设意义”，市政协经济界与经济委员会合作，围绕建设自贸区与推进上海深化改革开放，开展了一系列调研和座谈讨论，作出如此判断。

“概念在区内，文章在区外，重点在联动”，委员们提出，在当前合力推进自贸区建设各项工作的同时，还要立足上海全局发展和长远发展，认真研究和推动自贸区区

内外发展如何互相联动、区内外改革开放如何相互促进等问题，充分利用并放大大自贸区先行先试的溢出效应，创新开放新模式、形成开放新形势，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起到示范作用，为上海尽快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奠定基础。

委员们认为，在 28 平方公里的自贸试验区内，要抓住创新外商投资体制和投资管理方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进金融领域先行先试等核心内容，及时跟踪适应国际规则的变化，密切结合国情、市情，积极探索管理制度创新，争取早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示范。建议有关部门对迄今全国各地各类改革试验区现有的制度创新情况进行梳理和集成，确保自贸区的体制性改革试验能够建筑于所有这些政策性调整之上，切实站在着眼于制度设计、安排、创新的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前沿。

比如，可以借鉴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 + 备案制”投资管理模式的相关做法，探索审批制改备案制，深化本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使改

革从目前重审批项目数量减少、重审批权限下放（或转移给行业协会）逐步向取消行政审批、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要着力解决好政府如何直接向市场主体放权，增强市场发展活力；如何消除部门间利益分割，加强协同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建立真正的服务型政府等问题提出具体改革方案，并选择相关区县、相关部门、相关产业开展试点，大胆尝试，有效激发上海改革发展的动力。

28 平方公里的自贸试验区面积仅相当于上海的 1 / 226，上海未来发展不可能只局限和依赖于如此有限的空间。委员们指出，要充分利用这个支点来撬动全市新一轮改革开放，充分借鉴自贸区运行的新理念、新方法，做好推动全市制度创新这篇大文章，使试验区的功效见诸于整个上海的发展。“目前，江苏、浙江一些城市对于如何率先承接自贸区的溢出效应，已经在作积极的思考。我们上海自己不能观望等待，特别不能丧失三年试验窗口期的机遇。”委员们建议，“我们要在试验区外同步按照国际通



行惯例办事的要求，通过‘倒逼’机制努力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为上海早日建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奠定基础。”

委员们特别注意到，自贸试验区四个区域全部位于浦东新区，而浦东新区在“先行先试”方面显然具备优越的条件。“作为连接自贸试验区和整个上海的中间环节，浦东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如何与自贸区建设相呼应、相协调、相借力，是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委员们建议，在市级层面，建议借鉴浦东开发开放初期“声东击西、东西联动”的思路和做法，借力自贸试验区建设来深化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在新区层面，要利用新区政府负责自贸试验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便利条件，调整完善发展思路和管理方式，主动对接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措施和运行规

则，特别要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上下功夫，为承接自贸区区域和政策扩围率先作好准备。

在全力以赴推进自贸试验区各项试点任务的细化落实的同时，要把研究试验区区内和区外业务如何联动、自贸试验区自身建设同本市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如何联动、自贸试验区建设同上海开放型经济建设如何联动等提上议事日程，统筹设计和同步推进区内外各层面的改革发展，最大程度地释放自贸区试验带来的改革动力和制度红利，加快上海实现“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的步伐。

委员们认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面临国内外众多城市的激烈竞争和“不进则退”的严峻挑战，要取得进一步发展，迫切任务是要寻求制度层面的创新突破，自贸试验区为此提供了新的条件和空间。当

前，要抓住自贸区内服务贸易开放、金融制度创新、贸易新型业态培育、国际航运服务能级提升等方面实施方案和政策细则正在制定中的有利时机，同步考虑相关政策在区内外外的分工实施和联动推进机制，确保自贸区内的先行先试政策能在第一时间转化为推进“四个中心”建设的体制机制优势。

自贸试验区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政策优惠”，但全方位为企业提供了与海外资本和市场对接的窗口，为上海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实惠”。委员们呼吁本市各经济部门，尤其是企业要积极研究，主动作为，充分利用自贸区商务成本较低、行政效率较高、管理环境较为宽松等优势，进一步促进区内外业务联动。如，利用自贸区贸易的环境便利，拓展区外商品出口的新渠道，提高资金回流；借助自贸区

金融和投资政策便利，引导企业海外投资，促进上海企业走出去；发挥自贸区航运便利的政策优势，大力吸引国内外航运企业，增强国际中转和枢纽港功能等，进一步发挥上海对周边地区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全面促进提高本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注入新的推动力。

构建平台增效益

“平台经济”是新名词，但很可能道出了上海经济的本质。张新生常委代表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作了“大力发展平台经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发言，“上海经济的升级版可以借助平台经济发展得以实现。”对“平台经济”的信心可见一斑。

支撑这种信心的是数据。“据统计，目前全球最大的100家企业里，已有60%的企业的主要收入源自平台，包括苹果、思科、花旗、谷歌、微软、日本电话电报、时代华纳、UPS快递、沃达丰等，中国的淘宝、百度、腾讯、人人网、盛大网络、上海证交所都是通过平台商业模式获利并持续扩大版图的。”委员们认为，上海近几年已经涌现出一批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平台企业，它们活跃在内外贸易、个人消费服务业、共同配送、旅游、金融支付、生产性服务业、专业服务业等领域，不仅为上海经济作出了贡献，而且已经活跃在国内各大城市，在各自领域内成为佼佼者。

令人对“平台经济”心生向往的，是对“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向往和对“残羹冷饭”的厌弃。委员在发言中提出：“我们已经感受

到、感叹着电子商务对消费带来的方便。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电子商务正在催生以小前端、大平台、富生态为特征的新商业模式。平台既是支撑小前端的基础，也是衍生富生态的土壤，平台类企业不单是电子商务企业，它是比一般电子商务企业更加高效、更加开放的企业。平台商业模式是一种可以让所有合作者共赢，经营越久价值越大的商业模式。由于平台商业模式已经显示出赢家通吃的超级威力和创造性的破坏本质，应用平台战略的企业将会颠覆原有的产业链，弱者只能分得残羹剩饭。通过平台模式可以达到战略目的，包括规模壮大和生态圈的完善，乃至对抗竞争者，甚至是拆解产业现状、重塑市场格局。因此，它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不但收益丰厚、主动权大，在竞争中也会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往往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委员们分几次调研了上海大宗贸易、个人商品和服务消费、专业服务领域中的近20家利用平台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发现平台这种商业模式是整合资源、分配要素、发现价格的极好手段；是企业集合竞争、合纵连横、发挥特色的重要手段；是充分利用上海优势，发展经济提高质量、提高市民生活水平、推动企业走向国内外的有效手段。平台已经成为商业模式竞争的新趋势。

错过“平台经济”会是上海深深的遗憾。发言中指出，上海是一座资源贫乏的城市，但同时上海又是一个海陆空港和公路运输发达，金融、信息、航运、商贸功能齐全，服务业发展相对完整，对外交往十分频繁，法治环境和理念比较符合国际化的大城市。委员们认为，上

海经济的发展，一是要市民生活安定；二是要贸易流通发达；三是要高新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引领国内经济发展；四是与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基本吻合。因此，当平台经济的大潮来临时，上海理当紧紧跟上，利用上海的各方面优势，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如果把上海经济比作上海的血管，那么，平台经济可以增加这个血管的弹性和活力。”委员们指出，上海应该结合以项目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搭建以平台为主的发展方式，因为，这种商业模式是服务全国的，是未来经济的支撑，是上海经济质量和效益提高的希望。同时，它反映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趋势，它的作用远远比造一个宝钢重要得多。未来商业模式的竞争，主要是平台的竞争。

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面临国内外激烈竞争，上海发展平台经济还得下番功夫。“平台经济是指利用平台商业模式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特定群体，为它们提供互动机制，满足所有群体的要求，并巧妙地从中盈利的商业模式。”这就要求采用平台这种商业模式的企业，只有做到合作伙伴做不到的事，或者做得比合作伙伴自己做性价比更高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平台。委员们指出，选择平台战略的企业需要有“合作共赢、先人后己”的精神。

平台商业模式的精髓，在于打造一个完整的、成长潜能强大的生态圈。它有独树一帜的精密规范和机制系统，能有效激励多个群体之间的互动，达成平台企业的愿景。所以，上海发展平台经济，一定要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进行，要打破地域界限，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立足于服务全国、服务国内外的视野，思考发展的路径和规划。

“应当切记，城市本身就是独树一帜的平台生物圈，是需要政府来经营的。”委员们认为，在当下这个基于云端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有雄心的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必论平台，但能成为平台的乃凤毛麟角。平台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生态圈的支撑。它需要高效的政府服务、完善的政策法规、便捷的金融支付网络、集约的物流服务、可激励的人才政策、强有力的信息支撑等等，当然还有对平台企业的监管和信用体系的保障。而这一切是政府可以有所作为的。政府并不是全部要自己做，关键在于各类政策的引导、因为政府的责任，就是经营城市的环境运行。

激活企业显活力

经济学史就是一部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的争论史。金亮常委代表市工商联课题组所作的发言“调整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以当下上海经济运行为背景，给出的答案是：“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激发企业发展活力，特别是要释放民营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

课题组认为，尽管目前本市民营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但是面临新形势、新要求，民营经济、民间投资还面临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不”，即难题破解不落实、政策措施不配套、服务机制不健全。

课题组建议，首先要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契机，

探索调整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自贸区建设的核心，自贸区应该成为政府改革，特别是在管理服务企业上创新思路、创新模式的“试验田”，试验出高效、精简，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管理模式，切实成为一个“小政府、大社会”。要抓紧制定自贸区内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形成与国际化、法治化相配套的制度环境。

课题组提出，应该抓紧研究建立自贸区商会组织——“这个商会组织是要与国际接轨的，不分所有制的，切实在促进企业发展、推动政企沟通、加强企业自律和维护企业权益上发挥作用。”

应该以简政放权为着力点，推动政府加快职能转变。要营造公平竞争的氛围，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市场准入上根据产业制定标准，在政策安排和执行上对各种所有制一视同仁，在服务民营企业上主动贴近一步，靠前服务。要关注市场环境建设。政府应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上下功夫，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环境。应该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合理选择授权、委托与购买等职能转移方式，把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部分服务职能逐步向行业协会、商会等商会协会转移。

课题组指出，顺应当下形势，应该推动国资、民资融合发展，形成国有与民营相得益彰、合作共赢的局面。具体做法可以是——

鼓励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资本融合。搭建平台，引导民营企业积

极参与国资国企改革、重组。

加快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产业对接。围绕航空、汽车、造船、化工等重点产业，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和零部件配套等方面，加强与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民营中小企业开展上下游产业链合作。

引导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联合对外投资。发挥民资的市场经济特性和国资资本优势，在开展海外投资和并购活动中加强合作，共同实施“走出去”战略。

此外，不妨推动本市重大建设项目面向民间投资公开招标。在这方面已经有广东、四川、云南等省经验可供借鉴，上海可以在交通、能源、城建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推出一批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运营的具体项目举行公开招标，对符合产业导向、具有发展潜力的投资项目和企业，集中梳理名单，进行跟踪服务。

体系增强创新力

上海经济未来的动力是创新。而创新体系是一个国家或区域融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于一体，实现全社会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创新机构之间相互协调和良性互动，充分体现创新意志和目标的系统。范铠常委代表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课题组作了“推进创新体系建设、增强上海经济竞争力”的发言。

课题组注意到，在创新资源丰富的上海，其支柱产业却极少有以自主技术为主的；有些以自主技术为主的企业还未长大就选择离开了上海。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究竟是什么？

课题组给出的答案有四个方面：一是缺乏具有创新资源组织整合能力的企业主体，企业缺乏人才、尤其是高端创新人才的格局未得到根本改变；二是共性技术研发和服务支撑不够，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组织仍缺乏有效的支持机制；三是技术转移缺乏效率，促进技术转移的政策和中介服务需要进一步完善；四是适合企业创新的土壤不够肥沃，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政策落地难、流通高成本挤压利润、社会造富行业的价值观等创新负面因素仍然存在。

针对上述问题，课题组提出：首先要抓好创新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

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加强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市级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工程、市级科技金融项目的整体布局和协同推进。在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中，也要研究吸引创新要素的参与。

要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培育。进一步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确保发挥企业在创新目标提出、资源配置和组织实施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探索后补贴的方式对企业技术创新进行资助。

必须建立创新人才的长效激励机制。要以企业为主体，实现社会化、市场化的“人才+项目”培养模式，在实践中集聚创新人才。要加大对

人才的投入，鼓励人才以专利、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加快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落实，使其切实起到示范效应，以激励创新创业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的合理流动。

要加强应用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服务。着力推进以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为核心，应用型科研院所、企业和高校等广泛参与的应用技术体系建设。可参照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做法，加强共性技术研发与服务。着力完善创新创业的全过程服务，包括强化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园区服务等功能，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办孵化器，培育发展专业化、市场化的知识服务机构，进一步完善创业服务链。 ■



市场化改革与顶层设计

◎ 应健中

每个年代都有反映这个年代的关键词，记得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在探索中国经济怎么走时，来自官方和学界有个关键词叫作“尚方宝剑”。现在的年轻人没听说过这个词，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学者好像又忘了这个词。当年，大家都认为任何改革只要领到了这把“尚方宝剑”，似乎就可以一马平川了。

这几年开始流行“顶层设计”这个关键词，现在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寄希望于有一个万能的顶层设计，用这个顶层设计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各行各业的管理层似乎对这个顶层设计也是当仁不让，比如：中国证监会近期就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乖乖，好厉害啊！不光是有顶层设计，还要有“制度供给”，这新名词来得也真快。

当然，一项好的公共政策的确需要思路对头、方法得力，推出后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并形成良性循环，这也许就叫顶层设计。举个例子，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型城市交通都面临车辆保有量与城市道路和谐发展之间的矛盾，于是，车辆牌照管理就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多年前，上海推出车辆牌照公开拍卖制度，用市场化方式来进行管理，而车辆拍卖的收入专款专门用于道路建设。这项制度开始时也受到社

会的广泛议论，反对者众多，前几年还差点夭折，但上海不但坚持了下来且不断完善。这10多年的实践证明，上海这项公共政策完全正确，完全是用市场化的手段，既能导致车辆牌照的合理发放，又解决了上海的道路交通建设资金来源问题，使上海道路交通管理形成了良性循环。尽管当时推出这项公共政策时还没有顶层设计这个概念，但这个案例确实是一个顶层设计成功的经典案例。

相比之下，国内有的大城市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径，以摇号等低成本的方式来派发车辆牌照，结果道路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搞得到车辆牌照的人手中有几十张牌照，而想买车的人面对百分之几的中签率仍然是新车上不了牌，道路的资金来源还是十分匮乏。不同的管理思路造成了不同的结果，顶层设计的偏差说到底还是认识的偏差，车辆牌照看似一种道路通行权的凭证，说到底它还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所有权，在城市交通越来越繁忙的当下，这种通行权的取得是需要支付对价的，这也就具有了财产所有权的特征。10年前为取得通行权而支付两、三万元钱车辆牌照费的车主，当初也许有点耿耿于怀，但现在看到车牌已经涨到了8万元，一旦你卖车时还能卖出牌照，这就带来了资产的升值。也许再过10年、20年，

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车辆牌照费达到10万元或20万元，到时车卖掉了或者报废了，而牌照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当年买车的钱，这岂不意味着这十多年的车是白送给你开啦。这种想象力并非天方夜谭，看看现在新加坡的车辆牌照价格，也就能理解这个问题了。可以说，上海十多年前出台的这项公共政策取得了多赢的格局，这就是一项好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好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这两年冒出来的新名词，其实当年邓小平就说过这样的话：不好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而好的制度则使坏人做不了坏事。很通俗地表达了顶层制度设计的重要性。大到国家的重大政策，小的一个城市、一个行业的规则，都有一个顶层设计问题，顶层设计最怕犯颠覆性错误，一旦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在过往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这样的错误都有实例佐证。

一个社会的发展要有良好的顶层设计，但更多的还是由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而步步推进的，有的甚至是通过倒逼机制倒逼出顶层设计的，如果不注意这种利益博弈，只想设计出那些自以为可以包打天下、包管一切的制度，这也不切合实际。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顶层设计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叫作“加强顶层设计和摸

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顶层设计是自上而下的，摸着石头过河则是自下而上的，接下来两者要结合起来，怎么结合，相信在未来十年的公共政策推出上会更注意协调这种关系。

再来看看股市是怎么进行顶层设计的。中国股市管理层提出要对股市进行加强“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但是现在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接下来股票怎么发，已经暂停了一年的新股现在依然难产，管理层对此的最新表述是：“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IPO重启，必须对过去IPO的办法进行较大的改革，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目前，证监会正按照这一目标，抓紧完善指导意见及各项配套文件，新股发行要在改革意见正式发布实施后才能启动。”至于接下来新股发行方法怎么改，实际上这也不是投资者所能决定的，纵观20多年的各种新股发行的版本，每一种方法都有利有弊，要想“顶层设计”出一种只有利没有弊的方法，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这个想法似乎有点天真吧。股市的任何波动和任何政策，都会有一半人满意、一半人不满意，涨了，手中有股票的人满意了，踏空的人不满意，跌了，已经出货的人满意了，套牢的人不满意了，要所有的人都满意不可能。所以，既要顶层设计，还要加强“制度供给”，对这个本身就是博弈市场的股市来说似乎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所有的领域中，恐怕股市是最难进行顶层设计的。

记得六年前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短短的16字让投资者兴奋了一阵子。财产性收入的含义很深，银行存款的孳息、股票、

债券、房产、股权、资产租赁……都可能带来收益，这是除了劳动收益之外的另一种更高层次的收益，可以这样认为，老百姓财产性收入越高，幸福指数也越高，社会也越和谐稳定。这些年下来，在各种能带来财产性收益的投资渠道中，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有的投资渠道带来了稳定收益，有的不但没带来收益，还带来了财产性损失。

此次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未来发展方向中，有这样一段话：“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三个富有诗意的“让”勾画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活力，第一个“让”是五个经济要素的迸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当代经济的发展缺一不可，特别是资本的活力显得特别亮眼，可见未来十年股市有戏；第二个“让”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让一切源泉涌流，说到底所有经济要素的发力，关键还是要创造财富，要有财富效应；第三个“让”，就是要将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样社会才会和谐稳定，未来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

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出台了，对于股市而言，影响究竟如何？用大家熟悉的关键词来说，那就是利好。当然这个利好并非是指一两天的行情，甚至于也不是指一两个月的行情，这个利好指的是长期趋势，经济发展进入第二季的高潮恐怕要在几年之后，前十年股市出现过从1000点到6000点的大行情，未来十年中也相信会产生类



似的大牛市，只是现在时间还没有到而已。

实际上从这三个“让”中可归纳出三个关键词，那就是：要素活力迸发、财富效应、惠及人民，要达到这个目的，要通过各类市场显现出来。就股市而言，过往的六年，股市不但没有让大家获得财产性收入，反而成了财产性支出的市场。过往的IPO造就了一大批资本人物，却没有惠及广大股民，这种状态需要在未来十年中扭转。当然股市自有股市的规律，不能将长远的发展目标对应于股市的日常走势，但是一个决定未来十年大政方针的目标，其结果如何，最终都会在长期趋势中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而论，未来经济活力的迸发、财富效应和惠及人民的经济纲领，最终会在股市中得到检验。所以，投资者从长远布局而言，大可对股市保持着期待感，并用多头思维去捕捉未来的市场机会。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目标。我认为，对于股市而言，应该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于股民。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人士）

上海艺术品市场的结构和时代变迁

◎ 祝君波



所谓艺术品市场，笔者认为由市场需求、市场供给、商品、市场中介商、价格体系五个要素构成。中国大陆的艺术品市场在1956年以前是存在的，但1956年国营化以后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计划经济的时代，国家把经营文物的权利交给了几家指定的机构，每个省只有几家经营文物的商店。几乎没有人从事收藏，因为1956年以后统一的工资制度和政治体系已经把这种真正的收藏需求遏制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恢复了所有的市场。所以中国大陆的市场与台湾、香港不一样，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有市场，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市场，改

革开放后恢复了市场。然后市场实现了跨越，由民国时期那种单一的市场发展到超空间的全球融合的大市场。从前的市场是单列的价格，而今天的市场以拍卖行为主导，加上像雅昌艺术网这种咨询业介入以后，形成了透明的价格体系。

上海艺术品市场由四个要素组成

第一是艺术品市场的中介。先从古玩店谈起。民国时期上海有很多古玩店，也有古董街。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叫公私合营，实际上是取消了私营企业。在那个时代，中介基本消失了。

笔者当年就在朵云轩当学徒，进了朵云轩，才知道这一行公私合营是怎么进行的，1956年以前所有的画店合并到朵云轩，只用朵云轩一块招牌，我进店的时候，50来个员工来自于九华堂、九福堂、上海荣宝斋、清秘阁等十几家店，一网打尽。所有的古董店全部并到广东路文物商店，所有卖旧书的并到上海古籍书店。那是一个“三家村”的时代，上海这么大一个地方，只有三家商店可以做艺术品的中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了地下古董商，当然是不合法的。之后散户的古董店又变成了古玩城，原来在福佑路，很多古董店进了中福古玩城。肇嘉浜路是上海很有名的钱币古钱街，现在都搬到了云洲古玩城。上海很多的古玩城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第二是画廊的出现。民国时期没有画廊，只有画店。民国年间朵云轩只有九名员工，惨淡经营。画廊出现以后西方的理念来了，和朵云轩这类画店不一样，画店像百货店，画廊像专卖店。画店基本上经营中国书画，画廊经营得更多的是油画和当代艺术。一家家分开的画廊是显不出规模来的，所以要搞集聚，就出现了红坊、莫干山、田子坊这样的艺术创意园区——画廊的转型时代来临了。

第三，中介最大的变化是20年前上海开始引进佳士得、苏富比的拍卖形式。在上海朵云轩开始拍卖实务以前的上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人在做艺术品拍卖了，比如说东华拍卖行，它是兼营艺术品拍卖的。但是真正成功的分水岭是朵云轩打响艺术品拍卖第一炮，引起大家的注意。在2000年前后，上海是敬华和朵云轩交相辉映的时代，当时北京和上海的艺术品拍卖差距大概是6:4。

第四是艺术博览会进来了，最早的艺术博览会可谓是画廊的季节性展示，上海现在主要的艺博会是秋季艺术品博览会。

上海的艺术品供给与需求

谁来向市场提供艺术品？一个地方艺术品市场的存量是当代存量和历史积淀的汇合。上海这个城市为什么会成为民国收藏的“半壁江山”，这和上海周边江南这个概念的历史存在关系紧密。南宋以后，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家、名家，如元四家、明四家、清初四王、浙派、皖派、华亭画派、西泠八家、金陵画派等等都生活在这个区域，南宋以后的美术史等于在写一部江南美术史。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这个城市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加上后来移民潮的冲击，上海成为艺术家的集聚区。移民潮之后，上海本地产生了海上画派，来自江南地区的货源亦向上海集中。

据朵云轩的老员工回忆，1958年至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安徽、江浙地区一些人把古董、书画拿到上海来卖，很便宜的价格，四五块钱一幅，周边地区的货源都



在流向上海。南方的工艺品，自乾隆下江南以来，紫砂壶、印石、瓷器、织造品、文玩、玉器争奇斗艳，上海具有成为收藏重镇的货源条件。改革开放带来最大的变化是货源原先向海外流动，变成向上海、向内地流动。

艺术品市场的需求者，历史上就是官、商、仕，上海的收藏族群中有文人收藏，也就是仕这个阶层的收藏更多一点，比如说刘海粟、吴湖帆、谢稚柳、程十发、唐云、钱镜塘等。

海纳百川的移民潮，使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和文化中心，艺术家的集聚、官僚的集聚、实业家的集聚，导致上海出现巨大的艺术品需求。现在看到的上海的很多豪宅、洋房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这么多优质资源在上海聚集，必然成为收藏的“半壁江山”。

1956年以后计划经济的时代是本地需求消失了，当时是鼓励收藏家把藏品送到博物馆去。当时艺术

品的流向地是日本、新加坡、北美和香港、台湾地区。中国有文物，但是没有市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巨变是形成了本地市场。

最后是商品结构的变化。第一，书画一枝独秀的时代维持了很长时间，包括上海地区的拍卖基本上是以书画为主；第二，油画、当代艺术的介入。上海出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就是陈逸飞，他带动了油画在上海的兴起；第三，古玩市场的兴起；第四，由古到新的变迁。现在大家都愿意买新东西，为什么？第一，没有那么多古物；第二，古玩造伪技术的提高和鉴定的风险；第三，新工新料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被再发现，即新工新料的价格涨得很快。

归纳一下上海的艺术品市场——第一，上海是大中华区的收藏重镇；第二，分析上海的艺术品市场不能只看拍卖市场；第三，金融中心和特大都市的建设将给上海的艺术品市场带来前瞻性的动力。 ■

农民工流动家庭化的趋势及其政策应对

◎ 马流辉

从世界范围看，人口的流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锋阶段；二是家庭化阶段；三是大众化阶段。于中国而言，构成当下流动人口主体的农民工，其流动模式的家庭化特征日趋明显。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个体化流动所带来的农村留守人员问题，对维持农民工在城市中家庭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发展趋势同时也给城市的管理秩序和公共物品的供给提出了新的挑战。政府应对农民工流动家庭化的挑战，需要从转变管理思路、升级产业结构以及协调城乡发展三方面着手，以化解由此而带来的种种困境。

特征呈现与原因探析

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农民工流动逐渐告别传统的个体化流动模式，其流动的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正因如此，那些曾经滞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和妇女，作为农民工的“家庭携带人员”不断向城市流动，农民工居家迁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具体的实践中，农民工流动家庭化的趋势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以核心家庭为基础。根

据我们在上海的实地调研，农民工“家庭携带人员”的数量有限，边界清晰，其家庭结构主要以核心家庭为基础。大部分农民工将自己的配偶和子女带入城市，家庭中的老人及其他亲属则留在农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工的经济能力有限，无力支付更多家庭成员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以户籍为基础的保障制度安排，使得部分家庭成员必须留守在农村，才能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

第二，携带人员在业率低。农民工虽然举家迁往城市，但并非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被城市中的非农岗位所吸纳，农民工“家庭携带人员”的在业率较低。以我们调研的上海远郊桥镇为例，全镇有外来人口17万人，但仅有5万人在正规企业就业，被纳入政府的统计范围。另外12万的外来人口基本处于待业或非正规就业状态，这其中有超过60%的人属于农民工的“家庭携带人员”。所以，在桥镇，一个颇为悖论的现象是，一面是企业的“民工荒”，另一面却是大量的外来闲散人口。规模甚巨的农民工“家庭携带人员”无所事事地滞留在城市，这本身就潜伏着矛盾和冲突。

第三，非经济动机明显。在农

民工流动的初始阶段，家庭中的男性劳动力以个体化的方式向城市流动，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好的工资待遇，通俗地说就是“打工赚钱”，其经济动机明显。但当下农民工的家庭化流动，其主要不再是物质上的考虑，非经济动机比较强劲。现今，以8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更加注重个人的权利和强调生活的质量。为享受完整的家庭生活，让孩子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他们开始拖家带口地来到城市。从经济角度来说，那种城乡分割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模式是低成本的，但其社会代价是昂贵的，这从第一代农民工家庭中可略见一斑。但看似不经济的流动家庭化，可以为农民工家庭带来更为积极的社会效应。

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是宏观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与微观个体能动性的发挥相互形塑的结果，所以，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和个体特征。具体来说，农村和城市的一系列制度变迁，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发展变化，是导致农民工流动家庭化的重要原因。

首先，农村土地流转的顺畅。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之间的体制壁垒在形式上虽有所松动，但一系列

的制度安排仍然束缚着农民的自由流动，这在农村体现得尤为明显。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土地依然附着沉重的税费负担和粮食订购任务，所以，农民工家庭中必须有人留守农村经营农业，以完成所谓的“皇粮国税”，而无法实现家庭化流动。2003年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以至2006年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国家在农村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使农村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其中，尤为重要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确立，它让农民日渐摆脱土地的束缚，成为真正的自由人。在此背景下，原本农村留守人员与城市农民工团聚成为可能。土地流转不仅为农民松绑，由此带来的租金收入，还可以支持农民工流动家庭化的城市生活成本。

其次，城市管理体制的包容。作为农民工流入地的城市，早期阶段出台了各种限制农民工流动政策，尤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最具代表性。农民工的自由流动不仅面临极大的限制，甚至随时都有可能遭遇收容遣送的噩运。所以，早期的农民工流动主要以家庭中的男性为先锋，以个体化的方式进入城市，为降低在城市的风险，而将其他家庭成员留守乡村。随着城市管理体制体现出包容性和开放性，传统的限制农民工流动的各种制度走向终结，各种保障农民工相应权益的制度相继建立，城市管理更具人性化。由此，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也被城市接纳和承认。

最后，农民工待遇的提高。农民工流动家庭化的实现，不仅有赖于各种制度的支持，更仰仗农民工本身工资待遇的提高，否则他们将无法支付整个家庭在城市中的生活

成本，也就谈不上举家迁移。从宏观经济结构来说，自2005年中国出现了罕见的“民工荒”以来，此后，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尘嚣甚上。无论争辩的结果是什么，显而易见的是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在增加，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殆尽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于农民工而言，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他们工资待遇的提高便成必然趋势。当然，农民工工资待遇的提高，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宏观经济结构作用的结果，它与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发展和职业技能的提高有关。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也很强，他们能够胜任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不再仅仅局限于体力劳动。藉此，他们获得较高的收入待遇，也属天经地义。简言之，农民工待遇的提高，是支持其流动家庭化的经济基础。

现实挑战与政策应对

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具有积极的效应。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家庭化的流动模式，维持了农民工家庭生活的完整性，有利于约束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失范行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而导致大量外来人口向城市涌入，使得各种矛盾和冲突得以在城市中集中展现，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第一，掣肘公共物品的供给。众所周知，城市公共物品的配置往往是以户籍人口为依准，诸如警察的数量、医疗资源的配备、学校的规模设计等，这些都与户籍人口相挂钩。农民工流动家庭化带来大量

的外来人口，他们相应的公共物品需求也需要城市来满足。但问题是，城市的公共物品增量并没有按照外来人口的比例相应增加，而地方政府要回应外来人口的需求，必然导致其公共物品供给的超载。在东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的城市出现所谓的“人口倒挂”现象，而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是此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势，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第二，冲击城市的管理秩序。如前文所述，农民工的家庭成员落脚城市以后，并非完全被非农岗位所吸纳，待业或非正规就业成为他们普遍的存在状态。非正规经济不但是外来人口在城市谋生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满足底层群体低端消费需求的重要载体。在上海郊区一些城镇调研过程中，那里的“黑市经济”蓬勃发展，诸如黑诊所、黑网吧、黑车、黑中介，等等，不一而足。类似非正规经济的存在，为城市底层群体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可以低成本地支持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些场所和经济领域，往往又隐藏着各种社会失范行为，甚至是城市违法犯罪的温床，冲击着城市的管理秩序。即便是那些合法经营的流动摊贩，他们在客观上也是有碍城市一体化的秩序要求。因此，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给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三，加速乡村社会的凋敝。以前，我们总以“386199部队”（妇、幼、老）来描述乡村因农民工的兴起而出现的颓势。如今随着农民工流动家庭化趋势的强化，妇女和儿童也随着农民工由乡村走向城市，

阶段性地告别乡村社会。随之而来的便是，乡村空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唯老弱留守成为乡村的真实写照。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获得现代性体验的渴望，更是年轻一代厌弃乡村的重要动因。于很多乡村年轻人而言，他们落脚城市但并没有扎根，可乡村的记忆正在他们的头脑中淡去，他们也不愿意回到乡村。进不了城、返不了乡，这些年轻人成了“卡住”的一代，无根感尤为强烈。无疑，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使原本空心化的乡村更加凋敝，乡村文明的存续遭到极大的挑战，乡村的前途随着人口的城市化而飘摇不定。

农民工流动家庭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需要我们积极加以应对。在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要将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当作一个系统，既要考虑城市，也要兼顾农村，在城乡一体化的视角中，化解其所引发的诸种后果。

首先，转变管理思路。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已成为当前人口流动的重要趋势，我们必须直面这一社会现实。对于城市政府来说，其管理思路要作出相应的转变，城市的管理重心应该由传统的户籍人口转向常住人口。这就要求，在城市中公共物品供给的过程中，酌情考虑常住人口的需求，适当照顾他们的情绪，让农民工的家庭成员在城市中有相对体面的生活。具体而言，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公共物品供给时，要将城市的常住人口作为一个重要参考要素。这样说，绝不是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乌托邦式叫嚣，就现阶段来看，政府尚无力满足这一要求。不过，我们在要求政府转变管理思路的同时，也要强

调企业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为，企业在获利的过程中，分享了农民工的剩余价值。

其次，优化产业结构。理论上，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与其人口结构是相匹配的，而城市中大量农民工的存在则说明，这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占有很大的比重。要想将城市中农民工的数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就必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其转型升级，以吸引高端人才。上海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对合理调整人口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优化产业结构并不是完全终结所有的传统产业，而是以此为契机，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同时，也为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提供条件，促进农民工的就地城市化，分解大城市因农民工流动家庭化所带来的压力。当然，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不意味着对农民工的彻底驱逐，因为城市中的相关行业，离不开农民工的辛勤工作。

最后，协调城乡发展。从本质上说，人口流动或迁移，主要还是因为资源和机会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这在中国集中表现为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有的优质资源和发展机会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这样，农民工以家庭化的形式进入城市便无可厚非，但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却值得我们反思。人口过于向城市或大城市集中，对交通运输、住房、环境卫生都构成巨大的压力，各种“城市病”接踵而至。缓解此困境，需要协调城乡之间的发展，通过产业转移和新农村建设，激发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活力，让农民可以在家乡实现就地城市化，而

无需长距离拖家带口地往返流动。如此，不但可以缩小城乡差距，对平衡区域矛盾也大有裨益。所以，协调城乡发展是应对农民工流动家庭化挑战的根本出路。

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这一发展趋势所呈现出的特征，展现了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一些共同点，为我们整体性把握流动人口特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剖析农民工流动家庭化的原因，不仅需要聚焦各种外在的制度性变迁，也要回归农民工本身，关注其自身素质的发展变化。换句话说，是宏观制度与微观个体共塑了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值得肯定，但其引发的一系列挑战需要我们积极回应。化解农民工流动家庭化的困境，需要从整体着眼，处理好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产业结构与人口结构以及城市发展与乡村建设这三组关系。唯此，才能从根本上医治由此而带来的诸种病症。

农民工流动家庭化这一发展趋势充分说明，惯常的将农民工仅当作劳动力、消费者或一个生产要素，进而对其进行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做法不再奏效，他们越来越强调作为人所享有的各种公正待遇。当下，诸如此类的权利伸张，正改变着农民工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此来获得更多的原本就属于他们的公民权。在结构化视角中，流动可视为作为行动者主体的人对既定结构的反应，而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能否在实质意义上转变城市管理思路，重新书写城乡关系，甚至修正我们的大城市发展战略，是我们期待的。

苏州河文化旅游：诊断与思路

◎ 王慧敏 司马志 刘平



外白渡桥

在近现代上海城市发展历程中，苏州河举足轻重，是城市历史文化、国际化城市形象和都市旅游经济的重要载体，具有极高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经济价值。《上海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苏州河风貌区旅游带作为三条黄金旅游集聚带之一，在“十二五”期末要打造成与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相匹配的新兴旅游集聚区域。苏州河流域被视作上海建设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一块战略拼图。

苏州河文化旅游发展诊断：问题与制约

苏州河文化旅游当前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资源产品化程度低，结构单一，文化附加值低。

苏州河资源产品化程度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很多资源未被产品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河两岸列入保护的54处遗存建筑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未能充分利用。其二是资源产品化的深度不够。水上旅游的导览设施欠佳，苏河27座桥梁，是天然的桥梁博物馆，但缺少文化渲染与包装。

产品有效供给的不足，主要是产品组合的丰度不足，导致苏州河旅游产品结构相对单一，这极大限制了苏州河整体旅游品牌的塑造。

二、产品散点化，布局碎片化，“苏州河旅游”有名无实。

从现有产品的空间联系看，苏州河的文化旅游产品基本上处在一种“单点散布、点不成线”的状态，彼此间缺少互动与整合。从各城区的开发布局看，苏州河的文化旅游表现为一种“各自为政，碎片布局”的状态。最重要的一点是，现有产品支撑不起“苏州河旅游”这一品牌，换言之，“苏州河旅游”品牌并未真正建立。当前的苏州河水上观光巴士的市场吸引力极其有限，零星的景点与碎片式的景区，导致苏州河旅游有名无实。

三、滨河游憩空间储备严重不足，公共性、亲水性、水陆联动性差。

受房地产开发、城市道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心城区的苏州河沿岸的公共绿地屈指可数，割裂了可用作河滨步道的空间完整性与可进入性。

苏州河文化旅游的发展，最根本的制约源自条块经济体制下的多头管理机制，这首先导致管理重叠与管理缺失并存。苏州河文化旅游的开发与管理涉及诸多部门，包括各区县政府、市规划局、旅游局、文化局、交港局、海事局、治苏办等，缺乏一个责任明确、权限匹配的管理机构，对苏州河全流域进行统筹开发和管理，造成了基于全局视角的战略发展纲要与指导性规划的长期性缺失。尽管人们多次呼吁苏州河发展总体规划，但迟迟不能出台。



苏河艺术



梦清园内邬达克设计的老建筑

苏州河文化旅游总体发展思路： 对策与路径

一、总体思路。

苏州河文化旅游的发展，必须牢牢定位于苏河流域历史文化——主要体现上海本地文化，而非黄浦江所展现的海派文化与上海城市休闲生活文化这条主线，制度创新先行、规划设计领路、多元整合推进。

二、加快推进苏州河文化旅游整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路径之一：制度机制整合。

坚持市府主导战略，对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进行机构创新，新设苏州河开发管理办公室。苏州河环境治理取得重大成效的一个重要经验，是突破“条块治理”的制度机制创新，即1996年成立的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苏治办”）。从治城的角度看更高价值目标的苏河环境治理，如果依托“苏治办”的机制优势与管理经验，以较小成

本进行机构创新，能获得更大的城市经营收益。因此，依托“苏治办”的框架基础，增设上海市文化、旅游系统席位，逐步从“治水为中心”的单一目标架构向“治水治城并重”的二元目标架构转变，形成“治水”与“发展”两大职能体系。新的管理机构，是上海市市长领导下的相关区县、市级各委办局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度与决策机构，全面负责苏州河开发与管理的各项重大事务的决策、执行与协调。

重新审视各项相关标准的时效性，全面展开标准创新研究与设计工作。

立即着手编制《苏州河总体发展规划》。尽快开展招投标工作，编制高水平的苏州河全流域发展概念性规划和总体规划，明确苏州河总体发展定位、发展方向与重大发展举措。

路径之二：文化主题整合。

苏州河文化旅游发展应重点挖掘与整合上海近代民族工业文化、近现代苏州河流域民居生活文化、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三大主题。

路径之三：空间布局整合。

强调大苏州河视角，将大虹桥商务区纳入苏州河总体空间布局框架，提前对两岸地块与建筑进行控制。

优化水陆交通组织布局。加快建设水上游船码头与优化滨河道路体系，提高游路的完整性和可进入性，串联苏州河及其两岸的重要旅游节点。

路径之四：功能业态整合。

重点打造滨河大型CRD（culture recreation district）。综合布局餐饮娱乐、中高档购物、文化创意等重点业态，让游船码头与水上游览紧密结合，实现水陆联动。可布局的地区包括大虹桥商务区及普陀区、长宁区、静安区、闸北区等。

路径之五：开发管理整合。

建立上海国资控股的苏州河旅游集团公司，负责上海苏州河全流域的开发管理，并尽可能地对两岸资产的产权关系进行梳理，为整合发展理顺产权关系。

以新能源经济助推 崇明生态岛低碳绿色发展

◎ 民进上海市崇明县委

“十二五”期间是上海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时期，也是崇明深入推进现代化生态岛建设的关键时期。崇明作为支撑上海大都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空间储备，通过全面打造“新能源产业”，深入推进新能源的高效利用、太阳能建筑的使用、绿色交通的构建、生态农业及旅游观光产业发展，探索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满足国际期待、追求更高层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区域低碳发展新模式和新路径，是崇明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发展现状与基础分析

一、绿色能源资源条件

崇明拥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浅层地热能等绿色能源资源，为较大范围替代常规能源提供了可能。

二、绿色能源开发利用现状

根据崇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等因素，形成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浅层地热能等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模式。一是在风能

开发利用方面，东滩风电场、长兴风电场和前卫风电场已并网发电。青草沙风电场目前在建，北堡风电场正在筹备中；二是在生物质资源利用方面，崇明县的秸秆资源还没有实现集中化、规模化应用，仍停留在农户低效、分散利用的状态。在建的生物质能项目主要有上海崇明岛农业废弃物综合处理利用中心、上海竖新镇生物质能气电热联供项目等；三是在太阳能利用方面，

目前崇明分散型利用可节约标煤约9035吨/年，集中型利用可节约标煤约397吨/年，合计约9432吨/年；四是在浅层地热能利用方面，已建成的项目主要有三个，年节电量25万千瓦。

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和一系列政策，上海

地方政府也积极努力营造适宜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和资金支持。但崇明要打造生态岛的新能源产业，还面临着一些实际的困难和问题。一是综合开发成本较高；二是核心技术比较缺乏；三是专业化人才缺失；四是政策措施不够完善——政策引导还比较粗放、缺乏可控性，在激发市场需求、提升自主研发等关键环节的扶持力度不到位。

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和生态岛功能定位，崇明应选择能耗低、附加值高的能源环保产业，如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检测、服务等，致力打造研发设计中心、核心零部件制造基地、技术检测中心、投融资中心、商贸交易中心、人才培训基地、专业化服务中心等。

发展思路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崇明现代化生态岛建设总体目标，以“新能源产业”为核心，全面推进崇明全县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农业及旅游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将崇明打造成为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特色鲜明的低碳发展理念及实践集成示范区。

二、战略定位

新能源的示范研究基地。充分发挥崇明的资源优势，充分利用上海的产业基础优势、科教研发优势、人力资源优势，通过构建“崇明新能源示范研究基地”，引进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所、知名高校在崇明筹建分所，将崇明打造成为新能源

“产、学、研”一体化的试验综合基地。

新能源产业的拓展和服务基地。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与生态岛的功能定位、生态产业的培育要求相结合，坚持培育新兴能源环保产业与促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并举，依托新兴能源装备制造能力，促进新能源环保服务业的规模发展，形成若干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能源环保产业链。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以新能源经济为引擎，坚持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让崇明成为全国人民的生态花园。

国际新能源合作和生态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通过举办关于新能源政策的研讨会，开展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规划领域的合作，促进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持续交流，全方位开展区域性、国际性经贸文化交流活动，使新能源产业成为崇明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重要国际交往平台。

三、基本原则

坚持顶层设计，有序推进。要从推进低碳发展的全局角度，对新能源开发和高效利用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

坚持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建设开发模式等方面积极探索，将新能源产业发展作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贯穿于规划、政策、标准规范等。

坚持国际标准、打造精品。崇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定位必须要有全球化的视野，要用国际标准，高起点定位、高标准建设，将崇明生态岛打造成能源环保企业总部的集

聚高地、能源环保装备的产业高地、能源环保服务产业的战略高地。

坚持强岛富民，普惠民生。将崇明生态岛打造成为新能源企业驻地的品牌形象，进一步拓展在能源咨询、融资领域以及新能源的教育培训咨询和旅游观光方面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和商业机遇。让老百姓充分享受到国际生态岛建设发展的成果，将崇明生态岛打造成为老百姓的幸福家园。

发展重点与任务

一、新能源的集成示范

聚焦绿电、风电、生物质能、天然气、煤炭的洁净利用、通用用能系统、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等重点领域，打造若干个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能源环保综合示范与集成应用基地。如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加大太阳能的建筑应用；通过政府扶持、政策导向等方法鼓励岛内客运、旅游部门引进绿色环保和清洁能源汽车，积极构建“低排放、低噪声、低能耗”的绿色城乡交通体系；建设生物质发电项目、农村沼气项目等。

二、新能源的装备研制

聚焦风电、太阳能、通用用能系统、分布式供能系统、智能电网等重点领域，建设若干个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关键部件研发和生产基地。风电形成2MW陆上风机系列和3MW以上大型海上风机系列整机批量制造能力，培育关键部件配套产业链，力争进入国内风电第一梯队。太阳能重点发展高效非晶薄膜太阳能电池、高效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及其核心装备，形成整线生产设备产业化能力。

三、新能源的 技术研发

聚焦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分布式供能系统、智能电网、绿色照明等重点领域，着力攻克能源环保关键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建设若干个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研发高地。建设国内领先的风电轴承、电控系统、发电机等关键部件研发基地。

重点攻克太阳能电池技术及下一代太阳能电池技术，跟踪研究光热发电技术。深入研究太阳能热利用与建筑一体化技术及太阳能与天然气互补技术。生物质能聚焦垃圾发电方面要，重点攻克城市生活垃圾填埋气和垃圾焚烧的成套装备集成技术，积极研发发酵产沼、生物脱硫等关键技术。

四、新能源的环保服务

聚焦交易平台、投融资平台、公共服务平台、能源服务企业等重点领域，打造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环保服务业。一是整合交易、培训、咨询中所涉及的相关信息，建立完整的能源环保产业相关产品市场交易机制，构建一个集信息发布、技术支持、碳交易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二是构建投融资平台。着力发展绿色基金、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培育碳资产管理公司、碳经纪商和绿色信用评级机构，鼓励各类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参与新能源产业相关的投融资项目；三是大力发展能源环保咨询类中介机构，为上海新能源产业领域提供有效的信息咨询、项目



设计、经营策划、服务评估和检测服务；四是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规模较大的专业能源服务公司，提供信息咨询、能源审计、节能减排项目设计、设备和材料采购、项目建设、运营维护、人员培训、节能监测等全程服务。

措施建议

一、落实新能源产业相关政策，完善相关体制机制。

一是落实能源环保产业相关政策，提高政府服务效能，提高新能源项目落地前期手续办理的工作效率；二是加强资金扶持力度，形成崇明新能源产业融资机制；三是在资源、资金、技术、项目、人才等方面，与企业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二、制订相关专项规划，促进产业规范发展。

一是针对发展重点，制订专项规划。加快出台崇明新能源产业的总体发展规划，对节能型通用用能系统、生物质能、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新材料等细分领域制定中长期

专项发展规划；二是抓紧制定修订法规标准，促进产业规范发展。为了营造规范化、效率化的发展环境，建议国家层面尽快健全能源环保产业的法规标准体系。

三、加强国内外合作交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抓住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机遇，发挥上海要素市场的优势，

在清洁能源利用、能源的清洁利用、能源的高效利用、能源环保服务业等方面，广泛地加强国际国内合作，提升崇明的新能源产业能级。特别要加强与其他兄弟省市，特别是与资源地及长三角周边地区的合作。利用政策引导，推动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形成。坚持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相结合，大力建设新兴能源产业专业队伍。

四、推广使用节能建筑为先导，培养高素质生态岛居民。

利用全新的太阳能PV系统，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和热能，将新建和现有的小区住宅改造成最低能耗的住宅，使其能量盈余。夏天人们可以将这些多出来的能量储存起来，将其输送到社区公共电网中，冬天再从社区公共电网的储备中获取所需，其盈余还能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将太阳能建筑打造成为新能源经济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节能的先锋，也可以让居民意识到利用新能源对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繁荣的重要性，自觉主动地参与生态岛的城市建设。 ■

防控艾滋病：现状与路径

◎ 武俊青

今年12月1日是第26个世界艾滋病日，我国的宣传主题为“共抗艾滋、共担责任、共享未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艾滋病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关系人民生命健康、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把艾滋病防治工作抓紧抓好。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依法防治、科学防治，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加强人文关怀，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消除社会歧视，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治疗和帮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过去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全面落实各项措施，加大保障力度，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新进展。中央财政加大了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经费支持，2013年投入经费比2012年增长10.5%。监测检测、综合干预、抗病毒治疗、预防母婴传播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将艾滋病机会性感染纳入新农合大病保障范围，25个省份出台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实施方案，艾滋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进一步减轻。

随着人们性观念的改变，流动人口迁移，经性接触感染性病/艾滋病的比例逐渐增高，艾滋病感染者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不少HIV感染者明知已感染也不愿参加自愿咨询检测服务（VCT）。艾滋病问题不仅仅关系到感染者个人及其家庭，还会影响到整个社区和社会的公共卫生和安全。调查显示，

2/3的感染者曾有过长时间的抑郁情绪和自杀念头。父母发病后，其未成年子女中有近70%易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失去自我价值。艾滋病对感染者家庭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调查表明，感染者家庭的人均收入只是未受影响家庭收入的44%至47%，由于家庭支付治疗费用增加，往往会导致贫困。同时，艾滋病还

影响到整个社区和社会的公共卫生、城市的公共安全，影响到人口安全和民族的素质，影响到社会管理、稳定和安全。加强对HIV感染者及家属的宣传、教育、咨询和医护方面的工作，减少人群对其羞辱和歧视，提高艾滋病治疗和咨询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加强一般人群的自愿咨询检测和自愿咨询门诊，有利于

降低艾滋病的发病率。

上海市艾滋病的流行形势

截至11月20日，今年上海市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637例，其中668例为艾滋病病人；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死亡157例。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市今年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较去年增加10.7%。这是自2008年较上一年增加18.2%之后，全市每年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增幅连续5年逐年下降。

上海市艾滋病疫情有三个特点：

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仍以男性青壮年人群为主。今年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女性别比例为11.2:1，25至44岁年龄组的青壮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比例达到61.7%。

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仍以性传播为主。据调查统计显示，今年经性途径传播感染的比例为95.7%，其中男男同性传播的比例达到60%以上。

上海户籍人口艾滋病病人和死亡病例开始呈现减少趋势。今年报告的艾滋病病人中本市户籍病人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2.1%，报告的本市户籍死亡病例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8.4%。

据悉，自1987年上海市报告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截至今年11月20日，上海市已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0961例，其中3318例为艾滋病病人。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死亡729例。

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有很多人的性观念开放，具有风险的性行为，



但不主动去做 RTI/STD/HIV 的检测，可能加剧了 RTI/STD/HIV 从特殊风险人群走向一般人群。

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仍然严重

歧视 HIV 感染者和病人的现象仍较严重。我们前期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表明，约 40% 的人不愿意与 HIV 感染者接触。

“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歧视研究报告”称，41.7% 的受访者称曾至少受过一种与艾滋病相关的歧视。12.1% 的受访者自感染以来至少一次被医疗机构拒绝就医。尽管大多数受访者都接受过医疗、健康等服务，但仍有医务工作者歧视 HIV 感染者。由医务工作人员带来的歧视和侮辱使人在检测和接受治疗等方面的积极性都产生消极影响，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进步的障碍。作为歧视和侮辱的集中体现，不少 HIV 感染者遭遇失业、被迫离校、搬家，

甚至使家庭成员遭受各种类型的歧视。遭受歧视的不仅是感染者自身，还包括家人及其医务人员，甚至出现部分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报复社会的现象。

中国防治艾滋病面临的一大障碍就是“歧视”和“误解”。一份涵盖北京、上海、昆明、武汉、深圳、郑州六个城市，包括白领、蓝领、流动人口、年轻人四个目标群体的 6000 多人调查显示，虽然被访者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比较了解，但仍有 48.7% 的被访者认为，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有 18.3% 的被访者认为，喷嚏或咳嗽能传播艾滋病；有 47.8% 的被访者不愿意与艾滋病感染者 / 患者一起用餐，不愿意与艾滋病感染者 / 患者一起居住、一起接受理发服务、一起工作的人则分别占 64.9%、63.4%、41.3%。30% 的被访者认为不应该允许感染艾滋病的学生和健康学生一起在学校里学习。

误解导致歧视，歧视又会妨碍大众了解可以避免感染的信息，妨

得感染者获得治疗和关怀，从而产生感染传播的恶性循环。

艾滋病感染者的咨询和治疗状况堪忧

调查表明，艾滋病感染者接受咨询服务状况不佳，超过 1/3 的受访者没有接受过任何咨询服务，1/10 的受访者只接受过检测前咨询，1/3 的受访者只接受过检测后咨询服务。只有 1/5 的受访者接受过检测前和检测后的咨询服务。感染者及其家人需要获得自愿、免费的咨询服务，确保他们了解感染带来的后果，特别是在治疗、对配偶/伴侣的危险等方面。为预防母婴传播，所进行的预防母婴传播抗病毒治疗尚有问题，治疗覆盖率偏低。同时，艾滋病的治疗费用和营养费用极高，由此给社会和艾滋病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监测资料显示，有 40% 的注射吸毒人群共用注射器；有 60% 的性工作者不能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有 70% 的男性性行为者最近六个月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只有 30% 坚持使用安全套。而在其他的风险人群中，能够坚持、正确和全程使用安全套（男用、女用）的比例非常低，低于 20%。甚至一些医务人员都不知晓女用安全套。对 150 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培训时，旨在考核其“男用安全套的使用技巧”，有 90% 的人员尚不能完全掌握安全套的使用技巧。

加强社区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转诊服务

上海市艾滋病的现状，其危险

因素的广泛存在，严重影响个人健康、家庭和谐乃至社会管理、安全和稳定。



艾滋病问题不仅涉及医务科技工作者，而且涉及到多部门、全人群、全社会的稳定。若不加以重视，不强化宣传、教育、咨询、指导工作，不从单纯的治疗转向预防，不从感染者/病人转向全人群，不从高危人群转向一般人群，终将成为影响上海预防和控制重大疾病和公共卫生的重要障碍。

因此，建议不仅要重视和加强硬科学的建设，也要加强和“人口安全”相关的软科学建设；积极应对上海市人民面临的性病艾滋病的问题，加强相关的软科学研究，为解决艾滋病问题提出科学依据。

特别要加强社区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转诊服务。专家估计，感染者数量远远大于该数字——不少人具有不安全的性行为，而不去进行检测，因此而造成感染者数字

的低估。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是指人们通过咨询，在充分知情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自愿选择是否接受 HIV 抗体检测、改变危险行为及获得相关服务的过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VCT 是对 HIV 感染者进行干预、治疗和关怀的切入点，是促进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改变危险行为、预防传播的重要手段，得到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积极提倡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已取得了良好效果。

目前沪上各区（县）妇幼保健院（所）、综合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市、区、县疾控中心等机构，均可提供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然而，VCT 服务却面临着困境，主要表现为：主动前来检测的人较少，尤其是高危人群；检测结果的告知比例较低；综合医院咨询点利用率不高。究其原因，排除求询者自身原因外，服务提供方的原因是：认识、宣传不到位；咨询服务质量较低；工作方式单一、被动；VCT 点设置要求过高，可及性考虑不周；过分强调自愿；结果告知时间间隔较长等。

我国拥有健全的计划生育服务网络，自愿咨询检测服务是艾滋病和性病防治工作的重要平台。如今，卫计归口管理，相关工作要进一步加强，真正实现咨询—转诊—检测—治疗—咨询的一体化服务。

加强重点目标人群和场所干预

流动人口的主体是育龄青壮年，是性活跃人群，自然是控制艾滋病性途径传播的重点目标人群。

这些处于性行为活跃期的人群，

由于自身的特点，常年远离家庭，容易发生高危性行为，势必成为传播性病/艾滋病的易感染人群。人口流动本身与艾滋病并无因果关系，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病毒传播因素相结合，可能导致艾滋病病毒的加速传播。特别是这些人法制观念相对较差，缺乏必要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又无法承受治疗的昂贵费用，一旦染病，得不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将导致传播疾病的进一步蔓延。这个群体具有流动性强、收入少、年龄小、文化程度低的特点，且部分流动人口还存在多性伴的现象。这些特点都将促进性病与艾滋病在该人群中的传播。加强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工作，要着重加强部门组织间协调合作、摸清人口流动规律、加强综合宣传教育、扩大高危人群干预范围、完善感染者与病人管理等方面工作。

上海艾滋病传播途径以性传播为主。2011年报告发现，82.5%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通过性传播途径感染。本地户籍感染者中通过性传播途径感染的比例较外省市户籍更高，男性同性传播占性传播途径感染的比例为51.9%。各种娱乐场所充斥着性交易行为，由于艾滋病具有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密切相关性，潜伏期长、爆发危害的滞后性，传播方式的特殊性，所涉及的个人生活和心理因素的私密性等特殊问题，使得惩罚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局限性。娱乐场所服务人员艾滋病相关知识不足，安全套使用率不高，主动体检率不高。必须加强娱乐场所的管理，提倡服务人员定时体检，利用惩罚手段来遏制艾滋病相关危险行为。当然，单靠惩罚性政策不能达到控制

艾滋病流行的目的，应致力于如下工作：免费提供预防艾滋病的各种信息；免费为服务人员提供体检；降低性病和艾滋病相关医疗费用的费用；降低使用安全套的费用；降低戒毒或使用消毒针具的费用；营造社会对艾滋病相关安全行为的支持环境；改善男女比例失调；增加妇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减少贫困等。

科普宣传教育活动不可或缺

进一步加强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宣传，端正人们对待艾滋病者的态度。在我国，人们普遍对艾滋病者存在歧视和偏见，而任何歧视、偏见都不利于艾滋病人的治疗。如果艾滋病病人由于怕受到别人的歧视而保持沉默不去治疗，只会使病情更严重，使受感染面扩大。这是我国艾滋病发病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强对艾滋病的宣传力度，普及艾滋病知识，明了传播途径及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措施，充分保证艾滋病病人的权利，倡导全社会关心和爱护这些病人，是我们必须长

期坚持的政策。

针对社区普通居民，应以开展科普宣传教育活动为主。科普宣教内容主要包括：艾滋病的基本知识，包括艾滋病的流行趋势、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艾滋病的政策法规，包括艾滋病病人享有何种免费服务，如何获取这些免费服务等；艾滋病的日常护理，包括在与艾滋病病人共同生活时，如何护理以避免感染等。

编写家庭艾滋病预防教育读本作为一种公益服务事业，有利于普及艾滋病知识，不仅可以弥补市场模式的不足，也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有关单位聘请专业人士和专家组成稳定的师资队伍，编写适合的家庭预防艾滋病教育读本及相关资料，为每个家庭提供艾滋病预防的具体指导和帮助。教材要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以街道办事处为中心，定期发放家庭艾滋病预防教育读本，并定期开展艾滋病预防知识的讲座。■

（作者系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链接

“四免”分别是：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困难人员中的艾滋病病人，可到当地卫生部门指定的医院服用免费的抗病毒药物，接受抗病毒治疗；所有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和病毒检测的人员，都可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得到免费咨询和艾滋病病毒抗体初筛检测；对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由当地承担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任务的医院提供健康咨询、产前指导和分娩服务，及时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开展艾滋病遗孤的心理康复，为其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一关怀”指的是国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供救治关怀。



以爱抗“艾”

◎ 杨 瑛

“我的妻子已经病得不能起床，所以检测的结果是我到医院去拿的。当我终于打听到什么地方取化验单的时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医生全副武装地从化验室出来，用镊子夹着我妻子的化验单，伸长胳膊递给我，说阳性。我左右看看，幸好只有稍远处有几位零星患者，但是我的心里感到刺痛，我是男人，不能掉眼泪，但是我也还是人呀。我的妻子还躺在床上，孩子还那么小，我还年轻，而且自己有没有感染也是个未知数，这个医生的行为无疑在我的心上又撒了把盐。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黯然地离开了医院，但我发誓我再也不来这家医院了，不过我也在苦笑，说不定这里的医生高兴坏了，因为又一个艾滋病人‘远离’了他们。”这是2001年年底在调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家属时的笔录，从感染者的角度看，他们认为来自“医务人员的歧视是最可怕的”。

时代在进步，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也在改变。公众对于艾滋病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恐惧，往往源于对自身健康的担心以及对艾滋病的无知，如今恐惧变成了一种复杂的

情结——对艾滋病有些了解，同时又认为艾滋病离“我”很远。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

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表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通过性传播途径感染的比例继续上升，男性同性传播尤为突出。当性传播途径成为主要的感染方式后，艾滋病离每个人并不遥远。

性途径感染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常常是最隐匿的，因为传统道德对“性”的评判已经深深烙印在了对因性途径感染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上，性作为一个成年人基本的需求是不能漠视的，而且发生性行为的人群基数大、行为发生比较隐匿，因此努力减少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是目前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的重点和难点。

相信任何一件事情在一个个体上的发生都是个人价值观和社会因素合力的综合结果。“卖血”现象，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出台法律来规范和约束；至于吸毒，我们也可以通通过替代疗法，心理辅导，减少共用针头感染的可能性。唯有“性”这

一问题，是太过复杂与多变，不是一个政策、一种理念就能够解决的。

在如何解决因性所导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问题上，从来就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其一认为控制艾滋病的根本是让人们重新树立性道德观念，巩固以婚姻和生育为目的的性在社会中的道德地位；另一种更为实际的做法承认选择的多样化已是无可更易的事实。因此，为性活动提供更安全的屏障就成为干预的主题，这就是在性活跃人群中推广安全套使用和提倡安全性行为，并加强艾滋病基本知识的教育。

防“艾”之战

随着城市化、农村劳动力过剩、经济发展不平衡、户籍政策松动等因素的影响，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加，由此带来的与艾滋病流行相关的问题就是：艾滋病知识的匮乏。低年龄、低学历，较少有机会接受艾滋病知识的教育。流动人口由于性别、年龄构成导致的性需求问题，“禁欲”主张并不适用于这些流动的劳动力，如何解决性需求的问题是必须被考虑的。

闵行区为上海市的一个主要人口导入区，流动人口占区总人口数的60%，大大增加了艾滋病防治难度。2012年该区新报告艾滋病感染人数中，81%为外来流动人口。外来流动人口具有流动性大、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低、甚至由于多种因素增加男男性行为发生的比例，这些都提高了该人群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在与全市艾滋病流行趋势呈现一致的情况下，我们也认识到艾滋病高危人群与普通人群划分非必然。以往人们通常将艾滋病与吸毒者、性乱者划上等号，卖淫、嫖娼、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等均毫无疑问地被冠之以艾滋病高危人群的称号，但是从闵行区艾滋病感染者发现情况的职业分析，上述人群并非艾滋病病例报告的主体，反而是干部职员、离退休人员、家务、待业等职业属性的感染者比例居前几位，提醒我们在艾滋病防治面前没有截然的高危与不高危，因此开展面向公众的艾滋病健康教育、提高公众防艾意识更为必要。

闵行区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政府领导、多部门参与、全社会动员”的防治艾滋病格局得以形成和深化，全区范围内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力度明显得到了加强。在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的框架下，闵行区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网络，推进各项有效干预措施落实。2006年起闵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1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了预防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工作队（简称“高干队”），全区高危场所干预覆盖率达到100%。制定《闵行区推广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性病工作实施方案》，积极推进安全套进宾馆、进各类公共场所项目。结合本区特

色，大力开展依托流动人口集聚地和集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针对流动人口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干预工作。制作艾滋病性病健康教育处方，放置在全区415个社区健康咨询服务点，面向社区居民开展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宣传。区内345个户外公交候车亭设置艾滋病防治宣传公益广告，积极推进对大众的艾滋病防治健康宣传工作。面向公众开展艾滋病免费自愿咨询检测，并在被监管人员、手术病人、性病病人、人工流产者、孕产妇、应征入伍青年、公共场所服务人员等人群中开展艾滋病抗体的监测和检测。2003年12月1日成立了上海市第一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活动场所“爱之关怀”小屋，率先落实政府“四免一关怀”相关工作，成为闵行区开展艾滋病感染者与病人关怀的主要阵地。

如今，闵行区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变化，从最初的单一、被动防治，发展为主动宣传干预、扩大检测和监测等综合防治模式。同时艾滋病的宣教干预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高危

场所、高危人群，在工厂、建筑工地、流动人口聚集地、集贸市场、大学校园、户外媒体甚至居委会，都能看到艾滋病宣传的身影。

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获得关爱，但忧虑尚在。如重点场所、高危场所干预、公益宣传等需要多部门合作，才能发挥更大作用，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的干预需要与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小组更多配合，与艾滋病流行密切相关的淋病、梅毒等性传播疾病的规范诊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医疗需求的保障以及经济困难群体的关怀，重视因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在自愿婚检中的可选择性而导致预防作用的弱化等，任重而道远。

面对艾滋病流行仍未得到遏制的现状，我们呼吁公众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也要呼吁“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的新道德观念的建立，“安全套的正确使用可以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可以面向公众，就意味着一个更加宽容、宽松和开放的防“艾”良性环境的存在，将更有利于人们了解艾滋病的知识以及知道如何保护自



己，它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艾滋病是可以预防的。

以“爱”之名

艾滋病是一道至今未解的医学难题，然而艾滋病虽然不能治愈，却可以预防。我们不能只单纯用道德的约束来规避艾滋病感染继续扩大的风险，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需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以及所有公众共同参与。在目前艾滋病治疗方法没有彻底得到攻破的时候，理解、关爱与支持是一剂良方。艾滋病的问题不是单纯可以用社会性或者自然性就能解释的，它需要的是更多的真诚和爱心。

闵行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关怀工作一直有着良好的基础，2003年年底设立的“爱心小屋”曾经是开展艾滋病感染者与病人关怀的主要阵地，2010年又依托“爱心小屋”的平台成立了“雨后彩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自我管理小组，通过一个以189开头的电话专线，架起了感染者与疾控中心专业医务人员的“单线联系”，既保密又高效。通过一个倾诉与相互给予的“雨后彩虹”QQ群，新老成员们在群里交流着医学上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最新进展以及日常保养和服药治疗的体会，倾诉着彼此的心事并成为彼此的依靠。

如今，“雨后彩虹”已成为一个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志愿者、社区志愿者、社区医生和疾控医生共同参与的关爱集体，展示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你可以在闵行CDC“爱心小屋”、每个月的CD4检测、每一次的咨询讲座及每一次大型关怀活动中看到志愿

者的身影。

志愿者自发捐助困难病友、艾滋孤儿，更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净化。志愿者的电话沟通、见面交流、当面辅导不计其数。志愿者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用一个真诚正确的引导、一个面带微笑的暗示、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在每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心里埋下一棵幸福的种子、希望的种子。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渴望被理解被支持，但同时又敏感、多虑，疾病的痛苦、因疾病而引起的家庭的分离甚至工作岗位的丧失，种种困难都会带给他们除疾病外更大的打击，“雨后彩虹”的建立，让很多病友有了归属——“家的感觉”，

目前，闵行区“爱心e网”这个爱心平台又在“爱心小屋”设立了志愿者服务项目，并推出每周六全天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关怀及面向公众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免费服务，在倡导让更多的卫生系统志愿者加入关心、关怀、关爱的特殊志愿者服务行列时，也为社会对艾滋病这个特殊群体给予更多的尊重、更多的关爱开了先河。

2012年12月1日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这一主题传递着通过努力实现零新发、零歧视、零死亡更高目标的信心；今年第26个世界艾滋病日，我国的宣传主题为“共抗艾滋、共担责任、共享未来”，更显示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切实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决心。关注艾滋不只有“12.1”“这一天”，它其实贯穿于365个“每一天”。■

（作者系上海市闵行区政协委员，区疾控中心医师）

走自己的

◎ 曹祎遐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城镇化”的重要精神，需“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城镇化建设与生态建设是可以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既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也要做好环境保护，如何使中国城镇化走上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发展道路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慢城”，指的是放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形态，是一种将现代化技术与传统生活相结合的方式。它强调生态化、个性化、品质化、休闲化，旨在把城市建成令人满意的居住、工作和访问的场所，目标是支持当地的商业发展，发扬本地的传统特色，保护环境，并且鼓励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其实，“慢城”理念在本质上与我国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但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合适的实现路径。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面临几大问题，一是城市化进程过快的“爆米花效应”，其特点是城市拥挤且缺乏有效的秩序。一方面，城市化跳跃式发展没有兼顾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城市外表光鲜亮丽，“内部”脆弱不堪；另一方面，随着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高度聚集，

“慢城”之路



中国城市化低成本扩张模式将难以为继。二是小城镇发展的“羊群效应”，一方面，小城镇的发展以同一模型复制，盲目跟随大中城市发展，却丢失了传统文化和地域的独特性，“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另一方面，忽视自身的产业优势与资源特色，使工农商业生产效率和资源有效利用率不高，造成边际效益低下。三是无法满足包容性增长的需求。中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同时受到后危机时代的国际影响，因此更需要能够提升城市软实力、城市功能以及保障、改善民生的包容性增长模式，注重城市内涵的升华和多元化发展将成为城镇化及城市发展新的出路。

建设我国“慢城”的要义在于提前规划。城镇建设和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从现有的实际条件出发，因地制宜，规划自己的发展路径。科学的规划应该既考虑到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承载力，也要考虑到当地的社会特点，确立小城镇恰当的发展规模和功能定位，更要尽量减少对自然景观的破坏。盲目建设势必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城市发展必须“运筹帷幄”、“未雨绸缪”，才能避免城镇发展模式趋同化、缺乏独特性和吸引力的问题，才能预防由于规划不足而导致

出现社会、经济及生态效益低下的情况。

建设我国“慢城”的过程需要趋利避害。经济指标不应该是衡量一个城镇发展的唯一指标，要注重发挥城镇悠久的历史积淀、城市文化内涵以及传统风俗、特色工艺品、地方特色饮食等等，虽然这些在经济上增收效应较慢，但一旦形成其特色，往往要比原先预期的产出翻上几番。如果深入挖掘每个城镇自有的独特魅力，理清历史，解读历史，然后展现历史，发扬传统文化，无疑是给传统注入了新的元素，让它展现出全新的活力。

建设我国“慢城”的途径重在全民参与。城镇化所需的硬件与软件都需要资源的大量积累，一方面加强教育、医疗、交通、通讯、排污、园林绿化和公共文化休闲设施等方面的硬件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治安管理、政府公共服务、语言净化和城市风貌等方面的软件建设，这些需要借助大众的智慧与力量。

“慢城”的建设思路改变了以往政

府引导、社会组织搭桥、公众参与的“流水线”模式，正因为节奏“慢”了下来，所以颠覆了原有的格局，政府不仅起到引导的作用，更要对相关决策实行全过程跟踪，包括事中控制与事后反馈，以免出现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现象；民众则从参与的角色，转变为共同决策并实施监督，尤其对像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农民权益。政府、社会组织及民众达成了平衡的三角关系，才能充分显现城镇改革发展的红利。

“慢城”作为低碳、宜居城市的新模式，是城市运行机制的嬗变。它作为城市新兴体，能够有效逆转城市不可持续性，特别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实现发展替代与持续产业复合，形成创意产业结构的模块化，有利于打破原有的城市空间格局，增强城市空间弹性，消除粗放型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摆脱锁定惯性。我国应结合实际，直面困难，发挥资源优势，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 ■

为环保主体良性有效互动 提供法制保障

◎ 王 曦



当前，我国环保事业中的管制关系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法律保障，法律为政府对企业排污等影响环境行为的管制制定了比较充分的制度和措施。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表明，问题主要在于地方政府环保执法不力。地方政府环保执法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第三方主体的有力监督，在缺乏第三方主体有力监督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难以避免行政懈怠或者在规划地方经济、招商引资、兴办建设项目等方面的决策失误。而第三方主体监督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律

没有为这种监督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第三方主体的监督，不论是对政府的监督，还是对企业的监督，都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困境，因此完善我国环境法制的战略突破口应当是通过立法建立对政府影响资源环境的行政行为的监督和制约制度。

由此看来，当前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加强有关第三方主体监督政府的立法，以法律保障它们对政府有关环境的行为有序和有效监督，从而使政府一方面避免在规划经济和产业、招商引

资、兴办建设项目等问题上的决策失误，另一方面依法对企业等污染者进行有力的管理。

这种立法的核心内容是地方政府环保决策监督制度。法律应当为第三方主体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公众和公众团体对地方政府的环保决策进行监督提供制度保障。为此，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加强人大监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的修订，为地方人大常委会依据《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监督地方政府的环境决策提供程序性规定，把环境监督关系纳入地方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范围。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可以通过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对地方政府有关环境的决策进行监督。我国《宪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地方经济规划、地方产业发展规划、招商引资、审批建设项目等方面的决策，属于地



方政府的工作，因而属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的范围。大量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事件表明，地方政府的这些活动往往对地方环境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对这些政府决策的监督应当纳入地方人大的监督范围，地方人大可以通过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开展专项调查、进行专题质询等方式进行监督。由于地方人大掌握着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命权和罢免权，如果敢于运用并运用得当，地方人大对政府有关环境决策的监督是最有效的。这种监督的内容，既包括地方环境质量状况的变化情况，又包括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资源保护类法律、法规的情况。监督的过程和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以便取得实效。现在需要的是用法定的制度和程序来落实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这次《环保法》修改，为制定这些制度和程序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应当通过《环保法》的修改，为《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延伸并落实到有关环境的政府行为搭建“桥梁”。

建立环境咨询委员会制度。公众和公众团体往往由于直接或间接

受到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影响而高度关注政府有关环境的决策，应当通过《环保法》的修订，为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提供制度和程序保障。建议在修改《环保法》时，制定地方政府环境咨询委员会制度，并赋予该委员会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的资格。邀请公众或公众团体的代表人士参加该委员会，使其通过环境咨询委员会的渠道在政府环境决策过程中及时表达意见和建议。环境咨询委员会的设立，使公众和公众团体的意见表达从体制外转到体制内，有助于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规划、地方产业发展规划，招商引资、审批建设项目等方面的科学决策，避免出现由于政府决策失误而导致的官民关系紧张和巨大的社会救济成本。

建立中国式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虽名为“诉讼”，实际上是一种以诉讼为手段的对政府环境履职的监督制度，它起源于美国环境法，被很多国家的环境法律所借鉴。国外经验表明，它是一项行之有效的督促政府勤勉履行环保职能的制度。在修订《环

保法》时，可以制定一个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中国式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它的内容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果有初步证据证明地方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疏于履行本法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环境保护职责，如规划环评、行政限批、信息公开、公开听证会、工业开发区环境监管等，可以对该政府或政府部门发出书面通知，告之疏于履行职责的情况并要求其依法履行职责。第二，如果被告知的政府或政府部门在书面通知送达60日内仍未依法履行有关职责，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就该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决命令其履行有关职责。第三，不论原告胜诉与否，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为原告支付适当的律师费用、监测鉴定费用或其他诉讼费用，以此减轻环境公民诉讼原告的经济负担。这个制度的创立将为我国公民监督政府环保履职提供一条新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

台湾商家欢迎人民币

◎ 顾定海

第一次去台湾，自然想到要换一点新台币。想不到银行去一问，说台币属“冷门”币种，要提前一天预约。后听朋友说，在台湾的大商店一样可以用人民币来消费，还可以刷银联卡呢。于是，就只带人民币和银联卡赴台了。

来到台湾，果不其然，正如朋友所言，“用人民币方便得很！”一天晚上笔者打车回酒店，看见出租车上竟可以刷银行卡，便觉得新奇，问司机：“能不能刷大陆的银行卡？”“怎么会不可以呢？我们台北的出租车，现在大陆客人的生意要占很大一部分呢！不能刷大陆银行卡，我还装个刷卡机干嘛？”听台湾出租车司机这么一说，明显感到自己孤陋寡闻了。

台湾当局自今年2月6日启动外汇指定银行办理人民币业务以来，目前有46家银行申请了这项业务，且“生意”一路火爆。据统计，全台湾启动人民币业务的第一天，存款就达到13亿元之巨，且在3月1日飙升到了100亿元。台湾的各家商业银行更是纷纷使出新招抢夺人民币业务。人民币启动后的仅仅一周内，台湾元大银行率先宣布人民币3个月定期存款年利率为3.5%，门槛是只要存入1万元

人民币，震撼了市场。永丰银行不甘落后，接着打出定存3个月，第3个月给超高利息6.66%，在台湾的金融市场上再次大爆冷门。到10月中旬，台湾人民币存款已突破千亿元大关。各行各业对人民币的需求相当强劲。

笔者在台北市中心的信义路上看到，几乎每家银行的门口，都有招揽人民币存款的广告。台湾第一商业银行更是一语双关地扯出了“人民币，找第一”的巨型条幅。

像上海街头一样，“全家便利店”也遍布台湾的各大城市，对于“能不能使用人民币”的回答大多是“欢迎使用”，不少找零用的也

是人民币。

按照台湾金融管理部门的规定，商家如果直接收入人民币，或未经许可办理人民币与新台币的兑换或买卖，所收受的人民币及台币，都将被主管机关没收。但是，为什么仍还有这么多的商家在“欢迎使用人民币”呢？一次坐出租车与台湾司机聊天时，司机说，商家当然是有钱就收啊，哪有把钱往外推的道理。“更何况，现在人民币是强势货币”，大陆经济持续向好，人民币长期稳定升值，而且两岸交往密切，台湾商家收入人民币，不仅存款利率高，还可以拿到大陆使用，省去汇兑的麻烦。“做生意的台湾人，哪有不收人民币的道理呢？”

说到人民币，有一次经历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一天下午走累了，看见拐角处有家咖啡馆，就进去歇一会，正打开地图查看着附近的道路，“先生，我们这里是可以使用人民币的。”女服务员一口软软的国语说得又标准又细软。“哦，知道了。谢谢！”

袋里装着人民币，感觉真好。■



周瑜：



我在白鹤

◎ 顾晓红

2013年11月24日，风雨中的午后。青浦区白鹤镇赵屯兴利路西侧永胜草莓研究所的大棚里，上海永胜草莓研究所所长、上海永胜瓜果专业合作社总经理，“85后”年轻的农业界上海市政协委员周瑜笑得灿烂——对于家乡的土地，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

“要小心蜂箱，佢姆妈每年都会不小心被蜜蜂蛰到，立时肿起来，很痛的。”吴依细语，周瑜提醒着。小小白色蜂箱里的蜜蜂，是用来为草莓花授粉的，可以提高产量，改善果实品质，还天然无害。“佢姆妈爸爸，当年是从不到四分田开始种草莓的，我是吃着他们种的草莓长大的。”从小生长在草莓之乡白鹤镇赵屯的周瑜大学毕业后成了都市“白领”，可在陆家嘴金茂大厦上着朝九晚五的班，心里却总是惦着家乡，惦着草莓大棚。

五年前，她打定了主意：回白

鹤一心一意种草莓。

辛苦，但是真心喜欢种草莓

“姆妈爸爸是1987年开始种草莓的，技术好着呢！我在草莓地长大，跟草莓有缘，所以是真的喜欢种草莓。我其实常常庆幸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永胜，是爸爸妈妈起的名字，他们是我入这一行最好的老师。从改良、消毒土壤，到引进优良品种、精心育苗……种植的全过程，我当然逐一讨教。”大棚里，周瑜笑呵呵地说。她轻轻整理着草莓的草茎和藤叶，有一些已经挂果，没有成熟的草莓是白色的，带着些许微红。

“这里种的都是我们的获奖品种‘红颜’。”那是2009年3月，在北京昌平举行的第六届中国草莓大会擂台赛上，永胜瓜果专业合作社种植的“红颜”品种有机草莓以

外观圆整饱满、色泽鲜亮，香味浓厚，酸甜适中、多汁爽口被评为色、香、味俱佳的一等奖，捧回了一枚“金牌”。“我跟姆妈一道去的北京，拿到奖牌的时候，我们抱在一起哭了。”如今，“红颜”品种草莓的推广面积已有4000多亩，成为白鹤这个草莓之乡的名品之一。

草莓的成熟期是每年11月至第二年5月。往年这个时候，草莓应该已经开始陆续成熟了，可是今年，草莓推迟上市已成定局。回到办公室，周瑜细细道来：“今年夏季由于受高温干旱影响，草莓种苗很是紧俏，去年0.2元至0.3元一株的苗，今年1元一株都买不到。农户在种苗上的成本大大提高了，想不到后来又遭遇了‘菲特’台风。”

10月7日至8日，受今年第23号强台风“菲特”及其残余云系影响，上海遭遇52年来同期单日最强降雨。整个白鹤，8100亩草莓地进水受淹，一些地势较低的地方雨水甚至没过了草莓植株的顶部，9月初陆续种上的新苗六成以上尽毁。

“永胜”的200亩草莓地，未能幸免“菲特”之扰。“现在大棚里的苗，都是后来补种的。”

辛苦——这是自然的，除了早已习惯的日常种养、采摘、经营，周瑜不会忘记2008年年初的那场雪。当时，连日的大雪都积在了草莓棚上，担心积雪的重量压坏草莓棚而毁了草莓，她和父母一起连夜用手扒去棚上的积雪。“有一段时间觉得太累了。”周瑜有一次对妈妈说自己累得快不行了、不想做了。

“妈妈说，你终于说这句话了。但是认真思考了一个晚上后，我从此再也没有跟父母说过放弃的话。种草莓会是我一生的事业，不会轻易

放弃。”

这些，也是当年父母反对周瑜返乡种草莓的原因：“我们辛苦了一辈子，还不是为了你吗？当农民太辛苦了，不成不成。”一开始，她拗不过父母，可当着白领，心里却一直空落落的，只要有闲暇时间，她就跟在父母后面往草莓地里跑。见女儿如此坚决，父母终于不再反对。

永胜瓜果专业合作社是“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青浦区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2007年通过了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产品认证，2009年通过了OFDC有机认证，合作社和草莓研究所在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应用、标准化生产、优化栽培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父母主抓技术，周瑜抓经营。“父母基本不干涉我的经营思路，但也有例外。”那是她刚刚提出在草莓地里搞农家乐的时候，“当时草莓种植户很少有采取这种销售模式的，他们担心那么多人下地摘草莓，小苗都被踩坏了，损耗太大。”

白鹤是上海市草莓种植的重要基地和全国草莓之乡，草莓种植面积约占全市的三分之一，上海市民吃的草莓中约有一半来自白鹤。一直以来，白鹤的草莓完全依循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路子发展着。

周瑜坚信农家乐的方式一定可以成为草莓的重要销售渠道，她说服了父母，着手实施计划。她在草莓地旁边搭起了饭堂，养起了鸡，为了推广草莓，她做了一个网站，建立QQ群……事实证明，周瑜的决定是有效的——草莓成熟期，每到双休日，不少家庭驾车驶向白鹤的草莓地，体验采摘的快乐。“最高峰时，有过一天接待200多人的

记录，长长的车队一直排到了几百米开外。”如今，永胜种植的草莓有三分之一是通过农家乐销售的。

长长的摘草莓队伍打破了小镇的宁静，“人家有桃花节、菜花节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一个草莓节？”在包括永胜在内的草莓种植户倡议下，“白鹤之春，草莓之约”，从2010年起，青浦每年都会举办白鹤草莓节，草莓精品展示展销、草莓大王评比及拍卖、草莓产业发展论坛……风生水起。

白鹤，上海的西北门户应该发展得更好

白鹤镇古称青龙镇，因苏州河吴淞江（青龙港）得名，古时青龙港为海港，苏州河自此入海。沧海桑田后，才有如今由泥沙冲击而成的上海市区。白鹤人因此自豪——这里曾是上海的“外滩”呢！白鹤是历史上有名的传统集镇，是旧青浦县府所在地，青龙寺、青龙塔具有1200多年的历史，青龙港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港口之一。2011年起，在白鹤青龙地区陆续挖掘出土了近2000件唐宋元文物，多件珍品在上海首次发现，港口贸易史上溯到唐代。如今的白鹤镇，由原来的赵屯、白鹤两镇合并而成，是上海的米袋子、菜篮子和果园子。

永胜瓜果专业合作社就是引苏州河水入水渠，净化后滋养着大棚草莓。

“我在白鹤长大，住在白鹤的村子里，总归希望这个上海的西北门户发展得更好。”得知自己被推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时，周瑜“一下子感到责任太重了”。今年年初，在上海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

她提交了“关于上海西北门户（青浦白鹤）经济发展的建议”的提案。

“白鹤镇是上海西北的重要门户镇。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白鹤镇一度成为郊区工业强镇。之后，由于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等问题，白鹤镇经济实力已远落后于昆山花桥、嘉定安亭等相邻乡镇。”提案里，周瑜特别附了白鹤与花桥的对比照片。仅一河之隔，从白鹤这边远远望去，吴淞江另一边的花桥高楼成群，大面积的绿化、公寓、别墅，办公楼和大卖场、国际影城、学校……生活设施齐全。

周瑜在认真调研后认为，与花桥和安亭相比，白鹤镇发展的落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区域综合功能培育不足——花桥定位为国际商贸城，安亭则为汽车城，相应的综合配套服务功能都在逐渐形成，而白鹤镇发展定位一直不明确，各类资源配置相对薄弱，没有形成相应的功能支撑，就难免成为发展“洼地”；工业化发展相对滞后——白鹤镇的特色与竞争优势不明显，产业能级不高、发展空间不足，优势产业占比少、规模小、关联度弱，可持续发展乏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缓慢——城镇化推进力度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配套服务水平较弱，资源集聚能力较差——经济实力基础薄弱，又缺少政策扶持和相关发展自主权，资源要素都在往外流失，渐渐出现被边缘化的迹象。“如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白鹤的落后局面就很难改变，当地农民的心理落差也会日益剧增。”她建议以中心村归并建设为切入点，将商贸、旅游及相关产业纳入白鹤发展的规划，打通白鹤胜利路至花

桥香榭里大道，改善交通条件，在白鹤发展一些相关的汽车服务业、生产性的服务业和农业旅游服务业。

青浦区人民政府在给周瑜的提案答复中坦陈，由于青浦区发展格局以 318 国道和 G50 高速公路作为轴线，而白鹤镇位于发展轴的北侧，未处于主发展轴上，发展定位相对不够明确，且受到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等因素的制约。区政府表示，白鹤镇的发展已提上议事日程，将启动规划，努力使白鹤镇走出区域发展“洼地”；改善交通，为打通与花桥联系通道提供可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推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农业旅游服务业。

对这样的答复，周瑜有些遗憾：对于白鹤的发展规划，仅仅在区级层面“恐怕难有定论”，应该有市级层面的统筹考量。“明年的市政协全会上，我应该还会提相关提案的。”

今年 10 月 30 日，在上海市政协十二届五次常委会议上，周瑜提交了体味《发展上海边界城镇，实现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书面发言。她认为沪苏浙边界地区应联手进行科学规划，突破行政区划界限，以城镇单位划分成中心辐射城镇和梯度城镇，联网辐射，缩小区域差别和城乡二元结构，其中包括对白鹤进行重点规划。“上海西北门户白鹤可通过生态环境以及历史文化底蕴的优势条件，大力发展农业旅游及服务性行业的完美结合。”

农业，期待有更多的同龄人参与

周瑜返乡种草莓的选择，曾一度成为白鹤的新鲜事。“本地的年轻人大多选择离开了白鹤。”其实，



周瑜很想和更多的同龄人一起切磋种草莓、搞农业。“不过目前，好像还是个梦想。”在永胜，与周瑜共事的是 40 来名大多为五六十岁的“庄稼人”。

“关于新生代农民培养的建议”是今年年初周瑜在上海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提交的另一件提案。

“新生代农民培养是农业劳动力再生产的组成部分，关系到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提升和正常的世代交替。”

她的提案开门见山，“新生代农民培养关系到将来‘谁来种田’的大问题，目前农业劳动力主要是以 55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主，40 来岁的也已很少看到，青年梯队更是力量薄弱，而新生代农民的培养有一个周期性，有必要未雨绸缪，及早重视新生代农民培养工作，促进农业劳动力新陈代谢。”周瑜认为，随着城乡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新生代农民来源发生变化，不应把培养对象局限在农村青年或升学无望者身上，“有志于农业的适龄人口都应该纳入其中，培养工作要从树立青少年正确的农业职业观抓起。现代农业需要的是懂经营、会管理的职业农民，有必要改进培养方式，创新机制和体制，让新生代农民学有所用，下得去、稳得住。”

周瑜注意到，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培养的财政投入重点放在农业院校办学和学生入学资助上，而学生的就学目的与办学宗旨却不一致，财政资金使用效果大打折扣。“有必要改变这种‘重学不重用’的财政投入格局，把入学与就业挂起钩来，资助的重点从单纯的学校教育扩大到包括农业大户研修、农业创业等事关新生代农民职业成长的全过程上来，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创造条件让有农业职业志向的人到专业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去参加生产劳动，积累实际经验，切实提高财政投资效益。”

周瑜还强调，应保障新生代农民的合理收入，“新生代农民必将是农业为主业的职业农民，零碎的土地经营显然不足以保障职业农民的收入，有必要推动土地流转，把土地集中到有经营能力的人的手上。”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在答复这一提案时承诺改进教育培训模式，提倡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办学理念，扶持政策要进一步聚焦和深化，特别是就业和保障新政策的设计要向农业从业人员适当倾斜，不断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稳定一批新型职业农民长期地从事农业。

“我一直在期待有更多的同龄人参与农业，这该多有助呵！”周瑜笑着说，“大家漂漂亮亮地下地、谈生意、迎接来农家乐的游客，多好的事！”

“让风带走草莓芳香，让心灵随白鹤翱翔”。永胜草莓研究所办公楼的外墙上有这两行字，“这是我写的。”

“草莓姑娘”周瑜扎根在白鹤，爱乡爱业。 ■



胡林森： 质如木 意如刚

◎ 葛文君

3亿多年前，银杏树已悄然生长在地球上，如今，科学家称其为“活化石”。

21世纪的东海瀛洲崇明岛上，6000亩银杏种植生产基地一片葱茏，基地对银杏的生长环境、施肥、采集加工、质量检验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完全以GAP标准管理生产的银杏叶加工成制剂，作为上海信谊百路达药业有限公司的主导产品

推出。这样按整套标准流程操控的银杏叶生产基地全球只有两家，一家在德国，另一家就是信谊百路达药业。

军人出身的上海信谊百路达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胡林森系崇明县第十二、十三届政协委员，上海市科技创业领军人物、市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市科技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崇明县工商联副主席……

胡林森获得的荣誉真不少。他负责的项目“三七花总皂苷在制备治疗高血压病药物中的应用”获得上海市优秀发明三等奖，“银杏叶提取物生产新工艺”获得上海市优秀产学研工程项目一等奖。

1991年，上海市政府对银杏资源开发作出批示，确定该项目为科技攻关项目。当时，作为草药生产和消费大头的中国，却始终没能做到将科技与宝贵的中华传统医药资源文化相结合，泱泱中华大地上几乎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中药制剂，而草药出口大国日本、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药材却大多进口自中国，低价购入我们中国的原材料，回头再高价卖给我们。面对这样的窘境，胡林森心有不甘——他当时所在的长征农场在国内率先完成了对银杏干叶有效成分的提取，制成银杏叶干浸膏。为进一步将干浸膏制成药品，上海市政府决定由上海

信谊药厂在技术上给予支援，后来便组建了由上海信谊药厂和上海农工商集团长征总公司共同投资的上海信谊药厂长征分厂，即后来的百路达药业有限公司。由此，我国第一家提取银杏浸膏的药企诞生了。

公司创立之初，百路达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合作，通过反复的试验和论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首先是黄酮甙含量与萜内酯等成分的含量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将产品技术含量提升至国际标准；未经加工的银杏叶本身含有大量带有毒性的银杏酸，经过一次次的尝试和失败，百路达终于突破了技术障碍，采用先进的高效液相色谱法，在银杏叶提取过程中将银杏酸控制在 1ppm 以下，远低于国际标准 5ppm，为银杏药品质量安全提供了严格的保障。功夫不负有心人，胡林森带领项目组成功开发出我国首个银杏叶胶囊产品，该产品的生产标准随后被国家卫生部引用为颁发标准。

回首那段艰辛的日子，胡林森淡定和从容，“因为那是一段必然要走的路”。为了让银杏制剂实现规模化生产，胡林森听取了海内外药学专家的建议，在崇明建立了一块国内独一无二、占地 6000 亩的银杏种植基地。这样，原来依靠农户分散种植的原材料便可以完全自给自足，而且从药材源头上保证了原材料品质稳定。如今，胡林森和他的同伴们实施了集银杏种植、科研、提取、制剂为一体的“银杏叶产品科工贸一体化”项目，这是目前国内唯一获得国家批准通过的银杏叶产品推广指南项目，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银杏叶胶囊连续 10 年被评为上海市名牌产品，被国家

发改委认定为优质优价品种，还获得了美国 FDA 证书，并出口美国；作为市科技百强企业，信谊百路达药业有限公司已成功申请专利 31 项，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12 项，拥有注册商标 15 项，其中著名商标一项，国家级重点新产品 7 个，上海市级重点新产品 9 个。

在胡林森的观念里，企业想要取得多快的发展，就得有多重视创新机制。他从来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提出构建银杏叶全产业链质量管理体系，并努力将其付诸实施；他每年在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上投入大量经费，成功研制出“宝益苏”布地奈德气雾剂、“朗天”吗氯贝胺片等数个国家重点新药；他提倡产学研结合，合作的对象包括上海现代药物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复旦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等院校机构。公司和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建立了“银杏联合开发实验室”，与第二军医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联合人才培养基地……

身为在绿地宝岛上长大的崇明人，生态环保理念注定是胡林森恪守的原则。2004 年，崇明明确总体定位为生态岛，这与他的思路完全契合。单就银杏种植基地而言，6000 亩基地年吸收二氧化碳 1460 吨，释放氧气达 1066 吨。他和上海市奶牛研究所合作，优势互补，公司银杏叶经过食用酒精提取有效成分后，剩余的叶渣富含植物性粗纤维，正适合反刍类动物食用，将其提供给养殖场作为奶牛的饲料，可以彻底避免污染环境，减少养殖场饲料费用；奶牛的粪便经过发酵和无公害化处理，可作为银

杏林的优质天然有机肥料，既解决了奶牛养殖基地粪便处理的难题，又减少了银杏林购买肥料的费用；提取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过处理后达到国家二类排放标准，用来浇灌银杏林基地可以有效节约水资源，构成了循环经济与绿色经济的良性互动。

医者有父母心，药者亦有慈悲意。对企业职工，胡林森平易近人，真诚豪爽，常去探访困难职工家庭。公司在经营所在地新海镇常年开展帮困助学活动，每年春节、重阳节、中秋节等重要节日，公司都会组织志愿者去看望新海镇的部分残疾人和老年人，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并带领商会会员企业参与新海镇爱心慈善超市活动，带头向慈善超市捐款；积极向灾区人民捐款捐物，更是义不容辞；为支持上海市全科医生的培训，公司向“唯爱天使基金”捐赠 40 万元……

作为崇明县政协委员，胡林森会认真地调查研究后提出高质量的提案，力求为崇明地方经济发展献计献策，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县政协委员；作为新海镇商会会长，胡林森常常带领商会同志到商会会员企业中走访调研，了解会员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支持商会各种会议、活动；有人请教他成功的经验时，他会总结：第一，民营企业要坚持“政府主导、政策指导”理念；第二，民营企业要诚实守信、文明经商，不愧对自己的良心；第三，民营企业要“致富思源”，力所能及地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道于心，德于行；质如木，意如刚——胡林森希望自己如银杏树，挺拔、坚韧。



音乐会， 在青浦监狱的草地上举行

◎ 施远立

位于青浦区外青松公路的青浦监狱收押着 2000 多名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成年罪犯，其中还包括不少外国籍罪犯。

今年 10 月 19 日一大早，青浦监狱的草坪上，搭建起了硕大的临时舞台。台下，是服刑人员；台上，则是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 80 多名演奏家。每一首曲子都是为他们而奏，舞台的绿色背景上，飞扬的字句沁入人心：“音乐净化心灵，艺术提升境界。”

音乐会由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著名主持人张民权主

持，在上海城市交响乐团首席指挥、著名指挥家曹鹏的指挥下，悠扬的音乐在这里回荡，为这片人们眼中冰冷的土地注入温暖的力量。乐团特意为这次演出排练了多首经典曲目，从斯美塔那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序曲，到美国作曲家安德森的《养鸡场上的舞蹈》，或如玉珠般跳跃、或如流水般潺潺的旋律，抚平了人们烦乱的心绪。听着这些乐曲，服刑人员的脸上都不自觉地浮现出陶醉的神情，能够在这里享受一刻音乐带来的平和心境，也许比一切都更有意义。

乐队还特意演奏了圣桑《动物狂欢节》中的选段《大象》，乐手们戴着卡通大象帽子上场演奏，可爱的装束配上低沉的音符，将大象的憨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曹鹏老师在一旁细心地讲解乐器的使用，通过这首全低音的乐曲，向听众介绍交响乐队中不同音区的构成。曹鹏老师说，他希望通过这些讲解，提高服刑人员对音乐的认知，潜移默化中让他们爱上音乐，这既是音乐表演，更是音乐课堂。

而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命运”》，则无疑更具有隐含的教育

意义。曹鹏老师在讲解中说道：《命运交响曲》诠释了贝多芬一生都在与命运搏斗的思想主题，这是一首英雄意志战胜宿命论、光明战胜黑暗的辉煌旋律。而从惶恐不安到激昂有力，汹汹气势中又裹挟着难以磨灭的真情与温柔，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克服困难的意志，正是这首耳熟能详的乐曲传递给人们勇气和力量。

曹鹏先生在乐曲演奏结束后如是评说：古人曾言“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也许在灿烂、美好的时刻，人会因为贪念或冲动而犯下大错，但只要有正直的信念和直面生活的勇气，美好和灿烂仍将回到身边。大墙内外在“情”上没有隔阂，在“爱”上没有隔阂。我永远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服刑人员能够在监狱民警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帮助下，发现自己的善，抛弃曾经的恶，重新做回好人，成为对家庭、对社会的有用之材。

曹鹏老师的女儿、城交乐团的创办人曹小夏也说，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成员大多是白领、老师和大学生，当时一听要到青浦监狱进行演出，纷纷报名，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排练和演出。没有对音乐的热情和一颗热心公益的心，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他们希望，在音乐的感化下，爱的力量和教诲的话语能更加深入人心，他们希望，那里有他们的声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服刑人员这次也加入到演出中。2011年9月，青浦监狱组建了一个由45名中外籍服刑人员组成的艺术团，取名为“新声”。监狱民警带领一群几乎没有任何音乐基础的服刑人

员，共同创作了音乐剧《心狱》，共有35首歌曲或音乐融入其中，讲述了一位新入职民警成功帮助一群罪犯走出心之牢笼的故事。服刑人员也借这部音乐剧，抒发了他们在监狱中的心境、感慨和思考。今年1月10日，这部音乐剧在监狱成功首演，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在此次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上，新声艺术团的成员们第一次在交响乐队的伴奏下走上舞台，合唱了其中的序曲和《自由的感慨》，监狱的两名狱警小提琴手也加入其中。狱警、演奏家和服刑人员，在音乐的包围下，获得的是一份可贵的平等和尊重。

曹小夏感慨，音乐能抒发人们内心的情感，没有界限，也没有歧视，能够激发服刑人员心中的爱，才是最好的鼓励和教育。她感动于青浦监狱能提供这样的机会，让服刑人员走上舞台，因为在他们心中肯定渴望，那里有他们的声音。

那天在场的还有不少青浦监狱的帮教志愿者，他们平时也会来到这里，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疏导和服刑帮助。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蓉伟老师就是其中一员，他一直参加杨浦区民革文教二支部的活动，从提篮桥监狱到青浦监狱，他进行帮教志愿工作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了。“我在青浦监狱的帮教对象是一名重刑犯，因经济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我会有一些节假日来监狱探望他，平时也会与他保持通信联系。由于在监狱内表现良好，他已经获得了减刑，这也意味着他重新有了获得自由、回归社会的机会。”

近年来，青浦监狱坚持开展对服刑人员进行“艺术矫治”的探索，

希望通过各类艺术的普及教育来感化心灵、提升认知、实现善性回归和品格重塑。监狱定期举办合唱比赛等群众性文艺活动，提供书籍、播放音乐广播电视节目，并开设了一系列课程，除了音乐欣赏，还包括对一些上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项目，如松江顾绣、嘉定竹刻、海派玉雕等等。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服刑人员的修养、文化和艺术素质，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出狱后的就业，提供了多一份机会。监狱还设有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并开设家庭治疗、情绪控制、人际交往等项目，帮助服刑人员调整社会认知、提升社交技能、规范个人行为，降低重新犯罪的风险。

青浦监狱副监狱长叶刚说，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向服刑人员敞开艺术的大门，能更深刻地改变他们的认知和行为。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举办的这场音乐会深受青浦监狱服刑人员的欢迎，让他们体会到了社会的关爱，也亲身享受了难得的音乐盛宴，尤其是曹鹏老师和张民权老师对经典音乐的讲解，让他们能更容易地聆听音乐，走进音乐，并真实地感受音乐艺术对心灵的冲击和净化。他真心地希望，监狱今后能够获得更多优质社会资源的支持和参与。这些年来，青浦监狱积极与一些社会团体合作结成共建单位，比如癌症俱乐部和律师团体等。看着身患绝症的病人，用他们的故事传递生活的希望，给服刑人员莫大的鼓励；看着律师们提供着更加专业的教育和咨询，帮助服刑人员解决一些法律上的困惑和难题，监狱方面也更加有信心，将这样的矫治模式进行下去。 ■

《飘下的树叶》



《天降幸福》



藏在岁月里的温暖

——唐云辉水彩艺术亮相上海翎艺馆

◎ 杨 格

上海翎艺馆邻近民主党派大厦，开张的喜气透过花篮的繁华曲锦流露出来，这是2013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天气晴朗。

进门，唐云辉的第一幅《天降幸福》，一下烘托出展览的主题：一条穿着淡红衣服的狗如休闲达人般直立着，戴着项链、听着耳机里的音乐，头向左面扭转，看着一匹围着蓝色脖套的马。两只动物静静无声，一红一蓝的装扮恰如梦想的色彩。幸福降临之时，它们没有狂跃，没有欢腾，没有彼此拥抱的冲动。一切想象中的情形都没有，就是相互隔着一点距离对望，双方的眼神温情、无邪。

这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暖，当期待的过程中那些焦灼、无奈、苦闷全部化解之后，纯净、天籁般的温暖出现了。

动物的世界如此，人的世界何尝不是如此呢？

但是，幸福降临之前，会经历什么？《童年的声音》、《追逐》、《梦想家》、《幸福是什么》、《期盼》、《遇见你》、《远方》，一条从小到大奔波的路程。唐云辉用拟人化的狗来诠释，而且诠释得独特、令人回味。每个人都可以从那些出神入化的神态中找到自己的某种情绪和隐秘心境。

《远方》，可能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农村人向往城市，中小城市的人向往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向往国外。唐云辉《远方》中的狗穿着时尚的牛仔衣，淡黄的围巾，表情落寞而惆怅，像打工的农民工，离乡背井到陌生的地方寻觅生路，远方等待的是什么？身后的栅栏是自己熟悉的家园，真的舍得离去？

乡愁与憧憬交融着，表达通向幸福的纠结。

就是这种纠结，唐云辉整个画面也处理得很“甜”，没有压抑，带着幻想，渗透童真。

这样那样的纠结组成如烟往事而成为《昨天的记忆》时，温暖像沁人心扉的气息弥漫四周——毕竟无悔地抵达自己的终点。

我坐在白色的沙发上看着不断涌入的观者，在精致的翎艺馆里穿梭、浏览，驻足凝望唐云辉的作品。唐云辉为何选择动物来宣泄自己的情感体验，尤其是狗？

杰·画廊总经理宋云强为我解密。

唐云辉与宋云强是同学，一个选择了画画，一个选择了开画廊。唐云辉自1985年起，在《连环画报》、《故事画报》等专业刊物上发表作品，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创作绘本读物、连环画、插图。从单位辞职出来后，唐云辉成立了工作室，专攻水彩画。宋云强以经营者的眼光看好他，销售他的画，第一幅卖了一万元。十年下来，唐云辉的画畅销不衰。但作为同学、作为经营者，宋云强建议唐云辉提升画的内涵，使画的特征更加凸显个性。这是1997年。唐云辉接受了建议，将水彩与油画结合起来，以动物尤其是狗作载体，传递人生的种种感受。2006年，杰·画廊在上海商城举办唐云辉“动物世界”首次个展，一位约好的收藏家临时有要事无法前来，让太太过来打一个招呼。既然来了，收藏家太太就在画展里转悠，本不懂画的她竟然被独特的作品打动，要唐云辉谈谈创作的缘起、感受。讲到《梦之七——恋爱》，作品上画了一条趴在木桩子上的小狗，她突然一声叹息：“我感觉，那条狗好像是我的写照，总是在等待我丈夫回家；画面上两只一起飞舞的蝴蝶，仿佛是我们夫妇的生活状态。”唐云辉接着又讲到《回家》，画面上一只猴子带受伤的仙鹤回家。她又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经历。唐云辉讲解了7幅，每一幅都触动她的内心，于是她收藏了这7幅画，唐云辉的尝试得到认可。更令人欣喜的是，画展上名为《动物世界》的画册，由好友介绍给了美国迪斯尼的代表。迪斯尼方面看到画册后，眼前一亮，认为唐云辉与他们在世界各地见过的所有画家的画风都不同，“他把卡通漫画都当作艺术作品来创作，这正是迪斯尼所要的。”作为米老鼠、唐老鸭的诞生地，美国迪斯尼为了进一步扩大其绘本的

原创力和影响力，正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合适的画家，唐云辉幸运地成为迪斯尼在中国签约的首位绘本画家。

两年以后，一位女性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唐云辉，她是陈逸飞的遗孀宋美英。由她创办的陈逸飞视觉艺术中心2008年8月举办了《唐云辉·画2008》个展。

唐云辉的努力无疑获得了成功。

翎艺馆的那架白色钢琴在开张仪式上响起了琴声。我知道翎艺馆还有与音乐相关的元素，我在画展结束那天又去了，在一处墙面上发现三幅著名画家葛俊辉的油画，它们的历史感与唐云辉的童心世界截然不同。其中一幅，整个画面就是马思聪《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总谱》，泛黄、陈旧；另一幅是一把意大利小提琴和一页曲谱，曲谱上压着一根指挥棒，同样呈现沧桑之感。这一次，为我解释的是翎艺馆销售总监顾清。这个馆是她展现艺术的平台，她曾留学日本，学西洋画。和宋云强一样，她选择经营而不是自己绘画；和宋云强一样，她选择唐云辉作品作为翎艺馆的开张之展。和宋云强不一样的是，她把音乐引入了画廊——每周两次，50多个小朋友在画廊里学习小提琴，在画展的氛围中表演，任艺术天赋尽情挥洒。教授孩子们的是上海歌剧团乐队首席陶乐，一个肢体语言丰富的年轻艺术家。

画展会不断更换，而琴声却始终萦绕。这份情缘缘起陶乐，顾清作为他的阿姨，以前辈的力量成全陶乐的梦想——因为陶乐已经失去母亲，在天堂的母亲听到儿子的琴声，就如同儿子在呼唤妈妈。我听过陶乐演奏，那种投入令人动容。“他

每一次拉《辛德勒名单》，我都掉泪。”顾清真切地说，“所以，我砸锅卖铁也会帮助陶乐举办个人音乐会！”

如同唐云辉有宋云强帮助一样，陶乐同样需要帮助。

和顾清交谈的时候，我还是坐在那张白色沙发上，沙发墙上是唐云辉的三幅作品，一幅是狗的《温暖家园》，粉红基调，画面柔和；一幅是《飘下的树叶》，仰望树叶的鸟嘴张开来如一个夹子，夹子上被藤蔓缠绕，令人遐想连翩；一幅马的《回眸》。这段文字可以是唐云辉所有创作的精神依据：“世界上最柔软和敏感的是什么？是心灵。最能温暖心灵、并且给心灵以光明的是什么？是记忆……留在记忆中的美好总是在那里，总有一天会唤醒被世俗和时间磨得粗粝的心。因为，昨天的记忆可以温暖你的明天。”

我问顾清：“你最喜欢唐云辉哪幅画？”她脱口而出《对视》。两条狗嘴对着嘴，眼睛清澈、明净。这幅画正好在我坐的沙发对面。

是的，对视是彼此信任的检验。在唐云辉的世界里，有与宋云强的对视，所以，支撑起他今天的成就；有与顾清的对视，展现出对岁月温暖的回忆。而在陶乐的世界里，有与阿姨的对视，让更多的孩子喜欢音乐。那么，顾清与谁对视，盘下这个黄金地段的翎艺馆呢？答案是静安区政协委员张仲超的引荐。

翎，灵性、灵气，顾清选了这个名字作馆名，相信她对视的力量会慢慢强大，所举办的画展精彩纷呈。顾清的名片上有唐云辉画的狗狗头像，这是唐云辉留在翎艺馆的记忆。

这个记忆将伴随着翎艺馆的足迹，温暖它的未来。 ■

阿豹，就是画家周根宝。上世纪60年代上海美专预科班的学生，同班同学中有名声如雷贯耳者——陈逸飞、王劭音、戴明德等，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研修，同学中又有大名鼎鼎如施大畏、张培成、韩硕等这样的学院派画家，在上海画坛算得上是顶顶“字正腔圆”的一辈了。

见过阿豹画的戏，人物造型夸张，与剧中角色似是而非，笔墨酣畅，线条松弛有度，色块墨团浓湿得当，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上的那种热闹好看、精致婉转都能在他的画上传达出来。画戏的阿豹，津津乐道的是曾经在上海博物馆临摹、复制古画的工作。

1963年，阿豹上海美专毕业，分到上博专职临摹古画。18岁的他，暗暗庆幸自己当年在校受到过最强师资的精心培养，唐云、程十发、应野平、俞子才、江寒汀，这些名师，个个还是严师，人物画的十八描，花鸟画的宋院体，范宽、巨然的山水画，学生们课内课外反复摹习，孜孜不倦。记得有一次应野平先生让他们临唐寅的东方朔，东方朔的胡须、发丝得一根一根画出来，少掉一根就打不及格！这样的严师熏陶使得阿豹不仅练得一手传统的笔墨技法，更养成了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情有独钟。在上博的17年里，他临过不计其数的历代古画：人物、山水、花鸟，门类齐全，卷轴、团扇、册页，样样精到。现在上博馆藏的唐代《孙位高奔图》、宋代范宽的《雪麓早行图》、宋徽宗赵佶的《柳鸭芦雁图》、明代唐寅的《送别图》、《秋风纨扇图》、元代倪瓒的《渔庄秋霁图》，这些摹本及大量的宋人团扇都出自阿豹的手笔，古意盎然、几可乱真。这些绝美的“山寨”

阿豹画戏

◎ 王小音

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曾经是老上博在黄霉季节馆方为了保护原作而顶包的正式展品。想想当年人们观展时的神圣与敬仰的怀古之心，再想想青年阿宝诚惶诚恐、至纯至善的摹古之情，两厢倒也平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陕西省发掘出武则天陪葬墓（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为了完好保护墓室壁画，阿豹和北京故宫、敦煌等地的古画临摹专家被召集到西安，一起临摹那些珍贵的墓室壁画，阿豹临摹了《懿德太子出行图》、《章怀太子马球图》、《永泰公主观鸟捕蝉图》，每幅80米长，他临了两套，其中一套就保存在上海博物馆。阿豹说这些时如数家珍，神情虽不激昂，眼睛却一阵阵发亮，读得出那种心底的自豪，始终滋润着他漂浮闯荡的人生。

说起阿豹画戏，始于1980年他被调去文化局新办的《舞台与观众》报任美术编辑，从此与戏曲人物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一份当时十分热销也算得上时尚的小报。阿豹天天忙着看戏，各种各样，京剧，沪剧，越剧，武戏，文戏，花旦青衣……好像骨子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可以融会贯通起古画和戏曲的，阿豹似乎毫无障碍地欣赏起中国戏曲来，他看得懂戏中奥妙之美，听得出来唱腔中高昂与低沉之



外的余音缭绕，一份工作要你看戏，若你不爱、不懂，那真是苦役一般，还好阿豹看得开心，还画得起劲，从舞台速写到水墨彩墨，从写实到写意，好像是为了工作，其实已经是为了自己，爱戏，懂戏而画。

临摹、复制古画17年的阿豹深谙中国传统绘画之道，在于意境，韵味。所以，他画戏曲人物，目的并不在于画戏，那出戏在他的画上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标题，和戏的真实性无关。他画的是对中国戏曲的印象，用中国画的笔墨，表现一位艺术家对这出戏纯粹个人的感受。《挡马》也好，《双下山》也好，题在画上，恰恰是阿豹用心消化吸收之后重新再创的另一个舞台，啾啾啾响起锣鼓，咿呀呀唱起来，活泼泼另一番人生，展开在我们的面前。

你看：《苏三出了洪洞县》这幅画上的苏三小姐穿着一点也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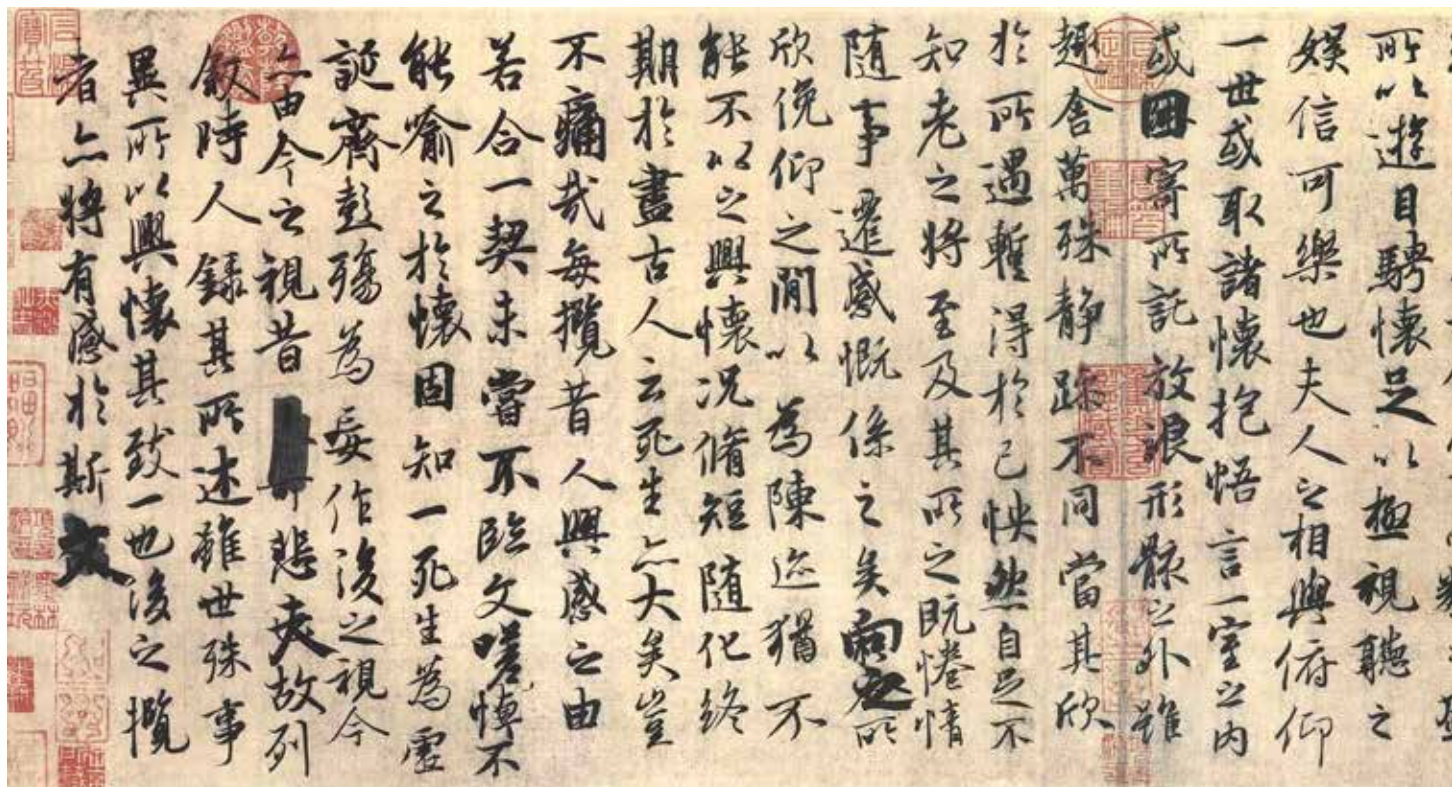


三”的服装，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脖子上那个又像猫又像鱼的枷锁，那几笔枯墨拉出的线条让人叫绝！一旁的解差浓浓湿湿地画了一身，不知怎么的透出点《十五贯》里娄阿鼠的腔调。两个人物一直一曲，动静结合，一黑一红，对比妥贴，整幅画有点滑稽，有点怪诞。阿豹还添油加醋地在一旁题道：“苏三出了洪洞县大段唱腔乃西皮流水脍炙人口阿豹记”像煞很内行的注解，读起来有点让人忍俊不禁。《安天会》画的是孙悟空，典型猴式动作，画白袖子的那两笔浓墨真是精彩，痛快利落得出人意料，两只靴子画得恶似猴腿，叫人过目不忘。好玩的是，阿豹挨着孙悟空添了一行儿童体的字：吾乃安而会中齐天大圣也。《挡马》寥寥数笔，形虽散，神犹在，动感十足，声色恍惚，又艳又晃。1997年在北美水墨画邀请赛上获金

奖的作品《野猪林》落笔爽利，墨色酣畅淋漓至极，过分岔开的双腿，憋紫了不见五官的大脸，用劲撑开的十指，分明让人听见了大花脸鲁提辖郁闷沙哑的吼声。听得头发都要竖起来！

看阿豹画的戏，没有原戏舞台的翻版，不如关良先生的古拙，也不像韩羽的嘲讽，更不似林风眠先生的立体主义。阿豹一直记得他在纽约和大收藏家王千已先生关于笔墨的一场深谈，王千已先生告诉他：什么是笔墨？笔墨就好像歌唱家的歌喉，音色的好坏决定了歌唱家的成就。同样，笔墨的好坏，也决定了一个中国画家的成就，倪云林的几根修竹至今令人回味无穷，这就是笔墨的魅力。所以中国画是歌剧，靠唱功，靠笔墨。不像话剧，话剧是靠做工的，话剧有情节有故事，如同油画等西洋画，而中国画则不

同，情节是次要的，是辅功，靠的是唱功，是笔墨。元四家如此，八大和石涛如此，当代的齐白石也是如此。中国画作品要经得起推敲，第一关就是笔墨！否则终究是站不住脚的——这些话说到阿豹心里，多少年来，他恪守艺术信条，在意的就是笔墨所体现的中国绘画的精神与内涵。出于对绘画境界的追求，阿豹画的戏，捂在家中，轻易不出手，那些美国朋友追着要买，他气定神闲地说：“再等等，再画画。”画了20多年的戏曲人物，至今还常常看戏，沉迷其中，大牌名角结识不少，尤爱京昆。现在的阿豹，他虽然不票戏，自谦嗓子不好，却是个生旦净末丑行行懂的超级戏迷；虽不奏琴，说是手生忘了，却在自己的画上拉得有板有眼。中国画和中国戏曲共同的灵魂：神韵，满溢在阿豹的宣纸上，笔墨中……



读《兰亭序》

◎ 萧 铮

我热爱书法，特别是欣赏美妙漂亮的书法作品。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简称《兰亭序》），我非但抄录过，这三百余字“短文”还背诵过，还曾几次去绍兴瞻仰、礼敬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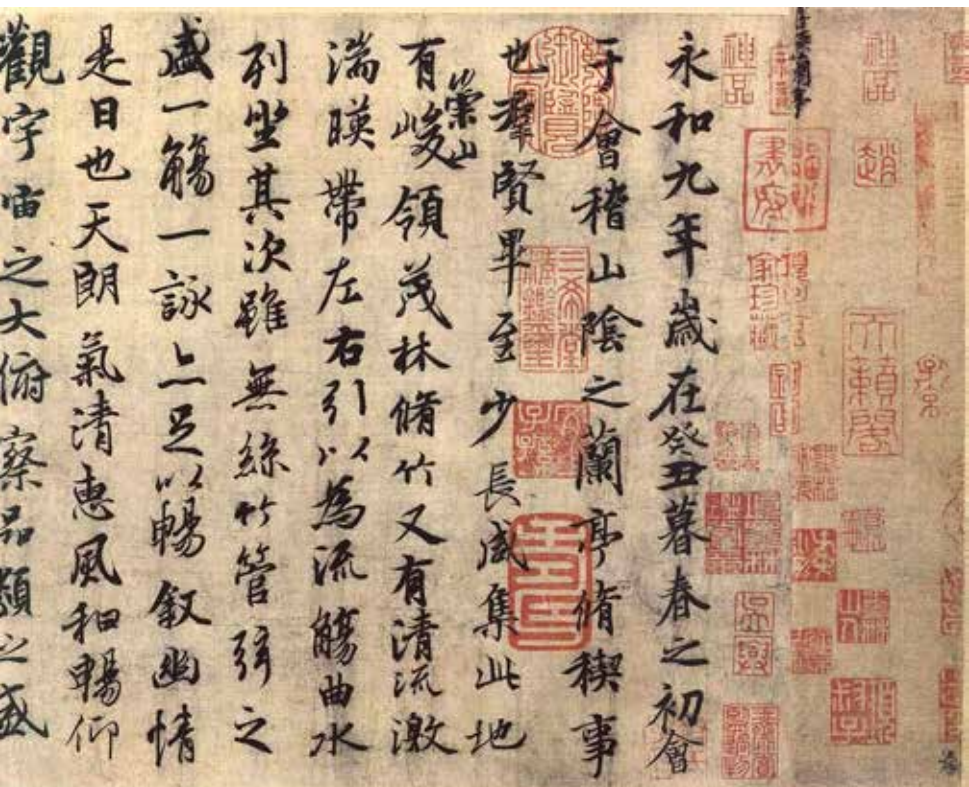
读着读着《兰亭序》，我的书法未必佳，而文章却有点清楚起来。公元353年的暮春雅集，雅士共40余人，雅兴十足，在曲曲折折的溪流旁边，相对而坐，一边饮酒（那时文人借酒浇愁是风气，酒量都好），

一边吟诗。是否有人作画？不知道，反正没有记载。四十多篇大作收集整理起来，成个集子，让羲之先生写篇“报道”，作为“序”，留下纪念。绝妙的是，四十多篇大作至今似无所见，而这篇“豆腐干”文章却盛传不衰，且已过了十多个世纪。这证明了两点：真正好的文字才会流传、传代，其余的大多会湮灭；文章未必以长取胜，短章佳制，只要精彩，照样生命不息，穿透力极强。尽管其真迹被唐太宗带进坟墓，

文字却是永生不灭，绝非任何手段所能毁尸灭迹的，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焚书坑”，证明文化如“野草”，一遇到春风，便迅速长遍天涯。

《兰亭序》只是一次“实录”、一份活动记载或报道吗？断非如此简单。众所周知，文章的好坏、优劣、高下，自然与表达的语言艺术有关，与作者的思想感情有关，与写作的章法结构、表现手法有关。然而，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内涵、意趣情怀、人生襟抱及境界，应更具决定性的意义。

兰亭“修禊”，当然是友谊的聚会，但目的在于除秽祛邪，祈福延年。一则饮酒赋诗，二则畅叙幽情，以加强豪门世族的联系与力量。令



王羲之是个军人，战乱频仍、纷争换代之际的军人，但他更是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他生性豁达（如“东床袒腹”，可查《世说新语》一书），当然不忌避“死亡”与对“死亡”的认真思考。“昔人兴感之由”，让他“不能喻之于怀”，像梦魇一样无法释然。如果将活着看作与死亡一样，对长寿与夭亡也觉得无甚差别，那么，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多大价值呢？为了证明我们的今天，为了珍惜今天的活动和作为，“我”才把今天与会者的姓氏、诗作，一一登录，以保存这一段历史与人事。时代会变化，情景会改变，然而人们的感受却大致相仿。因此，我们看古人，或者后人看待我们，也是似曾相识的。后代人读“我”的文字，不亦会感动么？因为人与人“心灵相通”、“感同身受”罢了。

所以，王羲之在文中既怀着拂不去的万古忧愁及跨世纪烦恼，又抱着宽广的襟怀，表述自己深深的人生思考及对人类命运、规律的反省。总之，珍惜当下，不断行动，留下自己的无可比拟的创造与思绪，让后人受到后发与激励！这才是无可替代的。

人惊异的是，撰序者忽然宕开一笔，脱离了具象的表述而异想天开地进入了超时空的发挥。“宇宙”与“品类”均成了他思考议论的对象。“极视听之娱”，当然是从人的“享受”角度来说的，然而，这种“乐”（快乐、欢乐、乐趣）是短暂的，由一种享受之乐，“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即让人明白了“短暂”的瞬时性。相对于“天地之大”，“品类之盛”，人不仅渺小，而且“势单力薄”；更令人忧心的是时光的流失，使人转眼“老之将至”矣！“不知‘老之将至’”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理状态，“老”的到来是迟早的事，是必然的归宿。而且所有的经历（无论多么辉煌，或者多么坎坷），都

会回到一个“倦”（被动或自觉）字。“荣华富贵”、“鲜花着锦”，过久了也会“审美疲劳”，人便想到了“休止”。

再不动脑子的人，都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感慨系之矣”！一切不是“尤为陈迹”，便是觉得时间老人跑得太快：“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死亡的阴影便逼近了。于是，人对“死亡”的思考便很快来到了面前。“死生亦大矣！”对成年人、老人来说，“死生”这个偏义复词实际就是谈“死”。关于对“死亡”的思考是一个永远的哲学命题，谁也回避不了。不去考虑，无非是托辞，无非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讳疾忌医”而已。

小镇记忆

◎ 全国强



人过半百大概都会开始怀旧，我总会时不时地想起童年时生活过的小镇。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古老而恬静的江南小镇上。据史料记载，小镇成形于北宋年间，原先是华亭县青墩盐场征收盐课税的衙门所在地，后因盐民、渔民集聚，交易兴盛，商贾纷至沓来，渐渐成为闻名遐迩的街市。我孩提时的小镇已算不上繁华，却有几分古典的风韵。十字型的街道，两条交叉的又窄又长的石板街，整齐的对面街零星开了些肉庄、鱼行、豆腐店、药店、杂货店之类的作坊和店铺，算是小镇最有人气的地方。

小镇极具江南水乡的特色，贯穿小镇的是一条并不宽深但很清澈的小河，俗称市河（古代称运盐河）。小河缓缓流淌，平静而富有生机。河的东侧是砖驳的水墙，水墙的上面便是临街的店铺。河的西侧是盐衙门旧址，至上世纪60年代还保存着城隍庙、耶稣堂、三官堂等。河西岸俗称下塘，虽没有街市的热闹，却有江南水乡的韵味，不仅有枝繁叶茂的水槐树，更有几棵婀娜多姿的杨柳树，一到春暖花开的季节，嫩芽吐绿，微风吹拂，垂柳荡漾，给人以清新活泼、飘逸洒脱的感觉。

有河便有桥。市河上有几座建

造风格迥异的石桥，十字街中心就有一座十分醒目的石拱桥，取名为高桥。据说是明永乐年间建造，清同治年间重修的，称得上是小镇的古建筑文物了。桥并不高，但设计建造算得上精致，尤其是桥面中央有四只对称的石狮子，精雕细凿，栩栩如生，给石拱桥平添了几分观赏的雅致。

我家就住在石拱桥的西堍。在我的记忆里，小镇的仲夏之夜是富有诗意的，每到仲夏的傍晚，石拱桥便是最佳的纳凉处。晚饭刚过，我和几个差不多年龄的小伙伴就早早地来到石拱桥占位置，躺在凉爽的石板上，仰望天空，映入眼帘的常常是一轮明月，繁星点点。月中桂子，若隐若现，神秘莫测，心驰神往。侧耳俯听，桥下是潺潺流水声，偶尔有船过时的划桨声。夜幕的空气里到处可以听到富有节奏的蝉鸣声、田鸡叫，此起彼伏，清脆悦耳，犹如一首首令人陶醉的奏鸣曲。我们小憩片刻，一天劳累后的大人们，手摇扇子或蒲扇姗姗聚集到石拱桥，这是石拱桥最富魅力也最有吸引力的时刻。我们几个小男孩只好乖乖地躲避在石桥的一角，静静地聆听着“故事大王”谈论的“山海经”，天南海北，奇闻逸事，常常令我们这些楞头楞脑的孩童感觉妙趣横生，

引人入胜。

小镇上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要数城隍庙了。为了办学校，解放后城隍庙改建为一所全日制小学，我就是在这所古色古香的庙宇改造的学校里接受启蒙教育的。现在已记不全所有的任课老师了，但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的班主任蒋老师容貌、言行举止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的蒋老师30岁左右的年纪，中等身材，长得端正大方。蒋老师讲课的特点是表情严肃、声音洪亮，在教学上称得上孜孜不倦，一丝不苟。我自入学后就一直十分敬畏她，见到她总是怯生生的。读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由于我放学后贪玩，把腿给严重烫伤了，一连好几天都不能下地行走，当然也不能上学。蒋老师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上门看望，为了防止我落下残疾，她到处求医问药，找来了可以治疗烫伤的土方子。为了不影晌我的学业，她还每天背我去上学，一连数周，从不间断，一直到我伤口痊愈。真是恩师如父母，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往事如烟，岁月如歌。我虽然早已告别幼稚玩耍的童年，不知不觉步入了知天命的年纪，童年生活过的小镇也早已被工业化的浪潮所湮没，而古朴典雅的小镇已成为美好的记忆。



年轻时的丁玲

丁玲早年与上海之缘

◎ 朱少伟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曾产生很大影响。然而，这位现代著名女作家早年与上海之缘却鲜为人知：她是在申城接受“革命启蒙”和“文学启蒙”的，也是从这里奔赴陕北的……

入读党创办的女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去卷烟厂、纺织厂开展工作，于是陈独秀、李达便商量在上海筹建一所女校，以“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不久，李达寓所后面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至44号）要出租，他就租下这幢两楼两底的旧式石库门房屋，以作校舍。1921年12月，上海《民国日报》、《妇女声》登载平民女校招生广告，申明

“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在《妇女声》发表的文章中，陈独秀“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李达则赞扬它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正就读于湖南岳云中学的丁玲，虽仅差半年就要毕业，但她得到消息便毫不犹豫地赴沪入学。

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开学，它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主办，开设多种课程，尤其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时事政治。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并由他们各自的夫人王会悟、向警予协助处理各种事务；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高语罕、沈雁冰、沈泽民、张秋人等都义务兼课。那时，丁玲是个十八岁的姑娘，使用的名字为蒋冰之，她虽初次来申城，但在班里挺活跃，而且学习成绩也较好。

平民女校实行半工半读，在刘明义的《王会悟回忆平民女校及早期妇女运动等情况的记录》（1959年6月）中，王会悟如此叙述：“学生三十多人，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为了生活，我们组织了四个工作组，有四个工作组长。

有的领导缝纫、有的领导作袜、有的领导洗衣”。对于学生的情况，《丁玲自叙》提及：“学校有初级、高级两班，初级班一二十人，高级班六人（另有两人，染有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学不久便离校了），共二三十人，我在高级班”，“低级班学生住校，我们高级班六个人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客堂楼上”；“学校除上课外，还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搞些社会活动。”

平民女校开设有语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经济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课程，更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时事政治，张太雷、刘少奇等都为学员作过报告。平民女校常组织学员向社会进行演讲，声援工人运动。丁玲在晚年还清晰记得：“那年马克思生日，开纪念会……工人闹罢工，我们到马路上去捐钱，跑到浦东纱厂去讲演，劝工人坚持罢工。我的湖南口音女工们听不懂，张秋人给翻译。”

平民女校语文教材多为进步报刊所载的文学名作、译文和评论，语文教员陈望道敢于改革，采用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倡导作文首先重见义，其次重文字，这些对丁玲以后从事文学创作颇有帮助。



1925年秋的丁玲和胡也频



早年丁玲在沪寓所

1922年年底，由于经费极为困难，平民女校停止活动。丁玲先去南京，接着又进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合作的上海大学。

参与筹建出版机构

1924年夏，丁玲在北京与胡也频相识。那时，丁玲正为心爱的弟弟夭折而痛苦万分，胡也频为了安慰她，送上一束玫瑰，并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由于生活窘迫，丁玲返回湖南老家。胡也频闻讯，也向朋友借钱赴湘，当他风尘仆仆出现在丁玲面前，她被深深感动了，爱情之门终于开启。数月后，丁玲与胡也频结婚。

1928年下半年，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经潘汉年的介绍，两人开始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他们与沈从文一起租用上海萨坡赛路204号（今淡水路280号），创办红黑出版处；胡也频主编《红黑》月刊，丁玲协助沈从文主编《人间》月刊，并一起出版“红黑丛书”、“二零四号丛书”。《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提及：“1928年夏天我和胡也频从杭州到上海，沈从文就讲是否办一个刊物。那时候我们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96号，沈从文住在附近，常来我们家。这时，正好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带了一千元钱来，是一笔卖房子钱，想投资入股到一家叫‘小有天’的福建菜馆。胡也频便和他父亲商量，借这一千元钱开书店，讲明三分利息，他父亲同意了。于是，胡也频、沈从文和我就用这笔钱办刊物，取名《红黑》。”沈从文的《记胡也频》也谈到：“那时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

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

最初，他们欲将主办的刊物定名为《红黑创作》，由于不想仅限于创作，便改为《红黑》，而“红黑”是借用了湘西土话的含义。在创刊号上，胡也频对此特地作了说明：“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这红与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因为我们自信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正因为我们不图自夸，不敢狂妄，所以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的意思，‘左右’的意思，‘无论怎样都得’的意思。这意义，是再明显没有了。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土话的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1929年1月，《红黑》月刊和《人间》月刊创刊号相继出版。三个人到上海各书店察看刊物销售情况，《红黑》月刊第一期就卖出近千册，这个数字在那时是很可观的。与此同时，丁玲编选的《也频诗选》也作为红黑出版处的第一本书推出。

施蛰存的《滇浦雨话从文》回忆：“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他们在计划办一

个文艺刊物《红黑》”，“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文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

丁玲、胡也频、沈从文都写过不少作品，除了在《红黑》月刊、《人间》月刊发表，还以“红黑丛书”和“二零四号丛书”的名义出版一些小说单行本。由于许多书刊批发给一些书店，钱却迟迟收不回来，红黑出版处勉强支撑了大半年就不得不歇业。不久，为了偿还近千银元的债务，沈从文到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胡也频到济南的一所高中教书；丁玲在申城逗留了一段时间，也去了山东。

主编“左联”机关刊物

1930年5月，丁玲和胡也频返回上海，一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那时，他们住在昆山路昆山花园7号，这是一幢红砖洋房，四楼最西侧的那个房间就是两人的寓所。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在上海租界内的东方旅社出席党的秘密会议，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当晚，丁玲一直苦等着，却始终未见丈夫回家，她后来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说：“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2月7日，左翼青年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等24人被秘密杀害于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院。



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擦干了眼泪，在血雨腥风中继续坚守文艺阵地。随即，党组织要求她筹办和主编“左联”新的机关刊物。她接受任务后，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经过紧张的筹备，《北斗》创刊号于同年9月20日在沪同读者见面。这是一份大型文艺杂志，十六开本，每月出版一期，由上海湖风书局发行。该刊辟有小说、戏剧、诗、杂感、世界名著选译、小品、通讯等栏目，并注重培养文艺新人，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进行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丁玲在创刊号《编后记》中说：“现在可以读的杂志太少了，我自己就感到这方面缺少的难过。所以我立志要来弄出一个不会使读者过分上当的东西。”

丁玲主编《北斗》期间，得到鲁迅、瞿秋白等人的热忱支持。鲁迅的《写于深夜里》提及：“1931年——我忘记月份了——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北斗》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

地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纪念。”除了推荐版画，鲁迅还以笔名在《北斗》发表十余篇杂文和译文，其中最为著称的是《我们不再受骗了》、《答〈北斗〉杂志社问》。瞿秋白则用笔名为《北斗》撰写杂文《乱弹》，从第一期起连载。此外，主要作者还有周扬、田汉、夏衍、郑振铎、沈雁冰、冯雪峰、钱杏村、张天翼等。

由于《北斗》富有时代气息，因而该刊第三期的启事中告诉大家：“发行未久，已被国内外读者所称许，公认为1931年我国文坛唯一的好刊物。”然而，由于遭国民党当局查禁，该刊仅出版了八期七册（第二卷第三、四期为合刊）。

1932年3月，丁玲终于实现夙愿，像胡也频一样成为中共党员，后来又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5月14日，丁玲遭国民党当局秘密绑架，并被幽禁。5月24日，上海《大美晚报》率先登载了关于丁玲“失踪”的报道，一时间震动全市，人们很担心：“左联五烈士”被枪杀的一幕，难道又要重演？为此，上海文化界发起一场影响极大的营救活动，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沈从文等三十余位文化名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丁玲等。1936年9月，丁玲获得自由，中旬乘火车抵沪，冯雪峰派交通员到站接应。

不久，丁玲毅然前往陕北。在那里，她担任过中国文艺协会（简称“苏区文协”）主任，并曾主编《红色中华》“红中副刊”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还为编辑《二万五千里》（即《红军长征记》）作出了重要贡献。



伟人足迹

——毛泽东早期在上海革命活动旧址寻踪

◎ 朱敏彦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基地，也是工人运动的发祥地，还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最早窗口。上海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不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有利的活动条件，还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上海组织、发动和开展一系列重大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利的基础。1919年3月至1926年11月，毛泽东前后11次来到上海，探寻救国救民道路，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上海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革命活动旧址，包括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毛泽东寓所、公兴路上三曾里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旧址、慕尔鸣路甲秀里（今茂名北路120弄）毛泽东寓所、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等。

探寻救国救民道路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湖南发起组织

新民学会，从一个学术团体逐步发展成为革命团体。为了探寻革命真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领导了湖南的五四运动，并把五四运动发展成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湖南自治运动，为此他曾三次来到上海。

为了给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送行，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偕同一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开北京，3月14日抵达上海，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上海。次日毛泽东在上海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参加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3月17日，毛泽东来到杨树浦码头，送别赴法勤工俭学学生89人，其中湖南青年学生43人，毛泽东送这批青年学生乘坐因幡丸轮从杨树浦码头启航，挥手告别，久久才离去。在上海期间，毛泽东到位于南市斜桥地区的湖南会馆看望在那里候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并勉励他们勤工之余要多研究进步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革命情况，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将来回到祖国为革命作出贡献。3月29日，毛泽东参加又一批

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3月31日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湖南，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毛泽东第一次到上海约半个多月，当时的住处已经无法查考。

1919年12月中旬，毛泽东从武汉绕道路过上海，此时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在上海等候轮船赴法勤工俭学，他在上海与蔡和森等挚友热情交谈，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毛泽东要赶往北京声讨张敬尧，未及蔡和森等启程，就话别后率团北上。毛泽东第二次到上海仅短短几天，当时的住处也无法查考了。

1920年4月1日，由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联合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的“湖南改造促进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也将从上海启程，也可乘便为他们送行。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毛泽东到达



1、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三曾里遗址 2、中共一大会址
3、中共二大会址 4、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

上海时，从北京、长沙、天津到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有12人。5月8日，毛泽东召集各地到上海的12位新民学会会员在南市半淞园开了一天会，欢送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会上由毛泽东主持对新民学会的任务、活动方式、会员条件、入会手续等作了详尽的讨论，并作出决议，规定新民学会入会条件为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会议明确“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5月11日毛泽东等来到黄浦江畔，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萧三等6位新民学会会员送行。

此次在上海期间，毛泽东还就他曾一度醉心的工读互助生活进行了尝试。他与彭璜、张文亮等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互助工读团的生活。此次上海之行的目的主要在于商讨湖南建设问题，6月9日至28日仅仅20天内，毛泽东在《时事新报》、《申报》和《天问》周刊上发表了与彭璜几经讨论拟写的《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和《湖南改造促成会成立宣言》。此外，还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湖南人再进

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继续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探讨湖南的改造。

毛泽东此次到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1959年5月，安义路63号毛泽东寓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77年12月，该旧址被重新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此时，陈独秀也在上海与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着手筹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创办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多次前往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新青年》编辑部就设在这里。毛泽东与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商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商讨“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等。陈独秀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建立共产党组织。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对于我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的

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7月初，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湖南。

1959年5月，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8月，该旧址被重新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从事党的创建活动

1920年8月成立的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各地建立党和团的组织以及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等方面，都作了重大贡献，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作用。1920年11月间，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名，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到1921年春，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旅日、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已相继建立。随着建党活动不断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成

熟。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发来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一起从长沙乘船赴上海参加会议。7月初，毛泽东、何叔衡到达上海，住白尔路博文女校，这是毛泽东第四次到上海。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这幢普通的石库门楼房里召开。这幢石库门楼住宅的主人是李书城（中国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和李汉俊兄弟俩。7月23日，十几位来自不同城市、操着不同口音的人聚集到这座小楼，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此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和尼科尔斯基（俄国人）列席了大会。他们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才19岁，虽然人数不多，干的却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情——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1952年9月，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所在地利用原有建筑建立的纪念馆对外开放；1959年5月，该会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3月，该会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该会址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99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扩建工程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

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外地来沪代表，住在离开会地点不远的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该校1917年创办，校长黄绍兰，当时约有

100名学生，全日制教学。此时正值暑假，学校空着，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与黄绍兰联系，以“北师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女校借下校舍，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等9人被安排在此住宿。这是一幢三楼三底砖木结构坐南朝北的石库门楼房。博文女校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成为各地代表到上海后聚会和活动的场所，为中共“一大”胜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1959年5月，太仓路127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宿舍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77年12月，该旧址被重新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1922年3月，毛泽东为湖南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被害事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第五次到达上海。在上海，毛泽东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联合举办的黄爱、庞人铨追悼大会。毛泽东第五次上海之行，推动了湖南工人运动乃至全国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出现。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这里是党的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也是党的第一个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中共“二大”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还通过了“民主的联合战线”、“工会运动”、“少年运动”、“妇女运动”等9个专门的决议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

的第一部章程。毛泽东作为代表第六次到上海，由于找不到开会地点，没有出席中共“二大”。他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1959年5月，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77年12月，该会址被重新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该会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为配合延中绿地一期工程的建设，静安区修缮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恢复了会址的历史原貌，并建立了该会址纪念馆；200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85周年前夕，静安区又一次对该会址纪念馆修缮扩建和重新布展，纪念馆面积从原来的200多平方米扩大到2300平方米。

推动首次国共合作

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来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七次到上海。同年6月上旬，毛泽东离开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7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开展工作，这是毛泽东第八次到上海。8月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进行指导。

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三大”产生的中央局机关由广州迁到上海。中央局机关设在闸北区公兴路上的三曾里（今临山路公兴路口象山小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住中央局机关。这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楼房子，楼上楼下共有八九间房。常住在这里的有3户人家：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住在楼下前厢房，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楼下后厢房，罗章龙住楼上，



1、太仓路127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宿舍旧址 2、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旧居
3、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 4、安义路63号毛泽东寓所
5、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旧居 6、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他们自称为“三户楼”，户主是向警予。小小的三曾里成了党的心脏和工人运动的总指挥部。作为中央局机关办事处，有一套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经常往来的几个人，对外就称亲戚串门，其他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经中央允许和来人接头后才可进入。三曾里的革命家们每天要阅读《申报》、《新闻报》、《密勒氏评论报》等十余种中外报纸及杂志，研讨全国的政治动向，草拟党的文件、决议，为《向导》等党报撰写文章。他们“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经过中共“三大”后中央局的努力，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孕育之中。

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在湖南筹建国民党。同年12月底，毛泽东奉中共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毛泽东第九次到上海，仍住在闸北区三曾里中共中央局机关。1924年1月中旬，毛泽东同国民党部分代表乘船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闸北区公兴路上的三曾里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毁于日军战火，旧址上后建了民居，现旧址为高层建筑。2006年闸北区置换了浙江北路118号这幢

楼房并加以修缮，修建了近700平方米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机关历史纪念馆。

1924年1月20日，毛泽东作为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月3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上海迁到广州，另在上海等地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部，代行中央职权，指挥各省党部。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派从广州到上海，这是毛泽东第十次

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仍住在闸北区三曾里中共中央局机关。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设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这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重要的革命活动场所。上海执行部的主要职责是管辖苏、浙、皖、赣四省和上海的党务。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十分重视，决定派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遇到特别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协商决定。派沈泽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张秋人等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当时执行部的文书科主任邵元冲一直未到任，由毛泽东代理此职，成为实际上的负责人。同样，组织部也因为部长胡汉民以元老自居，不屑处理日常事务，实际工作也是由组织部秘书毛泽东负责，毛泽东被人称为组织部代理部长。后来毛泽东还担任宣传部代理部长，罗章龙为组织部干事，宣传部部长汪精卫、秘书恽代英、干事施存统、沈泽民等，工人农民部部长于右任、秘书邵力子，调查部部长茅祖权、秘书孙镜、干事邓中夏、办事员王荷波，青年、妇女部助理向警予。同年春，毛泽东同罗章龙并邀在上海松江中学教书的侯绍裘一道，由黄浦江边码头乘小艇到松江，指导当地国民党组织的工作。

1924年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近一年，是毛泽东早期在上海居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毛泽东负责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当时国民党成分复杂，严重脱离群众，上海《国民日报》说：“只要花一元钱，不问什么人，都是党员。”为了帮助国民党改变这种严重涣散局面，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在毛泽东主持下，

对各地党组织进行调查，对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此项工作受到来自国民党右派的阻扰、破坏，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不计个人得失，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晓之以理，清除了国民党内的一些极度腐败分子，打击了右派势力的嚣张气焰，终于使登记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毛泽东还积极推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其他方面工作，先后成立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委员会，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织。此外，毛泽东还负责黄埔军校在上海地区招生的复试、上海各界追悼列宁大会的组织筹备以及平民教育的指导等工作。

1959年5月，南昌路180号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2月，该旧址被重新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1924年6月初，杨开慧偕母亲向振熙，带着2岁的儿子毛岸英和出生不久的毛岸青来到上海，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今茂名北路120弄7号）。毛泽东一家住在楼下厢房，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在楼上的厢房。在甲秀里期间，毛泽东每天到环龙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很晚才回家，回家后还要起草大量的文件和文稿，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同年12月，毛泽东因工作过度劳累，积劳成疾，需要有一个恢复时期，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年底，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湖南韶山疗养，同时领导湖南工农运动。

1960年，市文物部门开始对甲秀里毛泽东寓所旧址进行调查，确认7号或9号均有可能为毛泽东寓所旧址；1977年12月，茂名北路120弄5、7、9号三幢房屋一并作为“上海茂名路毛主席旧居”，

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12月，毛泽东旧居经过修缮，其中7号是对原址的恢复，毛泽东旧居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并展出《毛泽东在上海》的图片史料。

1926年11月上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这是毛泽东第十一次到上海。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立刻将自己的工作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11月15日得到中共中央局批准。毛泽东在《目前农运计划》中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通过重点带动全局，为全党农运工作的开展提出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毛泽东不愿在大城市指导农民运动，同年11月下旬，离开上海先后到南昌、武汉、长沙一带视察，指导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农民运动的开展。

从1919年3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到上海，直至1926年11月上旬毛泽东第十一次到达上海，8年间毛泽东11次来到上海。1926年1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上海后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期间，毛泽东虽然没有再来上海，但是毛泽东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一直在鼓舞、支持着上海人民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推动着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开辟了蒋管区人民反对国民党斗争的第二条战线，直至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40多次来到上海，视察工厂、农村、部队、学校，依靠各方力量，巩固人民政权；克服种种困难，恢复发展生产；完成三大改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

名列 2007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木版水印字画是我国特有的复制工艺，它集绘画、雕刻和印刷于一体，根据水墨渗透原理显示笔触墨韵，既可用于创作体现自身特点的艺术作品，也可逼真地复制各类中国字画。“镂象于木，印之素纸”的传统木版水印艺术源于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唐代，木版水印技艺就已经相当成熟，宋元以后，用木版水印作书籍插图极为流行，到了明代更是盛极一时。今日的木版水印传承了这一古老的技艺，因此就获得了中国印刷史的“活化石”之称。

朵云轩自 1900 年创立之日起，就传承了木版水印这一传统技艺。历经百余年的研究、制作和拓展，朵云轩木版水印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了绘画、雕刻和印刷的再创造艺术。受“海派文化”的滋养，形成了作品用料考究、精致、典雅、秀润的风格特征，与荣宝斋木版水印形成了中国木版水印“南朵北荣”两大流派。

朵云轩惟妙惟肖、几可乱真的木版水印作品，为人们学习、欣赏和收藏各朝各代的佳作提供了机会，起到了其他印刷品所不可替代的表达和流传作用，有着其特有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朵云轩木版水印传承的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技艺，而且还是一种优秀文化，一种文明。

木版水印字画的制作是一个极为专业、也极富创造性的过程，不仅涉及制作人员把握原作的素养，也涉及其描绘、雕刻功底。在套色印刷时，更涉及制作人员的精湛技巧，材质、颜料、水分，甚至气温、湿度，稍有掌握不慎，都会导致前期劳动白费。正因如此，木版水印字画的制作成功率相当低，以曾荣获 1989 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最高奖——国家大奖，为我国图书出版业争得了极大荣誉的《明·胡正言十竹斋书画谱》为例，光一套木版就耗费了几十位专业人员前后十年的劳动，堪称工程浩大。此外，一套木版的使用次数也相当有限，通常情况下，整套有效使用不过百余次。2004 年朵云轩的“木版水印”被上海市经济委员会认定为上海市传统工艺美术品种。（马赛文 / 摄）



《明·胡正言十竹斋书画谱》（局部）



便捷服务心体验

 上海农商银行 SRCB

系列产品现正发售中



鑫意理财

— 全 鑫 全 意 —

鑫意理财

欢迎亲临我行指定销售网点咨询并购买我行理财产品。详情请致电 24 小时客服热线 021-962999、4006962999 或登录网站 www.srcb.com 查询。

欢迎致电24小时客服热线 021-962999
4006962999 或登陆网站 www.srcb.com